

5061/5300.1

# 中國語文

总第58期

JUL 9 1957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UNIVER IIY  
BOYLSTON HALL  
CAMBRIDGE, MASS., U. S. A.

4

1957

1957年4月号(总第58期)目录

單句复句的划界問題 .....	郭 中 平 ( 1 )
談談包孕句和單句复句的关系 .....	曹 伯 韓 ( 10 )
論漢語划分詞类的标准 .....	徐 仲 华 ( 13 )
試說表概数的“来” .....	呂 叔 湘 ( 18 )
《馬氏文通》和旧有講虛字的書 .....	麦 梅 翹 ( 20 )
方言里的文白异讀 .....	李 荣 ( 22 )
談一談訓詁学 .....	陆 宗 达 ( 24 )
怎样研究梵汉翻譯和对音 .....	周 达 甫 ( 27 )
国际共通語和世界語 .....	赵 觉 誠 ( 28 )
关于“社会習慣語”或“社会方言”的討論 .....	
	郑达汉、彭国鈞、陈永正 楊 定 ( 31 )
語文短評 .....	( 38 )
書刊評介 .....	( 40 )
讀《語法和語法教学》 .....	唐 啓 运 ( 44 )
信箱	
一个翻譯工作者的体驗 .....	徐 亞 倩 ( 45 )
对譯名不統一的意見 .....	陈国魁、熊堯祥、魏展英 ( 47 )
Старославянизм 和 графика 的譯法 .....	王 力、張大本 ( 47 )
希望統一語音学术語 .....	楊 長 礼 ( 37 )
海南島通訊 .....	柏 葦 ( 43 )
語文筆記	
“階級方言”和 “slang” .....	勞 宁 譯 ( 30 )
談《西儒耳目資》 .....	楊 道 經 ( 封 4 )
告讀者 .....	本刊編輯部 ( 49 )



# 單句復句的劃界問題

郭中平

近幾年來，語法學界曾經比較集中地討論了一些問題，比如詞類問題、句法里的主語賓語問題等。這些討論雖然沒有得出一致的結論，但是已經使大家得到啓發，基本上弄清了癥結所在，對問題的解決有一定的作用。語法里還有些重要問題應該引起討論，其中之一是單句復句的劃界問題。這個問題不論就理論上或者實踐上說，都是關係重大的。我們覺得，目前對一篇文章作全面的語法分析所以會感到困難，原因之一就是單句復句的界限還十分模糊。各家語法著作在判斷一個語言片段是單句還是復句的時候，意見很不一致。這造成了語法學習上特別是語法教學上的不小的困難。我們以為，語法研究工作者和語法教學工作者有必要通過討論使這個問題得到初步的解決；即使僅僅弄清癥結所在，抓住解決問題的綫索，也是有意義的。因此我們在這裡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請同志們共同研究討論。

下邊這類句子，各家是一致認作復句的：

1. 我不再望着你那發音的嘴，我望定了遠天。（靳以）
2. 天依然是藍的，飄着的雲朵卻燒成紅的了。（靳以）
3. 媽媽不打他，我不依。（紅樓夢）

這大概因為這一類句子有這樣幾個標志：1)都包含兩個主謂結構；2)兩個主謂結構之間有語音停頓（書面上有標點）；3)每個主謂結構的意思都可以說是完整的。如果遇到下邊這類句子，大家的意見就不一致了：

1. { 襲人進來，見這光景，知是梳洗過了，只得回來自己梳洗。（紅樓夢）  
尤老二在八仙桌前面立了一會兒，向大家笑了笑，走進里屋去。（老舍）
2. { 我并没說什么，不過說了几句頑話。（紅樓夢）  
我忽而看見他眼圈微紅，但立即知道是有了酒意。（魯迅）
3. { 他們愛祖國，愛人民，愛正義，愛和平。（楊朔）  
孫中山歡迎俄國革命，歡迎俄國對中國人的幫助，歡迎中國共產黨和他合作。（毛澤東）
4. { 他……扔下糞筐就往回跑。（馬烽、西戎）  
待張材家的織杼再發。（紅樓夢）
5. { 對於車座兒，他絕對不客氣。（老舍）  
關於各項具體政策，中央曾經陸續有所指示。（毛澤東）

這五組句子當然遠遠概括不了複雜的格式，這裡只是舉例說明各家看法的分歧。從下頁的表中可以看出，同是一個類型的句子，表中五家<sup>①</sup>的看法竟沒有完全一致的，這是由於他們所持的標準不同。因此我們第一步必須找出他們所持的標準，然後才能談到應用那些標準是否能夠解決問題。遺憾的是他們都沒有很明白地說出用什麼標準，即或透露出一點消息，也往往非常零碎。這裡只能先從各家的著作中探索他們的標準。順便說明一句，我們在歸納、探索各家的標準的同時，如果發現他的標準在自己的體系里就前後矛盾不能貫徹，也指出來略加分析。這樣作是為了讓我們對某一個標準的使用情況有所了解。不過，這五家里面有的先生對這個問題說得多一些，明顯一些，有的先生說得少一些，含蓄一些；因此沒有指出作者在自己的體系里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並不意味着作者並沒有這種情形。總之，這裡的重點並不是

<sup>①</sup> 我們之所以選這五家，只是因為他們的著作比較常見，影響比較大一些。為了方便，例句並沒有完全從他們的著作中摘引，有些只是根據他們看法這樣推斷的，因此可能有些地方誤解了作者的原意。

	黎錦熙	王力	呂 叔 湘	語法小組 <sup>①</sup>	張志公
1 組	單 句	復句	復 句	復 句	單句
2 組	單 句	復句	復 句	復 句	復句
3 組	單 句	復句	復句(單句) <sup>②</sup>	復 句	單句
4 組	單 句	復句 <sup>③</sup>	復 句 <sup>④</sup>	單 句	單句
5 組	單 句	復句	單 句	復 句	單句

对各家的体系有所評論。

先看黎錦熙先生。<sup>⑤</sup> 黎先生对复句所下的定义是：“两个以上的單句，彼此接近，或互相聯絡，却都是平等而并立的，这种复句，叫‘等立句’”；“两个以上的單句，不能平等而并立，要把一句为主，其余为从，这种复句，叫‘主从句’”（新著国語文法第19版〔下同〕，265，282頁）。

什么是單句呢？“就一种事物述說它的动作，或情形，或性質、种类，能够表示思想中一个完全意思的，叫做‘句子’，通称‘句’”（新著国語文法4頁）。驟然一看，界限也还清楚——表示“一个完全意思的”是單句，“两个以上的單句，彼此接近，或互相聯絡”的是复句。但是單靠这定义还不能了解黎先生的划界的标准。根据黎先生的定义，象下边这样的句子，似乎不應該算作單句：

1. 時間和劳动，是万不可卖的。（新著国語文法216頁例）
2. 宝玉擲笔就寢，便忽然睡去，一夜不知所之，直到天明方醒。（又224頁例）

因为第1句是就两种事物（時間和劳动）来述說的；第2句既述說了“动作”，又述說了“情况”。可是黎先生还是把它們划归單句，只是管它們叫“复主語”和“复述語”的單句罢了。

例1之类說是單句，現在大致不会有人反对。<sup>⑥</sup> 例2之类說是單句，單句的内容就大起来了，因为“天明方醒”的宝玉还可以接着干許多別的事。这样扩大起来，黎先生也觉得不大妥当，于是提出一个折衷办法：“…复述語，和复句艰难划清界綫；虽然第一个明了的界說就在‘共一主語，是复成分；不共主語，便成复句’，但有时就是共一主語，也不能不把来作复句看待。因为一个主語所帶的述語太多，而述語方面所連帶或附加的成分又太复杂了，就不能够看作單句了”（新著国語文法226頁）。从这里我們可以看到黎先生的两个标准：A)就結構上看是否共一主語，共一主語是單句，否則是复句；B)就述語的多少和繁簡来看，即使共一主語，而述語太多或者太复杂时也得算复句。B原是补救A的，但是我們觉得这样一来反而更使界限不清了。因为究竟到什么程度才算多，才算复杂呢？上引第2句述語不能算少了，黎先生却認為不够多。按照B的說法，除非有硬性規定，否則一定会莫衷一是的。

除了是否全有主語与述語多少和繁簡之外，黎先生还有別的标准，如下面这两句都共一主語，述語也不算太多太复杂，可是黎先生却說它們是复句：

1. 我看書要戴眼鏡，否則簡直看不清楚。（新著国語文法273頁例）
2. 离开这里罢！不然，你就要被砸了。（又273頁例）

据我們体会，黎先生在这里又应用了第三个标准——連詞，因为上述两个例句里都用了“否則”

① 指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語法小組。这个小組曾写《語法講話》，在本刊上陸續發表，但后来声明，《語法講話》如印單行本，將用个人名义，不用“語法小組”的名义。

② 呂叔湘先生在他与朱德熙先生合著的《語法修辭講話》里（31頁）說：假如“几个分句之間沒有特殊的关系，只是一个加一个，那么，就把这几个謂語作为一个联合謂語看待，說这是一个簡單句，也沒有什么不可以”。

③ 王力先生認為这类句子是“緊縮式”，他的“緊縮式”是由复句緊縮成的。

④ 呂叔湘先生并未明白表示这类句子定是复句，但在《語法學習》里說这类句子“作为复合句比作为簡單句妥当些”。

⑤ 黎錦熙先生的体系里还有包孕复句。不过近些年来，一般人都倾向于把“其中一个成分是主謂結構的句子”看作單句，因此这里不再談包孕复句的問題。

⑥ 刘复認為“皇天后土，实鑒此心”等于“皇天实鑒此心，后土实鑒此心”，就不把这类句子算作單句，見《中国文法講話》，47頁。



或“不然”(黎先生称为“選擇連詞”)。但是这个标准也沒能完全貫徹,比如下面這兩句,黎先生又認為前者是單句,后者是“復句縮合成單句”。

1. 他失敗了,然而還有希望。(新著國語文法 225 頁例)
2. 外面底月亮,雖然還像去年那麼圓滿,那麼光明,可是他對於月亮的情緒,就大不如去年了。(又 304 頁例)

于是就引出了另一個問題:哪些連詞可以用來判斷單句復句?黎先生沒有說明這個問題。另外,黎先生的連詞,範圍沒有一定,因而算不算復句就常要靠意會,也就難免有意會錯了的危險。大家知道,黎先生是主張“句本位”的,因此有些詞,未入句的時候,“一望而知”不是連詞,入句以後却往往可以轉化為連詞。我們翻一下《新著國語文法》,就可以看見:“以‘副’為‘連’”(265 頁),“‘表時的副詞’作連詞”(285 頁),“介詞化為‘連詞’”(282 頁),“外動詞的‘使’字,也可以引伸作連詞用”(289 頁),“勝、強、差…等字本是‘形容詞’,有時它們要和所帶的‘過’、‘于’、‘似’…等連詞分析”(303 頁)。這樣,別類詞可以大量地流入連詞,用連詞作為標準來區別單句復句,就不能沒有困難了。即如黎先生自己,因為同一個詞可以意會為既是連詞又不是連詞,也就不免有些地方失去照應。例如下面兩句,從單句復句的角度看,顯然應該同樣看待:

1. 她提著筆,像要寫甚么似的。(新著國語文法 134 頁例)
2. 一群一群的人都從他們的家里滾出來,像受了什麼催眠術似的…。(又 301 頁例)

然而黎先生把第 1 句算單句,第 2 句算復句。為什麼呢?因為第 1 句是在講“動詞細目”時提出來的,“像”在那里是“同動詞”;第 2 句是在講“連詞細目”時提出來的,“像”在那里是“平比的連詞”。這就不免使人無所適從了。

但是,儘管黎先生的劃界辦法不能貫徹到底,就上面的分析看來,他判斷單句復句的時候同時應用三個標準還是比較明顯的。這三個標準是:A)結構(兩個敘述是否全有主語);B)述語的多少和繁簡;C)連詞的應用。<sup>①</sup>

王力先生給復句下的定義是:“凡句子,由可以用語音停頓隔斷的兩個句子形式(按包括作句子成分的主謂結構和分句——筆者)構成者,叫做複合句”(中國現代語法 127 頁)。同時有個附帶說明:“謂語形式(按相當於動詞性詞組——筆者)為語音停頓所隔斷者也該認為句子形式的省略”(中國現代語法 106 頁)。還有個附帶說明也很重要:“中國的複合句往往是一種意合法,…在平等的語言里不用連詞的時候比用連詞的時候更多”(中國語法理論 115 頁)。

首先,根據這些定義來看,王先生和黎先生的最突出的不同之點是,王先生強調為黎先生所根本沒有提到的“語音停頓”這個標準。《中國現代語法》里復句的例句全是有停頓的。“眾人听了越發駭異”一例(111 頁)疑是誤排,漏掉逗號,因為《中國語法綱要》(176 頁)作“眾人听了,越發駭異”。其次,王先生也注意句子的結構(要有兩個“句子形式”——“謂語形式”可算作“句子形式”之省)。第三,王先生也注意連詞,但是他好像更注意意義關係,因為他強調“意合法”。根據這三個標準,底下這些句子都該算作復句:

1. 在妃子和侍臣們,這種本領是非有不可的。(叶聖陶)
2. 對於花,他們當然是百分之百的內行。(叶聖陶)
3. 它接連不斷地唱,為哥兒,為哥兒的姊妹兄弟們。(叶聖陶)

這些句子裡的所謂句子形式省略的謂語形式,一般的看法是介詞<sup>②</sup>和賓語的組合(介詞結構),是不作謂語的,因而也是不作分句的。

① 黎錦熙先生所舉復句的例句,也有少數不用連詞的,可見“意義關係”也不是決不用的標準,雖然並沒有重視它。

② 《中國現代語法》里不立“介詞”一類,“把、被”等算“助動詞”,“也”歸入動詞一類”(20 頁)。又說:“‘他不在家’的‘在’,和‘他不在家裏吃飯’的‘在’,都是動詞”(25 頁)。

王先生的定义里的“可以用语音停顿隔断”，作为一个标准来说，还有不够明确的地方。它一方面可以解释为“虽然实际上没有隔断（中间没有逗号），但是可以隔断”，另一方面可以解释为“实际上已经隔断（中间有逗号）”。因此处理下边这样的句子就会有分歧：

1. 你不问我替你问。（赵树理）
2. 下雨我就不去了。

如果必须实际上隔断，没有隔断就不能算复句，这两句当然是单句。如果承认虽然没有隔断，但是可能隔断的就可以算复句，这两句又可以是复句了。

吕叔湘先生对单句复句的区别，看来也很重视语音停顿。他认为动词联合起来作谓语，“倘若中间有隔断，那就也可以把它当做复合句看待了”（语法学习 77 页）。《语法学习》里举作复句的例子，没有一个不是分句间有停顿的。但是我们还不能就此认为吕先生的主张是凡复句必有停顿，因为在下边这样的例句里，尽管没有停顿，吕先生还是倾向于当做复句处理的：

1. 他端起碗来就喝。（语法学习 73 页例）
2. 他散了会才走的。（又 73 页例）

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来理解吕先生的意见：凡是两个谓语之间有停顿的是复句<sup>①</sup>，没有停顿的却不一定不是复句。什么情况下没有停顿而又是复句呢？吕先生没有明确地指出，我们只能就他的举例和说明来推测。从下面的两组句子的对比中可以找到线索：

他走过去开门。	} 单句（连动式）	他端起碗来就喝。	} 复句
你喝一口嘴。		他散了会才走的。	

关键大概就在“就”和“才”这两个副词上，因为这一类副词是有关联作用的。就上面举的例子看来，除了语音停顿之外，“关联词语”也是吕先生采用的一个标准。这样，吕先生就与王力先生的看法接近了。王力先生把后者看成“紧缩式”，而“紧缩式”是属于复句范围的。不过王先生的“紧缩式”包括“他出去开门”，吕先生的复句里是排除这一类的。

但是什么是关联词语呢？我们从吕先生的著作里找不到详细的说明。关联词语的范围不能确定，就给单句复句的划分带来不小的困难。

从上边的分析里，我们归纳出吕先生的标准是：A) 语音停顿；B) 关联词语；C) 结构。第 3 个标准吕先生没明白提过，但是他的著作里从未把几个独立的主谓结构并在一起，还当作单句，因此我们也说它是一个标准。

语法小组比较明白地提出复句和单句的界限（见本刊 1953 年 6 月号）：

- 1) 两个主谓结构连用是复句，但是主谓结构作句子成分时不算复句。
- 2) 一个主语管几个谓语，有的在主语前头，有的在主语后头，一律算是复句，如“听到这个，他心中转了个弯，觉出在哪儿似乎有些不对的地方”。（老舍）
- 3) 要是并列的谓语都在主语后头，中间有停顿，也算是复句，如“吴天宝人小，器量可大”（杨朔）；可是中间没有停顿，就不必说是复句，如“张先生胆大心细”。

此外并指出，复句当中的分句，主语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可以全说出来，也可以不全说出来。

语法小组也同样注意意义关系和关联词语，他们说：“复合句中分句的连系，有时候是以意会的，叫做‘意合法’”；“有时候用连接成分来呼应”。另外，与王力先生的看法相近，也认为介词结构用在主语前边而又有停顿的时候，是复句。如：

1. 在祥子眼里，曹先生必是孔圣人。（老舍）
2. 对车座儿，对巡警，对任何人，他决定不再老老实实的敷衍。（老舍）

从上面提出的标准来看，语法小组是相当重视语音停顿的。如果是并列的谓语，就完全根据这个标准来决定。这一点比吕叔湘先生要明显得多。可是对下面的句子却作了不同的处理：

① 参看第 2 页注②。



1. 他买了十个煎包兒,里边全是白菜帮子,外边又“皮”又牙礮。(老舍)

2. 这是王先生,文学好,好得很。(老舍)

上面这些句子中間都有停頓,而且停頓的兩边有的是主謂結構,有的可以补出主語,但是語法小組却把它們算作兼語式的單句(見本刊 1953 年 4 月号)。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語法小組的标准是: A) 語音停頓; B) 結構; C) 意义关系。他們虽然提到关联詞語(連接成分),但是并不把它当作划分單句复句的条件。

張志公先生比較重視結構的完整(主謂齐备),他在《汉语語法常識》里(256 頁)說:

由几个小句子連成的大句子叫作‘复句’;复句里的每个小句子叫作一个‘分句’。分句大都是个完整的主謂仿語。換言之,一串主謂仿語連在一塊兒,表达一个比較复杂的意思,其中每个仿語都不作另一个仿語中的任何成分的,就叫作复句。

这可以表明有兩個划分标准: A) 意义方面——單句的意思簡單,复句的意思比較复杂; B) 結構方面——單句只由一个主謂仿語組成,复句大都由兩個或更多的主謂仿語組成。張先生講到复句的結構形式的时候,又提出各分句用不用主語的問題。从他举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像下面这些情况都算是复句(汉语語法常識 261—264 頁):

1) 分句的主語相同,只有第一个分句里有主語,下面分句的主語省掉。

2) 分句的主語相同,第一个分句的主語省掉,第二个分句里有主語。

3) 分句的主語相同,各个分句里都有主語。

4) 分句的主語不相同,各个分句里都有主語。

5) 分句的主語不相同,第一个分句里有主語,第二个分句的主語因为已經包含在第一个分句里(但不是主語)而省掉。

但是,对于第 1 种情况,張先生又指出,“这种复句在形式上跟單句一样,所以也可以認为主語之下是一个联合成分構成的謂語,或是一个連动式的謂語”。可見張先生認为一个主語后面有几个謂語的句子可以是單句,也可以是复句。而且張先生的連动式結構,里边連用的兩個動詞之間可以“用表示時間連續的副詞,如‘就’‘便’‘再’‘一’‘然后’‘隨即’‘馬上’‘立刻’等”(汉语語法常識 212 頁)。像“他吃过飯就走了”,“你休息一下再走吧”这类句子就更是謂語用連动式的單句了。这一点与呂先生截然不同。

張先生也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比如說明第 5 种复句的情况时,引的例句是:

灯光照着他的兩脚,一前一后的走。(魯迅)

但講名詞后边的修飾性的补足語时,又引过这样的例句(汉语語法常識 196 頁):

他从他的一捆木匠傢具里边抽出一条小鋸梁子来,尺半長,一指厚,木头很結实,打起来管保很得勁。  
(赵树理)

說“尺半長”以后都算是修飾性的补足語,既然是补足語,这句就是單句了。就結構来看,說这两个句子一个是复句,一个是單句,分辨起来恐怕是有困难的。

总的說来,張先生的标准主要是結構,語音停頓和关联詞語是不大注意的。

分析了上述五家的見解之后,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划分單句复句的时候,概括起来一共有六个标准,不过各家的着重点各有不同。这六个标准是: 1) 結構(主語和謂語); 2) 意义关系; 3) 語音停頓; 4) 連詞; 5) 連詞以外

	結 構		意义 关系	語音 停頓	連詞	其他 关联 詞語	謂語的 多少和 繁 簡
	(1)	(2)					
黎錦熙	+	+	+		+		+
王 力		+	+	++	+		
呂叔湘		+	+	+	+	+	
語法小組		+	+	++	+		
張志公		+	+		+		

“+”表示应用这个标准,“++”表示特別重視这个标准。



的关联詞語 6)謂語的多少和繁簡。为了比較各家所用标准的异同,上頁列一張表。“結構”一欄分作兩項,主張分句要主謂俱全的用(1)表示,主張分句可以省略主語的用(2)表示。<sup>①</sup>

## 二

从上面对各家划分單句复句的办法的介紹里,我們可以看到,在單句复句的划界方面,是还存在着不少問題的。——但是問題还限于上面提到的那一些。下面是我們从不多的几篇文章里找来的一些句子,这些句子像是具有既可看作單句又可看作复句的性質,因而即使已經有了以上六个标准,断定是單是复也还会有不少的困难。以下分作几个类型來說明。

1. 他們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張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毛澤东)
2. 两个騙子…用手做着穿衣服的样子,算是給皇帝穿上了新衣服。(叶聖陶)
3. 公差…催人上路,像屠夫赶牛羊一样。(叶聖陶)

以上这一組句子表示主謂結構作主語的單句和主謂結構作分句的复句之間还存在着划界問題。这些句子,無論从意义方面、結構方面看、停頓方面看,都可以有兩種分析方法。比如例1,可以說“他們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張科学和民主”是主謂結構(包含兩個謂語)作“是很对的”的主語,意思是“他們…民主,这是很对的”。这样分析,这一句就是單句。可是也可以說“他們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他們]主張科学和民主,[他們]是很对的”。这样,一个主語管三个謂語,或者一个句子有三个分句,不就是复句了嗎?例2,可以解釋为“两个騙子…用手做着穿衣服的样子”,这样做“算是給皇帝穿上了新衣服”,“两个騙子…用手做着穿衣服的样子”是主謂結構作主語,这一句是單句。如果解釋为“两个騙子…用手做着穿衣服的样子,[他們]算是給皇帝穿上了新衣服”,这一句又是复句了。例3,可以解釋为“公差…催人上路”,那个凶暴样子就“像屠夫赶牛羊一样”,“公差…催人上路”是主謂結構作主語,这一句是單句。但是也可以解釋为“公差…催人上路,[他們]像屠夫赶牛羊一样”,这一句又是复句了。究竟是單句还是复句呢?

4. 我們希望你们到这里来,咱們共同享受这些东西。(叶聖陶)
5. 他…就看見草地上放着好些衣裳,花花綠綠的,件件都那么漂亮。(叶聖陶)
6. 孟姜女想丈夫在北方,北方的風还要厉害得多。那里不但風大,而且滿地冰雪。寒風和冰雪圍住丈夫,他帶的几件衣服早該破爛不堪了,那怎么受得了?他怎么能得到新的寒衣呢?他沒法得到,除非自己給他做。他怎么能穿上自己給他做的寒衣呢?他沒法穿上,除非自己給他送去。(叶聖陶)

以上这一組句子表示一串主謂結構算作宾語还是算作分句,在單句复句划界上是会引起困难的。象“想、說、看見、听見、知道、希望、觉得、以为”等等動詞后边,只有一个主謂結構,說它是動詞的宾語,是沒有問題的;如果后边有一串主謂結構,中間又有停頓,情况就复杂了。比如例4,“你們到这里来”是“希望”的宾語,不成問題,“咱們共同享受这些东西”算不算宾語呢?这就值得考虑了。說“希望”的是“你們到这里来,咱們共同享受这些东西”,那就是复句的結構作宾語,全句是單句。但是也可以說“我們希望你们到这里来”是一个分句,“咱們共同享受这些东西”是另一个分句,說明前一个分句的目的,意思是“我們希望你们到这里来”为的是“咱們同共享这些东西”,这样,全句就是复句了。例5,“看見”以下都可以算“看見”的宾語,全句就是單句。我們也可以說,“看見”的只是“草地上放着好些衣裳”,后边的話是作者的描述,說“[这些衣裳]花花綠綠的,件件都那么漂亮”,这样,全句有三个分句,又成了复句了。例6包括好些“句子”,單就第一句看,似乎很清楚,“丈夫在北方,北方的風还要厉害”是“想”的宾語,这句是單句。可是,如果从意义上看,从“丈夫在北方”起,直到“除非自己給他送去”,这一

<sup>①</sup> 胡附、文煉兩先生在《現代漢語語法探索》里,对区分單复句的原則提出五点意見(15頁),可參看。

大排都是所想的事，好不好都算實話呢？答案恐怕是：那不行，下邊各自成句，只能“各自為政”。那末“北方的風還要厲害”也是一個完整的主謂結構，為什麼一定要受“想”的“統轄”而不能獨立呢？為什麼不能算是分句呢？如果可以，全句不又成了復句嗎？

7. 寫文章，做演說，著書，寫報告，第一是大壹貳叁肆，…（毛澤東）

8. （青年小伙子們，）有事沒事總想跟小芹說句話。（趙樹理）

9. 兵士…象圍野馬一樣，用長槍截逃跑的人。（葉聖陶）

以上這一組句子表示一個結構算作狀語或者算作分句是會引來劃分單句復句的困難的。比如例7，如果解釋為“在寫文章、做演說、著書、寫報告的時候”，這是表示時間的狀語，這一句就是單句；如果解釋為“無論寫文章，做演說，著書，寫報告”，這是表示無條件的關係的分句，這一句就是復句。例8，也是這樣，“有事沒有”可以解釋為“有事沒事的時候”，這是狀語，因此全句是單句；也可以解釋為“無論有事沒事”，這是承前省主語的分句，因此全句是復句。例9，可以解釋為“兵士…象圍野馬一樣地用長槍截逃跑的人”，“象圍野馬一樣”是狀語，這一句就是單句；可是也可以解釋為“兵士…象圍野馬一樣，[他們]用長槍截逃跑的人”，這樣，一個主語管兩個謂語，就是復句了。

10. 揭穿這種老八股、老教條的丑態給人民看，號召人民起來反對老八股、老教條，這就是五四運動時期的一個極大的功績。（毛澤東）

11. 一個人七歲入小學，十幾歲入中學，二十多歲在大學畢業，沒有和群眾接觸過，語言不豐富，單純得很，那是奇怪的。（毛澤東）

12. 一部分人繼承了五四運動的科學的和民主的精神，並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加以改造，這就是共產黨人和若干黨外馬克思主義者所做的工作。（毛澤東）

13. （但在共產黨內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發生偏向，馬克思主義沒有拿得穩，犯了形式主義的錯誤，這就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這是形式主義向“左”的發展。（毛澤東）

以上這一組例句表示具有所謂“外位”的單句與復句間也存在着劃界的問題。例10，從“揭穿”到“老教條”，中間有逗號的停頓，逗號兩邊的話都是複雜謂語；因而用停頓和結構兩個標準，已經可以說是包含兩個分句的復句。——全句自然更是復句。可是我們都承認全句是單句，這是由於首先用了“意義關係”這個標準：“揭穿…老教條”就是下邊的“這”所代的，它是“外位”，與作為下句主語的“這”是一回事。可是再往下看，還是照這個路子走，後面三句就有問題了。例11，“那”所代的是什麼呢？至少有兩種可能：一種是“一個人…單純得很”，另一種是“語言不豐富，單純得很”。要是前者，全句是單句；要是後者，全句是復句。這裡的問題是很難找到可以說服一切人的標準，斷定必是前者，或者必是後者。例12，“這”字所代的是什麼也成問題。先從後面看，“這就是…所做的工作”，“這”分明只能代前邊的屬於“工作”性質的事物。“繼承…加以改造”是屬於“工作”性質的事物，沒問題；“一部分人…加以改造”就不大像。如果“這”所代的只是“繼承…加以改造”，從“繼承”到末尾自然成了單句，可是剩下“一部分人”怎麼處理呢？例13，有兩個“這”，無論哪一個，從意義關係方面着眼，代前邊的什麼也不止一種可能。那麼，斷定全句屬於什麼類型，各人的看法也就可能背道而馳：認為後一個“這”代前邊的全部，全句是單句；認為兩個“這”都不是代前邊的全部，全句是復句。

14. 咱們明明能夠張嘴說話，發表意見。（葉聖陶）

15. 你不能誰也不靠，自己想怎麼着就怎麼着嗎？（葉聖陶）

16. 它用嘴刷刷這根毛，刷刷那根毛。（葉聖陶）

17. 他們慌手慌腳地洗這個，炒那個。（葉聖陶）

以上這一組例句表示單句復句難於劃界的另一種情況。給單句復句劃界，“結構”是個重要的標準；可是實際用這個標準的時候，還有因地制宜的性質。比如“我們愛祖國，愛人民”，不少人說是復句，“人人希望五谷豐收，國家太平”，大家都說是單句。這等於承認，“我們”不能跳過去



統轄“愛人民”，“愛人民”前邊還有省略的“我們”；“希望”能夠跳過去統轄“國家太平”，“國家太平”前邊沒有省略的“[人人]希望”。可是，有什麼標準能夠斷定某一個詞或成分能跳過去統轄或不能跳過去統轄呢？比如上邊的例14，“能夠”是助動詞，它能不能跳過去統轄“發表意見”呢？能，全句是單句；不能，全句是複句。可能傾向於“不能”的人多一些。如果這樣，請看例15，“誰也不靠，自己想怎麼着就怎麼着”夾在“你不能”和“嗎”當中，聯得很緊，又很像個單句，怎麼辦呢？例16，“用嘴”是連動的前一個動作，能不能跳過去統轄“刷刷那根毛”呢？第17句，“慌手慌腳地”是狀語，能不能跳過去統轄“炒那個”呢？顯然，如果不能斷定“能不能”，全句算單算複也就難於決定了。

18. 要正經除非自己鍋底沒有黑。(趙樹理)

19. 我受了傷為什麼不給治？(葉聖陶)

20. 我們無論做什麼事都要看情形辦理，(文章和演說也是這樣。)(毛澤東)

21. 就是世界上最快的馬也要落在背後。(葉聖陶)

以上這一組例句表示單句複句難於劃界的又一種情況。給單句複句劃界，“停頓”是個重要的標準；因為複句包括的至少是兩個分句，分句是“單句”，完了當然要有停頓。如果是這樣，我們似乎就可以說，有停頓的雖然未必不是單句，沒有停頓的卻決不能是複句。但是這個重視停頓的辦法也有問題，因為它會撲滅了劃分單句複句的另外的標準——結構、連詞、意義關係。比如上邊的例18，沒有停頓，可是說它是單句，“要正經”和“自己鍋底沒有黑”之間的結構關係不好說；而且用了一貫連分句的連詞“除非”，從意義關係方面看也不是單句。那麼，不得已，放寬了停頓這個標準，把這類句子算作複句怎麼樣呢？例18象是可以，因為可以說成“你要正經，除非自己鍋底沒有黑”。例19雖然沒有連詞，可以說成“我受了傷，你為什麼不給治”，也象是沒有問題。但是例20就有些不好辦，必須把前一個分句從後一個分句的肚子裡拉出來，才能改成“無論做什麼事，我們都要看情形辦理”，一個分句在另一個分句的肚子裡，這是一種什麼複句呢？再看例21，“就”意義等於“即使”，應該算作有連詞，可是變成複句有困難，它本來就不是說“即使它是世界上最快的馬，它也要落在背後”，而實在是“世界上最快的馬也要落在背後”這個主謂結構前邊加上“即使”，強調一下。這樣，從停頓方面看，它是單句；從連詞方面看，它是複句；從結構方面看，單句複句又都不像。

22. 阿Q(兩只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辮根，)歪著頭，說道……(魯迅)

23. “君子動口不動手！”阿Q歪著頭說。(魯迅)

24. 我就吃，吃，吃，(永遠也吃不夠。)(葉聖陶)

25. (…田野，)在那裡飛，飛，飛，轉，轉，轉。(葉聖陶)

26. 雕刻家一邊研究，一邊想像。(葉聖陶)

27. 是我，在這裡。(葉聖陶)

28. 我們請求皇帝，給我們言論自由。(葉聖陶)

以上這一組例句表示用“停頓”為標準給單句複句劃界還會有另外的問題。一個主語後邊不止一個動詞，即所謂“連動”，如果兩個動作間有停頓，有不少人傾向於把後一個動作看作一個分句。這樣，上邊的例22自然是複句，“歪著頭”是一個分句，“說道”是一個分句；例23自然是單句，“歪著頭說”是連動。一個逗號應否有這樣大的作用，是值得懷疑的。例24和例25也是這樣，如果承認逗號有這樣的大力量，前一句就是包括三個分句的複句，後一句就是包括六個分句的複句：這跟常識的體會是有距離的。例26，本來可以是聯合結構作謂語，只因為中間有個逗號，也就成了複句。例27和例28，如果沒有逗號，是兼語式，很容易處理；有了逗號，算複句，就得硬湊成“這是我，我在這裡”，“我們請求皇帝，皇帝給我們自由”，事實上，這樣別扭的話是沒有的。可是話又說回來了，算複句不合適，就算單句如何呢？這顯然就等於承認停頓是無關緊要的一個標準，一連串的麻煩也就隨着來了。

29. “列傳”么，这一篇并非和許多閩人排在正史里；（“自傳”么，我又并非就是阿Q。說是“外傳”，“內傳”在哪里呢？倘用“內傳”，阿Q又决不是神仙。）（魯迅）
30. 油煎大头魚，未庄都加上半寸長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細的葱絲。）（魯迅）
31. 很命一咬，劈的一声，（又不及王鬚响。）（魯迅）
32. （老园丁举起剪刀，）喀嚓喀嚓，剪下一大把玫瑰花苞。（叶聖陶）
33. 一个人走上銅像下边的台阶，高高的顴骨，犀牛嘴。（叶聖陶）
34. （跳累了，）就站在象牙的橫棍上歇一会儿，或者这一根，或者那一根。（叶聖陶）
35. 外行夸奖一百句，不着边兒，不如內行的一句。（叶聖陶）

以上这一組的例句与前几組的例句有些分別：前几組的情况还比較單純——这样看是單句，那样看是复句；这一組的，情况更加复杂，或者更加模糊。比如例29，“列傳么”比照后边的“說是外傳”和“倘用內傳”，應該是分句；可是不往后边看，說它是分句就不会有人同意。但是，不是分句是什么成分呢？显然，搞不清“列傳么”的性質，我們就沒法断定“列傳么…在正史里”是單句还是复句。例30，“油煎大头魚”，算分句，与下一个分句的意义关系不好說，等立复句里沒有这样的，主从复句里也沒有这样的。不算分句，算什么成分呢？算主語，去掉逗号，与“未庄…”連不上。算狀語，与“加上…”連不上。例31的“劈的一声”，例32的“喀嚓喀嚓”，从停頓和意义关系方面看，可以算分句，可是这样的分句独立性太弱，站不住。算狀語也有困难，“劈的一声”不能修飾“咬”，“喀嚓喀嚓”意思分明等于“剪”。究竟應該怎么分析呢？例33，“高高的顴骨，犀牛嘴”当然是說明前边“一个人”的，像是可以算作謂語，那么就是两个分句。可是这样的分句很怪，与“走上銅像下边的台阶”并列，显得資格很不称。例34，“或者这一根，或者那一根”，可以解釋为修飾前边的“象牙的橫棍”，也可以解釋为修飾“歇一会儿”，还可以解釋为“或者在这一根上歇一会儿，或者在那一根上歇一会儿”的省略。如果是前二者，全句是單句；如果是后者，全句是复句。例35，从意义关系方面着眼，“外行夸奖一百句”和“不着边兒”是主謂关系，合起来是个單句；这个單句和“不如內行的一句”又是主謂关系，全句仍然是單句。从結構方面着眼就不然，可以解釋为“外行夸奖一百句，[話]不着边兒，[这样的一百句話]不如內行的一句”，又是复句了。这里牽涉的問題很不少——靠体会句意，难免人各有見；靠运用各种标准，不同的标准难免获得矛盾的結果。但是有一点是不成問題的，就是：这类的麻煩問題如果不能解决，想分清單句复句是决办不到的。

### 三

給單句复句划界有理論的意义，也有實踐的意义。到現在为止，我們还不能毫無困难地分析連貫的語言。这可能有很多原因，然而其中一个主要的，或者最大的，我們以为就是还不能給單句复句划清界限。

如上所述，可見單句复句的划界問題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这样一个复杂問題的解决，至少應該照顧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要照顧全面。所謂“全面”包括兩种意思，一种是对語言作全面的調查研究（这一点过去作过，但是还不够）；另一种是提出来的解决办法既要本身能够貫通，又要入情入理。其次，还要进一步搞清楚單句的結構或表达方式究竟是怎样，譬如說，除去常說的六种成分之外还可以有什么成分？多种多样的意思都是怎么样表达的？其三，还要对断定复句的标准作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这包括：可能用的标准究竟有哪些；什么标准是主要的或在什么情形之下是主要的；不同的标准不能協調的时候怎么办。最后，还要把提出来的办法用各种形式的語言——口头的，書面的，理論的，文艺的，等等——檢驗一下，試試它是否真能够通行無阻。显然，这样的工作不是一兩個人几天之內所能完成的。但是众志成城，只要大家努力鑽研，成功还是并不太难的。



# 談談包孕句和單句復句的關係

曹伯韓

出版較早的漢語語法書是把包孕句劃在復句範圍之內的。黎錦熙《新著國語文法》分復句為三類：等立復句、主從復句和包孕復句。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把上述的復句叫繁句，繁句下再分“狹義的繁句”（就是包孕句）和“復句”（就是等立復句和主從復句）。王力《中國語法理論》就有些不同，強調包孕句和複合句（就是等立復句和主從復句）的分別，沒有指出它們的共同點。近年新出版的語法著作，如呂叔湘、朱德熙合著的《語法修辭講話》，張志公著的《漢語語法常識》等，都把包孕句劃在單句範圍里面，連包孕句的名稱也取消了。

包孕句是怎樣的一種句子呢？《新著國語文法》這樣說：

兩個以上的單句，只是一個“母句”包孕着其餘的“子句”，這種復句叫“包孕句”，又名“子母句”。被包孕的子句，只當母句里邊的一個“詞”看待。單就子句方面的性質和職能可分三類：——可以說就是三種短語的擴張。（1）用作名詞的子句（2）用作形容詞的子句（3）用作副詞的子句。

這本書舉的例句有：

1. “他不來”是一件怪事。
2. 我不知道“他往那里去了”。
3. 易卜生的長處就是“他肯說老實話”。

——以上加引號的是用作名詞的子句。

4. “品質優良”的學生很不少。
5. 有一個學生，“品質很優良”，下廠學習去了。
6. 他覓了一家客店，“房子也還整潔”。
7. 西湖在中國可算是“風景最優美”的了。
8. “我現在所住”的房子還不壞。

——以上加引號的是用作形容詞的子句。

9. 三個人，“你一句，我一句”，說個不了。
10. 一輛汽車“風馳電掣”的過去了。
11. 叫一聲請，一齊舉箸，却如“風卷殘雲”一般，早去了一半。
12. 很明亮的電燈照得“黑夜和白晝一樣”。

——以上加引號的是用作副詞的子句。

以上12個例句，其他語法學者未必全都承認是屬於同類的。如第5、6兩句，按照《中國語法理論》的看法，就是既可以看做含有准次品補語，又可以看做複合句積累式之一種的。<sup>①</sup>第10句似乎也不是包孕句，因為“風馳電掣”這個成語在白話文中可以當做一個詞，不必當子句來分析。不過我們暫時還是按照《新著國語文法》的看法說下去罷。

按照它的說法，包孕句和其他復句一樣，是由兩個以上的單句<sup>②</sup>構成的，但是和其他復句有分別。包孕句和等立復句的分別是明顯的，因為構成等立復句的幾個單句是平等的，而構成

① 參看該書上冊216頁。

② 這裡用“單句”這個名稱，是欠精密的。“單句”是一種獨立的句子。被包含的“單句”應該另起一個名稱，如“句子形式”、“主謂結構”等。“子句”也可以擴大含義作為這個名稱。我記得小時候在學校里念英文文法，clause就譯成“子句”，它是包括《新著國語文法》中所謂“子句”“母句”“主句”“從句”“分句”的總稱。我覺得“子句”這個名稱比較簡單明了。至于幾種不同的子句，似乎可以分別稱為“內子句”“外子句”“主要子句”“從屬子句”“平行子句”等。



包孕句的几个單句不是平等的。但是構成主从复句的几个單句也不是平等的，那又怎样和包孕句分別呢？《新著國語文法》这样說：

附在述語前的副詞句，大抵以表“性态”的为限；因为性态副詞乃是副詞的中堅，副詞句就是直接从副詞放大的。至于表“時間”“原因”等等关系的子句，却另列入“主从复句”一类中；它們对于全体的关系虽与副詞句完全相同，但不是直接脫胎于副詞，多半是从“介詞与所介的副位”放大的，所以叫“从句”（对正句言，亦可叫“副句”），可不属于这种副詞句了。

另一个地方还說：

須知主从句的关系是主句統率从句，从句跟随主句，兩者还是异体的；不像包孕句，母句包孕子句，是合体的。

以上的解說牽涉到对副詞的看法問題。王、呂諸家是把所謂性态副詞划归形容詞範圍的。可是这种分歧并不影响对句子成分的分析。大家都承認謂語前头可以有一种修飾成分，就是現在通称的狀語。《新著國語文法》中所謂副詞句，意思是指当作狀語用的子句；所謂副句，就是当作狀語用的从句。<sup>①</sup>問題只在于他們是不是公認这种“副詞句”的东西为包孕句的标志之一。《中国語法理論》上册第 111 頁上說明复合句和包孕句的分別是这样說的：

(1) 包孕句里，只能包含着首品句子形式和次品句子形式。

(2) 复合句里，它能包含着末品句子形式和等立的句子形式。

所謂末品句子形式就是当作狀語用的句子形式，实际上就是指的从句（副句），沒有包括“副詞句”。因为它說“中国語的末品句子形式也往往是直接地放在其所修飾的句子的前面”，并举“你死了，我做和尚”做复合句的典型例子。<sup>②</sup>像前面 9—12 各例句，末品句子形式是夾在它所依存的句子形式的中間而不在它的前面的，这种句子究竟應該归于哪一类，这本书沒有談到。不过就“往往”这个詞的含义看，它就暗示了这种句子的存在；可能是認為这种例子不多，不是典型性的，就不去考虑它了。

虽然各家当初对包孕句性質的看法就有些小差异，但大体上是一致的。各家都強調子句和母句合体、子句只当母句的一个詞这些特点。而且当时一般語法書都沒有把包孕句划在單句範圍里面，理由就是包孕句包含兩個以上的句子形式，而單句只應該包含一个。另方面，包孕句虽然和等立句、主从句不同，但是在包含兩個以上句子形式这一点上是相同的，我想这也就是当时多数人把这三种句子共同列入复句或繁句中的理由。

那么为什么后来有些語法学家要把包孕句划在單句範圍之內呢？他們的理由可以从《語法修辭講話》中的一段話看出来。这段話是拿“我們必須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这个句子作例子来解釋“句子形式”的，它說：

在上一节的例句里有“自己不懂”四个字，也能分成主語（自己）和謂語（不懂）兩部分，这算句子不算呢？这不算是句子，因为它被包含在一个句子里头，作为那个句子的一个成分。它跟分句不同，分句是半独立的，它是完全不独立的。我們管它叫“句子形式”，意思是它只有句子的形式，沒有句子的作用。一个句子里头包含一个或几个句子形式，还是一个簡單句，不算复合句。<sup>③</sup>

关于这个理由还可以补充三点。第一点是这种被包含的句子形式（子句）是句子的一个成分，作用等于一个詞；第二点是子句和母句之間語音不停頓，特別是用“的”联系起来的子句和下面的中心詞分不开；第三点是子句往往意义不完整。关于这三点，可以拿“魯迅在革命文化的崗

① 如果說从句是修飾整个主句而不是修飾其中的謂語的，而狀語又只是修飾動詞、形容詞这一类的中心詞的，那么这里当作狀語用的說法也有問題。不过《新著國語文法》是認為从句和副詞句，在对全体的关系上是一样的。

② 引用語見該書上册 69 頁，例句見 112 頁。

③ 这段話在这本书的第 7 頁上。从这里可以看出“句子形式”这个術語的含义在这本书上就比《中国語法理論》上的要窄狹得多，它相当于《新著國語文法》中的“子句”。

位上进行的斗争,始终是我们最好的模范”做例句。在这个句子里,“鲁迅在革命文化的岗位上进行”这个子句缺少宾语,它的意义就不是完整的。<sup>①</sup>

主张把包孕句划归单句范围的往往强调汉语的特点,要避免模仿英语语法。可是英语包孕句中的子句也是不独立的,和母句之间语音也往往不停顿,意义也不一定完整。例如,The house we lived in has fallen down. 这个句子中间包含的 we lived in 是一个完全不独立的句子形式;因为 in 的后面缺少宾语,它的意义是不完整的;就语音停顿说,我们也看不出有什么停顿的必要。英语和汉语包孕句的最大差别在于作定语用的子句所居的次序,英语在中心词的后面,汉语在中心词的前面。这种差别并不影响两种语言中包孕句的主要特点的共同性。根据这些特点,包孕句是应该和复合句严格地分开,可是另一方面,似乎也不能把它归在单句范围之内。

语音停顿虽然和语句结构有关,但是它们并没有完全一致的关系。因为在较长的句子里,为了吐气的缘故,往往在一个词组后面也可以停顿,甚至动词和宾语之间也可以停顿,并不一定要在半独立的句子形式后面才停顿的。包孕句中,只有作定语用的子句语音不停顿,作主语或状语用的子句都是有停顿可能的。例如下面的句子:

要使士兵们相信\*,既不威胁英国\*,也不威胁美国\*,而其台湾岛竟被美国强占了的中国是侵略者,而另一方面\*,强占了台湾\*,并将军队推向中国边境的美国倒是处于防御方面\*,这是很困难的。<sup>②</sup>

从第一个\*号到最后的\*号是以一个复合句而被包孕,作为动词“相信”的宾语,这里是动宾之间语音停顿了。“要使士兵们…防御方面”这个包孕句本身,又作为外位语而被包孕于“这是很困难的”这个句子形式之内(“这”字指代外位语),这里是外位语和主要句子形式之间语音有停顿。又,上面第二、三、四、五\*号处的语音停顿,都不过是词组的标志。凭语音停顿不停顿来分别单句和复句,似乎理由不充分。

被包孕的句子形式意义不完整,英语也有同样的现象,上面已经说过,但英语语法并没有因此就把包孕句划归单句范围。当然,英语的子句有 finite verb 的形态做标志,这个问题容易解决,汉语没有这个条件,困难一点;可是主语和谓语还是看得出来的,我们不必因为某些子句缺乏谓语中的连带成分就否定了子句的存在,更不必因为这种子句的不独立性就把它当作词组来处理,而把包含这种子句的句子划归单句范围。

分别单句和非单句,我以为从它所包含的句子形式是一个还是不止一个这一点上来看,是最明确的。至于非单句中有一种包孕句,它的结构紧凑,和单句很接近,和其他的非单句有很大的距离,这也是事实,因此我们不当把非单句笼统称为复句,而应该把包孕句从复句(或复合句)分开,把它看做既不是单句也不是复句的一种句子。重复说一句,包孕句在所含的句子形式不止一个这一点上,是和复句相似的,在它的内部结构紧凑这一点上是和单句相似的,这也就是说,它和复句及单句都有不同的地方,因此它应该独立地成为一类。

这样做,我们就完全采用了英语句子分三类的方法。《新著国语文法》没有把包孕句和复合句严格分开,可能也是避免和英语语法雷同,其实这是完全不必要的,我们应当有“实事求是”的精神。

① 引自《初级中学课本汉语第四册教学参考书》,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55页。

② 这个例句引自吕叔湘《语法学习》,79页。作者认为这个句子的基本结构只是一个单句(指“这是很困难的”),可是它的组织是很复杂的。



# 論漢語劃分詞類的標準

——評傅子東先生關於漢語詞類的理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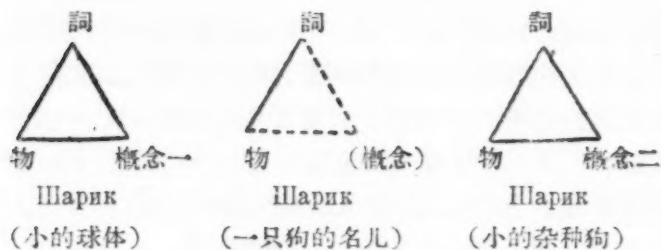
徐仲華

傅子東先生最近在《中國語文》發表了《詞類的區分和辨認》一文。他在批判了各種具有代表性的關於劃分詞類標準的論點以後，提出了自己的主張，認為“意義”是區別詞類的“唯一”標準。

按照意義來劃分漢語詞類，本是由來已久的作法，可是這條老路在今天幾乎是語法學者一致放棄了的。傅子東先生現在又提出並且堅持這個作法，這就值得我們加以考慮了。

## 一 意義標準和語法範疇的矛盾

大家知道，客觀實在、概念和詞三者關係是非常密切的，但是這些關係不是同一的。蘇聯語言學家列弗瑪茨基《語言學概論》中曾經說明這一點。他畫了一幅圖來表示①：



詞和概念既然不是一件事，那麼，給詞做語法上的分類和給概念分類就不應該混為一談。當然這也不等於說劃分詞類與意義無關。從來也沒有人否認過詞義和詞類的關係。可是，為了證明劃分詞類不能割斷意義，傅子東先生不止一次地引証了謝爾巴的話：“與其說因為它們變格，咱們才把 стол (桌子) медведь (熊) 等等列入名詞，無寧說是因為它們是名詞，咱們才叫它們變格。”馬克思主義語言學者雖然不否認這一點，但是却不同意把謝爾巴的理論斷章取義地來理解。謝爾巴在指出詞義與詞類的密切關係的同時，還明確地提出來：“不言而喻，這些範疇要有一些外部表現形式，如果沒有外部表現形式（着重點是我加的——仲華），那麼，在語言系統中也就沒有這些範疇。”②顯然地，傅子東先生是完全忽略了這一點。

只有概念範疇而沒有外部表現形式，是不能叫做語法範疇的。漢民族早在幾千年前就有了男女兩性的概念③，但漢語名詞並沒有性的外部表現形式，因而也就沒有性的語法範疇。這是中外語言學家所不能否認的事實。古俄語中數詞不是一個獨立的詞類，因為那時俄語的數詞還沒有足夠的外部表現形式④，但是任何愚蠢的人也不會由此得出結論說，一千年以前俄國民族還沒有數的概念。

如果傅先生堅持劃分漢語詞類只有意義一個標準，就沒法解釋上面的現象，同時遇到下面的情形也就必然沒法處理。漢語說“我欠他錢”，英語說 I owe him money, “欠”和“owe”都是動詞；而俄語說 Я должен ему деньги, “должен”却是形容詞。⑤這是什麼緣故呢？不承認從詞的外部表現形式來區分詞類，當然沒有方法解釋這個客觀實在。

這種外部形式也就是語法標誌（語法標誌在句法上是詞類、詞序、虛詞，而在詞法上則是詞的形態和結構關係以及句法功能），它是不能脫離意義的，因為它們是意義的外部表現形式，形式和內容是互相依存，而不能單獨存在的。但是我們研究語法構造，不能不從語法標誌上出發，而從語法標誌出發也並不等於把“語法和邏輯對立起來”，象傅先生所顧慮的那樣。⑥語法學如果不研究語法的外部表現形式（自然這種研究是要結合內部意義的），只是在那裡分析什麼“雲鬢”的“雲”是“彩雲”，“雲集響應”的“雲”是“烏雲”⑦，那才真

① A. A. Реформатский: «Введение в языкознание», 36—37 頁。

② 謝爾巴:《論詞類》，見《漢語的詞類問題》第二集，193 頁。

③ 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66 頁：“八卦的基礎本來是建立在男女兩性的象徵，在上面已經說過。所以易經的觀念就根本是陰陽兩性的對立”。

④ 參見蘇聯專家阿列克先柯《俄語語法史》，195 頁。

⑤ 岑麒祥:《語法理論基本知識》，24 頁。

⑥ 參見《漢語的主語賓語問題》，77 頁。

⑦ 見《中國語文》1956 年 10 月號，26 頁（以下所引未注明出處的傅先生話，均見本刊 1956 年 10 月號至 12 月號）。

是可慮的呢！如果我們還承認斯大林所說“文法把詞和語加以抽象化，…文法在這一方面很象幾何學”的話是正確的，那麼，就不應該懷疑語法學的目的在于把語言的語法構造加以抽象概括，而指出形式的規律。這種認識在今天說來有它的巨大意義。世界的語言學研究已經日益接近精密的科學。蘇聯語言學已把儘快地製造電子翻譯機器當做自己的任務之一。“這就必須解決一系列的純粹語言學範圍內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將翻譯機器所翻譯的語言的語法構造變成一套規則，並且用一定的電碼來表示這些規則”<sup>①</sup>（着重點是我加的——仲華）。很显然，如果不把語法形式做為語法學研究的主要內容，是不可能完成這一任務的。如果語言學家以詞義的研究代替語法形式的研究，那麼所得的結果只能是“新爾雅”“新釋名”，却不能是語法。我不是說“新爾雅”或“新釋名”是要不得的，而是認為“新爾雅”或“新釋名”的編著是詞彙學家的任務，不是語法學家的任務。

傅先生划分詞類要憑意義的說法，在客觀效果上是否定了漢語的詞類。傅先生說，“光榮”是三個不同的概念，“一指抽象的事物，是名詞，二指事物的性態，是形容詞，三指動作的狀態，是副詞…”。傅先生的話如果是正確的，那麼很大一批形容詞，都將分屬於三類了。例如“方便、快樂、便宜、悲哀、迅速、舒服”等等，哪一個詞不可以說成是代表三個概念的分屬三類的詞呢？

讓我們再看看傅先生自己所分的詞類吧！傅先生果然能拿意義作“唯一的漢語詞類區別的标准”嗎？只看他給副詞、介詞、連詞所下的定義，便可以得到反面的答案了。副詞是“形容或限制名詞以外的詞類”<sup>②</sup>，介詞是“介紹名詞給動詞或其他詞類去指明它跟它們的關係”，連詞是“联接句或讀”（11頁）。請問，這是從詞義來划分的，還是從詞的結構關係來划分的？

從意義出發，把意義當做唯一的標準，不止是你分的和我分的可以不一樣，就是同一個人分的也可以前後不一致。例如，傅先生講副詞在從位時舉例，“人們眼里也再不見有一點淚底痕迹（前兩字都限制不見，不限制見）”（21頁）。可見這裡的“不”，傅先生把它當做副詞了。另外講助動詞時舉了這樣的例子：“這硯台他擎不起了（不能擎起）。”“他說不動了（他不能說了，他說話的嘴不能動了）”（27頁）。可見這裡的“不”，傅先生又認為是助動詞。何以見得“不見”的“不”是副詞，而“不起”的“不”、“不動”的“不”是助動詞呢？何以見得前者表示否定，后者含有“不能”的意思呢？傅先生可能回答說，前面的“不”是用在動詞前邊的，后面的“不”是用在動詞“擎”和“說”的后邊的，這正是位次形態。可是要再問下去，位次形態是語法形式呢，還是概念呢？那恐怕傅先生就要陷入兩難之境了。

從意義出發分析句子，辨認詞類，弄得前後矛盾，不能自圓其說的地方，不止如上面所說的。傅先生講述性名詞時舉了這麼一個例子：“這就是‘選舉議員’的行動”，在下邊括弧內傅先生注明說：“選舉是在偏位的述性名詞，限制行動”（34頁）。在講述性形容詞時，舉例說：“那‘發出白色’的光是最熱的光。”傅先生也用括弧注明說，“限制光”（35頁）。照這樣分析，“發出白色的光”和“選舉議員的行動”應該是相同的構造（依據傅先生說法，“發出”限制“光”，“選舉”限制“行動”）；但是傅先生卻把“選舉”當做述性名詞，而把“發出”認作述性形容詞，這是為什麼呢？可能是由於“光”是名詞，而“行動”是動詞。既然傅先生認為“光榮”可以有三個詞性，為什麼“行動”不可以有兩個？這裡的“行動”為什麼不能是名詞呢？如果可以是名詞，那麼上舉兩個詞組不完全一樣了嗎？為什麼要做兩樣處理？如果堅持由於“行動”是動詞，“光”是名詞，人們就要問傅先生：

（1）何以見得“行動”是動詞，不能是名詞。如果“行動”只能是動詞，那麼為什麼“光榮”不能扣死了是形容詞？（2）為什麼辨認“發出”和“選舉”的詞性要看后面的“光”和“行動”的詞性不同而做不同的處理？如果說“行動”既是動詞，又是名詞，那麼傅先生把“選舉”和“發出”作了不同的解釋就沒根據了。如果認為“行動”一定是動詞，不能是名詞，那為什麼“光榮”可以由於“意義”不同而有三個詞性呢？對於（2）的問題，傅先生也許解釋說，這是根據意義決定的。可是，這是從這句話的語法構造上知道的，還是從每個詞的意義上知道的？如果肯定是前者，“意義作為詞類的唯一標準”的說法就發生問題了；因為詞類、詞序、結構關係實際上正是語法範疇。一方面是口里說“意義唯一”，一方面實際行動卻是“依據語法範疇”，這不是矛盾了嗎？如果肯定是后者，那麼就需要傅先生說明，怎樣從意義上知道意義而又憑意義分析句子辨認詞類。

## 二 概念範疇不能和語法範疇混淆

說到这里，傅先生也可能說我沒有弄懂他的“概念範疇”的涵義。傅先生的“概念範疇”是與眾不同的，因為傅先生的論文中確曾流露出“概念範疇就是語法範疇”這種論點。他在《詞類的區分和辨認》一文最末結語說：“詞的概念、意義或性質（它們是不斷發展的）就是詞類區分的唯一的標準。”什麼是概念、意義或性質呢？照傅先生的解釋是：

① 《當前蘇聯語言學界幾項迫切的任務》，見《俄語教學與研究》1956年第5期，8頁。

② 傅子東：《傅氏白話文法》，8頁（以下僅注頁碼的，均見同書）。



一个客观的实在反映在我们头脑里，形成一个“鳥”的概念，“鳥”这个词指一种可以执行动作的事物，就是它的意义，它指体现出事物一般的具体性的事物，就是它的性质，“事物”是能执行动作的，因此“鳥”这个词可以扮演主词；一个客观的实在反映在我们头脑里，形成一个“飞”的概念，“飞”这个词指一种动作，就是它的意义，它体现出动作一般的具体性的动作，就是它的性质，“动作”是能述说事物主体的（即指动作的词是能对指主体事物的词加以述说的），因此“飞”这个词可以扮演述词。这样的概念（即意义或性质）就是语法概念，决不是王力所理解的概念，这样的概念范畴就是语法范畴，决不是王力所理解的概念范畴。傅先生就在这里明白地宣称：“概念范畴就是语法范畴”。

可是，王力先生认为：“概念范畴和语法范畴决不能混为一谈。”<sup>①</sup>又说：“‘语法范畴’是一般的语法概念，它是以词的变化规则和组词成句的规则为基础，由特殊的形态标志表现出来的。”<sup>②</sup>

这两种说法哪个正确呢？这就说来话长了。

在语言学家和哲学家探讨人类在早期阶段抽象思维的形成时，已经无疑地认识到：“在语言发展的早期阶段上，在语言的前文字时期，并没有把词分为各种品词的字法分类。”<sup>③</sup>但是当时人类的思维中却已具备了具体性、活动、品性和关系的诸种概念。如果把语法范畴和概念范畴混为一谈，就无法解释这种现象。

苏联专家谢尔久琴柯教授也曾经系统简要地解释过语法范畴和逻辑范畴的关系，（逻辑范畴包括概念和判断），他的主要论点是：“语法范畴的系统经常是符合逻辑范畴的系统的。当然，不能说个别的语法范畴和逻辑范畴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完全符合的。”当然，不可以由此得出逻辑范畴和语法范畴是可以分割的结论。但这并不是说“在语法范畴和逻辑范畴之间划了一个等号，把逻辑和语法混为一谈。绝对不是这样。”<sup>④</sup>

J. B. 瑪特維耶娃-依薩耶娃教授对此做了更明确的阐述。她在批判了馬尔的追隨者“混淆了語義現象和語法現象”之后說：

語言的語法結構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它具有它所特有的各种范畴。这些范畴，我們叫做“语法范畴”。“语法范畴”只有当它取得了能够表示它的特征，也就是语法标志时，才能在語言中产生出来。……语法范畴一旦失去了它自己的语法标志，它便不能繼續存在。<sup>⑤</sup>（着重点是我加的——仲华）

上面引証的这些話足够說明，语法范畴和概念范畴不是一位关系。由此可見，王力先生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如果傅先生认为自己所謂的概念范畴不同于其他語言学家所說的概念范畴，而坚持說“概念范畴就是语法范畴”，那就牽涉到科学術語的涵义問題了。科学術語的定义或概念是應該符合公認原則的。我們

的党提倡百家爭鳴，絲毫也不意味着国际通用的学术用語可以随着个别科学家的主观意图随便赋予内涵的意义，若果如此，学术討論將成为不可能的了。因为科学術語也是社会現象，也一样有它的社会性，它不可能脱离科学家的共同認識和共同理解，而随着某一科学家的个人喜好。

### 三 不能濫用本質和現象的公式

傅先生在批判別人的主張以及提出自己的看法的时候，常常提到本質和現象的問題。傅先生曾引用文煉、胡附兩位先生如下的話：

黎先生不承認孤立的詞有分类的可能，这是很对的。

但是說：“凡詞依句辨品，离句無品”，就不妥当了。……“一个人”，“三个苹果”，“好得很”，“笑着”，这些都不是句子，但我們却可以从詞和詞的結合上来区分它們的詞性。再說，如果真是“离句無品”的話，談詞类也只好举整个句子了，可是《新著國語文法》（黎錦熙）在形容詞的类目下是举“一座長桥，那个溫和的太陽”作为例子的。既是离句無品，又何从知道桥、太陽是名詞，一座、長、那个、溫和的是形容詞呢？”（按这段引文傅先生把原文改动了一些，不知道傅先生改动原文的意图何在，我没有給恢复原文的本来面目。按說用引号引原文是不應該任意更动的。——仲华）

文煉和胡附先生的話本来是很有道理的，但是被傅先生用本質和現象的公式一套就輕輕地給放过一边了。傅先生說：“这段話証明句子中的詞同‘詞和詞組合’中的詞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我們不否認是存在的，但不是本質的，而是現象的，”……傅先生接着分析了这些句子，就把唯心主义的帽子給別人扣上了。傅先生結論說：“主張从詞的結構来区分詞类的，与主張詞类的区别仅存于句子中的完全一致，都是否定詞的獨立存在，从詞的功用来区分詞类，無疑地同是用唯心論的思想方法去理解詞的性質的。”在別的地方傅先生也曾說过：“这个說法，是把詞的現象当作詞的本質看待的。”此外，还有：“習慣了用形态区分詞类的印欧語系語言学家一般对于形态背后的东西自然不追根溯源，反把詞的本質弃置一边，認為形态，即詞的本質所表現出來的現象，是唯一的划分詞类的标准。”

傅先生这些論点是值得商榷的。誰都知道，本質和現象是唯物辯証法的基本范畴之一。唯物辯証法一方面反对認為認識以現象为唯一可靠的經驗論，同时也反对單單重視本質而忽視現象的唯理論。毛澤东同

① 《漢語的詞类問題》第二集，44頁。

② 王力：《关于詞类的划分》，見《語法和語法教學》，83—84頁。

③ 見《言語思維意志感情及其他》，49頁。

④ 謝爾久琴柯：《关于創立民族文字和建立标准語的問題》，130—131頁。

⑤ 見《俄語教學與研究》1956年第5期，3—8頁。



志在《實踐論》里告訴我們說：“如果以為理性認識可以不從感性認識得來，他就是一個唯心論者。哲學史上有所謂“唯理論”一派，就是只承認理性的實在性，不承認經驗的實在性，以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覺的經驗是靠不住的，這一派的錯誤在於顛倒了事實。”<sup>①</sup> 希望傅先生在這個問題上考慮一下，把意義當做本質，把語法構造當做現象，認為語法不存在於語法現象之中，而存在於它的背後，然後宣稱“意義是主要的，也是唯一的漢語詞類區別的标准”，這種思想方法是不是與唯理論犯了同樣錯誤呢？

#### 四 依靠詞典也不能解決問題

在討論漢語詞類問題時，傅先生常常提到詞典中的詞。在他的《語法理論》一書中就曾以“從詞典里詞和句子的現象的統一和對立去辨別詞類”作為一個節目。他主張“根據詞典上詞的現象和句子中詞的現象的基本統一來區分詞類。”<sup>②</sup> 傅先生在答辯許紹早先生對《語法理論》的批判時，就是根據詞典的。他說：

許紹早問：“毛澤東時代是中國黃金時代”一句中的“毛澤東”和“黃金”都是名詞，“木人”的“木”是由單音的名詞孳生出來的形容詞。為什麼同是名詞，在句子中執行同樣的職務，一個仍是名詞而另一個又成了形容詞呢？”我可以回答：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編的《國音常用字彙》（45頁）在“木”字下注明：（5）“謂呆笨”，最近它出的《同音字典》（79頁）解為（4）“發僵”，（5）“呆板”，現行通俗的字典如《學文化字典》（12頁）和《新華字典》（85頁）等，無不有這樣的注解，這就是詞性發展的確認。作為“木梯”的“木”，“木”是名詞；作為“呆笨”的“木”，“木”是形容詞。<sup>③</sup>

後來在《詞類的區分和辨認》一文中，傅先生又以同樣的方法證明“從來沒有紅過臉”的“紅”和“圈點檻虎”的“檻”還沒有質變而“圈”又變了的問題。這裡我不禁要請教一下傅先生：第一，詞典是由人編的，編詞典的人是根據什麼來分別變與不變的？是根據意義嗎，如果是根據意義，那不成了循環論證了嗎？詞的分類應該依據意義，遇有爭論以詞典為憑，而詞典的詞類又是根據意義來劃分的。這在邏輯上說得過去嗎？第二，何以見得與“呆笨”同義的“木”是形容詞呢？是因為“呆笨”是形容詞嗎？說“呆笨”是形容詞，又根據什麼呢？當然，照傅先生的辦法，也是根據意義的。根據意義怎能說明“呆笨”是形容詞呢？不要忘了，傅先生曾經說過“光榮”有三個，一是名詞，一是形容詞，一是副詞啊！為什麼“呆笨”是形容詞而不是名詞或副詞呢？傅先生的回答將是字典上沒有這麼注明，那不是又重復了第一問的循環論證了嗎？第三，傅先生的這種論點是否能前後一致的呢，我看未必然吧！傅先生說名詞“團結”是由動詞的“因結”孳生的，《新華字典》上的注上說“緊密結合”，可沒有注着含有事物意義的

解釋，我不知道傅先生怎麼從字典上看出來名詞“團結”是由動詞“因結”孳生出來的。傅先生說：“這小孩真鬼”的“鬼”是名詞，可是《新華字典》上卻偏偏注着：“（3）机灵，能幹（多指小孩）：這孩子真鬼。誰也鬼不過他。”我想不明白傅先生既然拿詞典當做最後依據，為什麼不承認這裡的“鬼”是形容詞，而一口咬定它是名詞。這可以再次證明傅先生的言論和行動是難免互相矛盾的。

其實，詞典里注明的詞類，還是語法家依據詞的語法範疇歸類的結果。詞典里的詞類並不是先天存在的。語法家詳細地觀察了語言現象，收集了大量的語言材料，研究了各個詞的語法範疇、它們的形態變化以及在句子中的功用，然後才能在詞典上注明詞類，講明用法，傅先生既然承認了詞典里注的詞類是在劃分詞類分歧時的标准，實際上也還是和他的“意義論”相抵觸的。

#### 五 詞類研究中的歷史主義問題

在人文科學的研究中，歷史主義是一項重要原則。所謂歷史主義是以辯證法態度研究自然與社會的基本原則之一，它要求聯繫具體的歷史條件，在現象的發生和發展中來研究一切的現象。<sup>④</sup> 我認為列寧下面所說的話應該是語言學的研究必須依據的基本原則。

……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不要忘記基本的歷史上的聯繫，而要對於每一問題都根據某種現象在歷史上怎樣產生出來，以及它在發展中經過了怎樣一些主要階段的情形去觀察，並根據它的這種發展情形去觀察究竟這個現象現在成了什麼。<sup>⑤</sup>（着重點是我加的——仲華）

語法構造具有極大的穩固性，是眾所周知的，我們從甲骨文字的語言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來現代漢語中的一些基本的句型和詞類的區別在甲骨文時代已經存在了。不僅這樣，連複合句、連動式兼語式等較複雜的句型也都有了。<sup>⑥</sup>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古代語法構造和現代語法構造畢竟還是有區別的，這是由於語法雖然有穩固性，但同時也具有變遷的可能性。因而列寧所說“這個現象在現在成了什麼？”就很重要了。如果要過分強調了語法的穩固性而抹殺了語法的變遷的可能性，認為古代語法和現代語法完全一樣，那就是把語言看成靜止的一成不變的了，誰都知道那是不符合辯證法的。如果真沒區別，大學里古漢語和現代漢語開兩門課也沒有必要了。

① 《毛澤東選集》，289頁。

② 傅子東：《語法理論》，39頁。

③ 《中國語文》1955年7月號，23頁。

④ 參見蘇聯大百科全書選譯《歷史、史科學》，1頁。

⑤ 列寧：《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408頁。

⑥ 參見管燮初《殷虛甲骨刻辭的語法研究》，11—13頁。

傅子东先生在研討詞类問題上,和他过去一样,过分強調了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的相同点,而忽視了它們的相异点,或者虽然看到它們的相异点,却反而“以古非今”。例如,傅先生認為:“在古代漢語,数詞后面不須跟單位名詞,如‘人一,犬二,桃花三’,王力的数詞不能作謂語的說法显然不能成立。”事实上傅先生的例子只能导致古今漢語語法的不同的結論,打破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詞类必須完全一样的說法。然而傅先生沒有認識到这一点,却反而用来否定“数詞不單獨作謂語”的論点。

如果按照古漢語的框子去套現代漢語,說出話來,不要成了淑士国的酒保了嗎?滿口的之乎者也,把“你不幫助我”按照古漢語語法構造說成“你不我幫助。”<sup>①</sup>除去瘋人,誰也不會這樣的。

此外,古漢語中許多名詞都可以做動詞用,例如:

又耳量者所受日符。(漢書,外戚傳)

船人疑其有金,目之。(史記,陳丞相世家)

衣敝繻袍,与衣狐貉者立。…(論語,子罕)

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公羊,宣公六年)

門于東門(左傳,襄公十一年)

天久不雨。(禮記)

這些詞的用法今天還能存在于口語中嗎?“門、雨,”這些詞按古漢語應是兼性詞,按現代漢語說應是名詞。“衣、目”古漢語是兼性詞,現代漢語就不是詞而是詞素。是讓古漢語遷就現代漢語呢?還是要現代漢語遷就古漢語呢?顯然兩種辦法都是反歷史主義的。正確的办法只有各還他一個本來面目。

在這一點上,王力和呂叔湘兩先生的處理都是得當的。呂先生說:“咱們討論的是現代漢語的詞类,最好不引古漢語的例子。古漢語里的詞类体系也許跟現代漢語的詞类体系不完全相同,攪在一起沒有好處。”<sup>②</sup>王力先生指出:“古今語法雜揉來做科學研究工作是不對的。如果那樣做,許多問題都得不到正確的解答。因為有些語法形式古今是有矛盾的。…就現代漢語的研究來說,在承認古代語法有殘留形式的同時,必須以現代語法的結構形式為主要的研究對象。”<sup>③</sup>(着重點是我加的——仲華)

就因為語言是在變化着的,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之間有繼承性,兩者不可能沒有相同之點,所以在解釋現代漢語語言現象時,有時非得溯本窮源不可;但無論如何,在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之間划等號是不對的。因而要研究一種完全符合古代漢語又完全符合現代漢語的語法体系是不可能的,首先在划詞上便勢必遭遇困難。如果承認獨立運用是詞的重要特點之一,那麼很显然,古代漢語中許多詞到了現代漢語中就已退居詞素的地位了。<sup>④</sup>詞的確認是語法的起碼條件,如果連什麼是詞都不能規定,那麼一切詞法句法就都架空了。

我說這話的意思完全不包含任何割裂古代現代漢語和漢語的意圖,我是在強調對於語言的認識要有發展觀點。我認為歷史語法的研究應以斷代語法的研究為基礎,而斷代語法的研究,對漢語說還是非常不夠的。脫離斷代語法的基礎而要建立貫通古今語法的語法學,這種想法是愚妄的。

## 六 結束語

在今天,漢語語法的研究中有許多問題都還沒有得到解決,詞类問題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要打算解決這些問題,首先得把什麼是語法學和它的任務是什麼弄清楚。

每門科學都有自己的基本概念或範疇。邏輯學的基本範疇應該是概念、判斷、推理。唯物辯證法的最基本的範疇是:本質與現象、一般與個別、形式與內容、原因與結果、必然與偶然、可能與現實、必然與自由等。語法的範疇應該是詞形變化和組詞造句的一切規律的表現形式。這是語法學研究的通則。即使我們承認漢語缺乏形態變化,也決不能導致用邏輯學的範疇來代替語法範疇的結論。如果這樣,那就等於取消了漢語的語法學。

張志公先生在他的論文里委婉地說:“有人說,學俄文的時候,要先把句子的結構搞清楚了才能懂得它的意思,學漢語的時候要先把句子的意思搞清楚了才能分析它的結構。我們希望,也相信,這句話只能說明漢語語法研究工作還不夠成熟,決不足以說明漢語語法的事實,因為它的真正的意思會引導到漢語無語法的結論上去。”<sup>⑤</sup>

傅子東先生對漢語的認識是有問題的。他在《白話文法》序言里說:“作為思想記錄的工具,國文或國語比拉丁語系文字組織上實在有重大的缺點。”(着重點是我加的——仲華)又說:“為着要克服那些缺點,…尽可能吸取英文組織底優點,…新國語文法,大概可以實現國語底最完備的突變(底稿現留在上海),”(根據原文節錄,標點并無改動——仲華)在這里,傅先生不自覺地污蔑了祖國語言。從這些話里,可以看出來他是受了外國資產階級語言學家的影響,把印歐語的某些形態變化看成高級的東西,漢語缺少這些形態,因而也就“有重大的缺點”了。由於傅先生的這種錯誤

① 上古漢語中,否定謂語句里,賓語要在動詞前邊。例如:《尚書,多士》,“我不爾助”,“無我怨”,“今子惟不爾殺”。

② 《漢語的詞类問題》第一集,138頁。

③ 王力:《語法的民族特點和時代特點》,見《中國語文》1956年10月号,7頁。

④ 參見張壽康《關於漢語構詞法》,見《語法和語法教學》,111頁。

⑤ 張志公:《關於漢語句法研究的幾點意見》,見《語文學習》1956年4月号,23頁。



# 試說表概数的“来”

吕叔湘

表示概数有好几种方法，在数詞或量詞后头加“来”是其中之一。这篇短文要討論的是“来”字的应用范围和它的位置問題。

苏联龙果夫教授在他的《現代汉语語法研究》191节說①：

如果表示的数量是从“一”到“九”，那末詞素“来”就放在类别詞或度量單位之后，例如：“五个来月”，“二年来”。如果关涉到“十”、“百”或“千”，則詞素“来”就放在数詞和类别詞之間，例如：“十来个月”，“二十来年”。只有必須強調所指的数量不超过“十”、“百”或“千”的时候，詞素“来”才能放在量詞的后面，例如：“十个来月”。

这个說法是有問題的。首先讓我們把“二年来”撇开，“二年来”不能跟“五个来月”和“二十来年”相提并論。“二年来”不是二年左右的意思，“二年来”等于“二年以来”，就是从兩年前到現在为止的意思，跟这里所談的概数表示法的問題無關。

現在来看“来”字的位置。龙氏的說法分三点：(1)数量是从一到九的时候，“来”字放在量詞之后。这一点有問題。我們可以說“五个来月”或“三里来路”，可是不能說“\*五个来人”或“\*三本来書”。数量是从一到九的时候，不全都能用“来”。(2)“来”放在“十、百、千”和量詞之間。这是正确的。(3)強調不超过“十、百、千”的时候，“来”又可以放在量詞之后。这又有問題。我們可以說“十来个月”或“十个来月”，“十来里路”或“十里来路”，可是只能說“二十来个月”或“一百来里路”，不能說“\*二十个来月”或“\*一百里来路”。数量是“十、百、千”的时候，不全都能有兩種說法。

可見問題不完全在于“从一到九”和“十、百、千”的分別。量詞的性質也有关系，也許还是一个更重要的因素。类别詞(个、只、塊、件等)和度量單位(尺、斤、亩、里等)显然有区别。为叙述便利起見，讓我們設定两个公式：

数詞 + 来 + 量詞 + 名詞……………(a)

数詞 + 量詞 + 来 + 名詞……………(b)

(a)式适用于任何量詞，只要数詞是末位为零的多位数。这不用举例。

(b)式只适用于度量單位，而且数詞必須是从一到十(注意：不是“从一到九”)。可以說，例如，“三尺来布”，“五斤来米”，“八亩来地”，“十里来路”。但是不能說，例如，“\*三本来書”，“\*五个来人”，“\*八張来桌子”，“\*十件来事情”(都不是度量單位)。也不能說，例如，“\*二十斤来米”，“\*四十里来路”，“\*五百亩来地”(数量超过十)。

(a)式和(b)式都不适用于“十二、二十五、一百三十六”等等末位为从一到九的多位数，不管量詞屬於哪

① А. А. Драгунов: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грамматике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Москва, 1952, стр. 201.

看法沒有得到徹底的批判(傅先生在他的著作里常常批判別人是唯心論者，是受了資產階級語言學家的影响，但傅先生很少自我批評)，所以当傅先生从事汉语研究的时候，它就会引导傅先生走到錯誤的路上，使傅先生看不到汉语的語法范疇。

苏联語言學家亞列克賽耶夫和科尔山斯基在他們合著的《論邏輯范疇和語法范疇的联系》中，提出足够的論証，証明了下述的观点：

如果邏輯學應該研究思維的形式，那么語法學應該研究語言的語法形式。…奠基于馬克思主義語言學說的一般語法理論，不能舍弃邏輯范疇和語法范疇相联系的問題。始終一貫地运用語言和思維的不可割裂的一致性的原理，

使我們有可能更进一步地深入地用語言事實論証和確認邏輯范疇和語法范疇的相互联系，同时也使我們有可能揭露它們的以內部規律的特征为存在条件而構成的分歧的事实。①

汉语語法研究缺乏指導實踐的意義，是一般學習語法的人的共同的感觉，語法學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②这是很可喜的。为什么汉语語法研究会缺乏

① М. Н. Алексеев 和 Г. В. Колшанский: «論邏輯范疇和語法范疇的关系》，見《語言學問題》(俄文) 1955年第5期，19頁。

② 張志公: «語法研究的理論意義和實用意義》，見《中國語文》1957年2月号。

一类。换句话说,在这种数词之后根本不能用“来”。

能不能用“来”,“来”字放在什么位置上,基本规律就是这三条。从这三条规律可以看出:1)如果量词是类别词,只有末位为零的多位数才能带“来”,“来”字不能放在量词之后。2)量词是度量单位的时候,如果数词是末位为零的多位数,“来”字放在数词之后;如果数词是从一到九,“来”字放在量词之后。3)只有数词是光杆儿“十”而量词是度量单位的时候才能有兩種詞序:“十来斤米”或“十斤来米”。

讀者一定要問:“十来个月”的“个”不是度量单位,怎么也能說“十个来月”呢?是的,这是一个特例。不但可以說“十个来月”,还可以說“十一个来月”。换成不是表時間的名詞就不成。

为什么会有这种种分別呢?我想試为解釋。量詞的不同跟事物的性質有关系。度量单位用于連續量,比方从一尺到二尺,是通过一寸、一分这些較小的單位逐渐过渡过去的。类别词用于非連續量,从一个跳到两个,从两个跳到三个,沒有中間的量(在事物的性質容許的条件下可以有半个)。然后讓我們假設“来”的数量意义是跟前边的数目相差不太多,比方說增加或减少十分之一二。这样,“十来斤”可以概括八九斤到十一二斤,是个很有用的表达方式。但是“七十来斤”的意思不是比“七十”这个数目多或少十分之一二(要是那样就应该說“六七十斤”或“七八十斤”了);“七十来斤”的意思是从六十八九斤到七十一二斤,那个“来”字的作用只管到前边的“十”。同样,“七千来斤”是概括从六千八九百斤到七千一二百斤,“来”字的作用只管到前边的“千”。同样,“七斤来”是概括六斤十几兩到七斤几兩,“来”字的作用只管到前边的“斤”。現在讓我們把度量单位换成类别词試試。“十来个”是說从八九个到十一二个,“五十来个”是說从四十八九个到五十一二个,这些組合都是有意义的,也都是有用的表达方式。說到这儿,\*“三本来書”和\*“五个来人”这种組合之所以不存在,理由也就很明显了。按照前边所說的“来”字的意义来理解,\*“三本来書”只能是 $3 \pm \frac{1}{10}$ (或 $\frac{2}{10}$ )本書,\*“五个来人”只能是 $5 \pm \frac{1}{10}$ (或 $\frac{2}{10}$ )个人,这种数量在日常說話里是沒有意义的。同时,为什么可以說“五个来月”的道理也就不难明白。虽然“个”不是度量单位,時間可是連續量,一个月和两个月之間有一天、一小时等等小單位。

这样看来,“十来斤米”和“十斤来米”这同时存在的兩種組合并不是無区别的。“十来斤米”是說从八九斤到十一二斤,活动范围較大,而“十斤来米”则是从九斤十几兩到十斤几兩,活动范围較小。当龙果夫教授說“十个来月”是強調不超过十个月的时候,他是隱約感到这个区别的,不过他沒有認識这是数量活动范围大小的問題,不是向兩头活动还是向一头活动的問題。<sup>①</sup>

我不知道这个解釋講得通講不通。我写这篇短文的主要目的是向讀者求教,关于“来”字的規律是否符合事实。如果这些規律本身站得住,解釋的是否圓滿应该不影响規律的存在。如果規律站不住,也就是說,对于事实的觀察不正确或不全面,那末所作解釋,尽管听起来很有道理,也是要落空的。

① 关于“来”字所表示的数量活动范围,我問过很多人,有三种意見:1)“十来个”可以比十个多,也可以比十个少;2)“十来个”只能比十个少,不能比十个多;3)“十来个”只能比十个多,不能比十个少。我采取的是第一种意見。这不影响本文的論点,因为無論按照三种意見的哪一种,“十来个”和“十个来”的活动的方向都是一样的(或是向兩头活动,或是只向一头活动),不因为“来”字位置不同而有所分別。

指导实践的意义呢?問題的根源恐怕就在于沒有把語法和邏輯的关系、語法学和邏輯学語义学的关系处理好。在詞类問題討論中也曾經出現过这两种偏差。把語法范畴和邏輯范畴割裂的人容易走上汉语沒有詞类的結論,如果認為汉语沒有詞类,那么他的語法理論又怎能指导实践呢?又怎么告訴我們各类詞的語法特点和运用它們的規律呢?把語法范畴和邏輯范畴混同起来的人,主張用意义来区分詞类,首先編詞典就会遭遇困难,因为編詞典的人遇到一些不好分別詞类的詞就势必無所适从了。大家都从意义出發来区别詞类,

如果有了爭执,到底要拿什么来做最后的标准呢?

有人問我:“你的划分詞类标准是什么呢?”我的回答是“詞彙·語法范畴”。至于用詞彙·語法范畴来划分汉语詞类,能否全部地解决汉语詞类問題,还会遭遇到什么困难,那我目前还不能回答,我正在跟在諸位时賢之后向前走着。我相信,这条路是走得通的。同时就我的粗淺看法,把意义当做唯一的划分詞类的标准,在理論上無論如何是站不住的。我的理論知識尽管很差,但我还是可以看到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 《馬氏文通》和旧有講虛字的書

麦梅翹

一般人都把《馬氏文通》<sup>①</sup>看作是純粹摹仿西洋語法寫成的，這種看法並不正確。其實馬建忠“因西文已有之規矩”，是體系上主要參照西洋語法，至於體系中的個別部分和個別虛字的解釋，却往往繼承了旧有的講虛字的書上的說法，特別是袁仁林的《虛字說》。

現在舉出《文通》和《虛字說》<sup>②</sup>里有關的一些例子如下：

1) “則”字“即”字，乃直承順接之辭，猶俗云就也，與上文影響相隨，口吻甚緊。(《虛字說》，33頁)

“則”字乃直承順接之辭，與上文影響相隨，口吻甚緊。(《文通》，379頁)

2) 此“然”字即然諾之“然”，用有落句起聲之異。用以落句，則口然而意亦然之，更無走作。用以起聲，則口然而意別掉轉，殊多借勢……此“然”字之所以為轉語辭也。

世有借勢之事理，有借勢之語言，即有借勢之文法，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蹶，將噬者爪縮，將文者且樸，此借勢之事理也。(《虛字說》，5頁)

“然”字又本狀字。狀字之“然”，用以落句，口然而意亦然也。連字之“然”，用以起句，口然而勢已轉也。將飛者翼伏，將躍者足縮，將轉者先諾，同一理也。故“然”字非轉也，未轉而姑然之，則掉轉之勢已成。此“然”字之所以為轉語辭也。(《文通》，397頁)

3) 順輟者，兩邊一意引伸，便如順流直瀉也。他如“而況”“而且”，凡進步者，均在“又”字甲里。(《虛字說》，4頁)

——諸引上下截，皆以“而又”兩字遞輟。惟然，“而亦”“而復”與“而況”“而且”，凡進步者，皆在“又”字甲里，經史亦習見焉。(《文通》，372頁)

4) “而”字之聲，膩滑圓溜，有承上起下之能，有蒙上輟下之情，惟其善輟，故不拘一處，無乎不可。……用法大約有四：凡上下截同類相引，則遞輟向前，有“又”字意，故“而又”二字相連。

凡上下截兩般相反，則曲輟轉，有“然”字意，即有拗轉之“乃”字意，故“然而”二字與“而乃”二字常各相連。

凡上下截一理并舉，則平輟齊來，有直指之“乃”字意。

凡上下截一意相因，則順輟直下，有“因”字意，故“因而”二字相連。(《虛字說》，3—4頁)

夫然，“而”字之位，不變者也。而上下截之辭意，則又善變者也。惟其善變，遂使不變者亦若有變焉。其變有四：

一、凡上下截兩事并舉，則以“而”字遞承，若有“又”字之意。故“而又”兩字相連者，常也。

二、凡上下截兩相背戾，則以“而”字輟轉，似有“乃”字“然”字之意。故“而乃”“然而”常各相連者，此也。

三、凡上下截一意相因，則以“而”字直承，若有“因”

字“則”字之意。此則“而”字之本意也。

四、凡上下截有言時者，則以“而”字連之，以記其時之同異。(《文通》，371—376頁)

5) “第”字“但”字“獨”字“特”字之聲，皆屬輕轉，不甚與前文批駁，只從言下單抽一處，輕輕那轉，猶言別無可說，單只有一件如此也，氣頗輕婉。(《虛字說》，6頁)

……“第”“但”“獨”“特”“惟”五字，皆轉語辭。五字意各別，而前文不論，惟舉一事一理輕輕掉轉者則皆同。

……統觀五字，皆承上文，不相批駁，只從言下單抽一端輕輕掉轉。猶云別無可說，只有一件如此云云。(《文通》，401頁)

6) “顧”字之聲，更屬輕轉，方語前文，而隨念及此，則用以輕輕那轉。凡轉頭別看曰“顧”，今作虛用，亦含斯意。其聲在轉語中為最輕婉。(《虛字說》，7頁)

“顧”，動字，回首也。借為連字，則有轉念及此之意。“顧”字于轉語中最輕婉。(《文通》，402頁)

7) “乎”系喉音，引喉深出，圓滿包含，其氣自足。用凡有三：一則實疑未定者，一則謙退帶疑者，一則無疑拖語者。

實疑未定者，乃因事理未明，莫知定向，用此托其疑沮不前之氣。言下有求定意。

謙退帶疑者，凡因事體重大，道理微妙，或是敬對尊長，心雖有見，不敢實言，用以寄其謙退意。言下于不死然中，意已隱然有定。

若夫無疑拖語者何也？曰文家萬無句句僵說之法，一撐一拖，虛實相生，精神始活，故嘗借其平拖虛婉之聲，以為言中節度，而后口角松活，語言流暢，讀之綽有余味。(《虛字說》，10—11頁)

“乎”字喉音，圓滿氣足，凡事理可直言而不必婉陳者則用之。

一、“乎”字之助設問之句者，其常也。

一、“乎”字有助擬議之句者。夫擬議之句，本無可疑之端，而行文亦無句句僵說之法，往往信者疑之，而后信者愈信矣。

——所引諸句，如“而暇耕乎”者，猶云：“不暇耕”也。“是為欲富乎”者，即“不為欲富”也。“而子為我願之乎”者，即“而子可知我之不願”也。諸句助以“乎”字，則不僵說而笔下松活，其句意則隱然無疑矣。(《文通》，461—464頁)

8) “與”字清嫩悠長，其氣舒徐無盡，其情專一平穩，

\* 本文是在鄭奠教授指導之下寫成的，附此志謝。

① 本文所引係章錫琛校注本，上海，1954年。

② 《虛字說》清袁仁林著，書成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刊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曾收入商務叢書集成，本文根據的是熊宥宿校刊本。



能使語歸柔活。“乎”字充足悠長，其氣圓滿包含，其情空洞無著，能使意足言中。

“与”在唇上，直趨輕溜，“乎”能充口，扶蘇不走。

大抵宜足處用“乎”字。宜嫩處用“与”字（虛字說，12，11頁）

“与”字之音，与“乎”字相終始。“乎”喉音，音之始；“与”唇音，音之終。其用法亦大同。“与”字以助設問，以助擬議者其常，而以助詠歎，則不若“哉”字。惟以其音之紆徐，故凡所助者，不若“乎”字之可以質言也。（文通，475頁）

9) “耶”系牙音，在口空挨無力，小开而不能合，氣最絀纖無著。故不特聆音知意，即睹其出声時面龐口輔，亦自有一段清虛疑活，不自主張意。（虛字說，10頁）

蓋“邪”系牙音，声出則口开而不能合，經籍用以助設問詠歎之句者，則不概見；而用以助擬議未定之辭氣者，則習見也。

…叠用“邪”字煞句，揣摩量度之辭氣，自流露于口吻矣。故韓文坊者傳云：“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叠用五“邪”字，自為商度，而感歎之情，溢于言表。（文通，472—474頁）

10) “虽”字乃宕开跌入之辭，極善銷納，惟其銷納，故可另折。用在前文後者，銷納前說，另折後語，由宕开而跌入。用在劈頭起句者，銷納言下過甚一邊，另折見意，由宕出而跌入。（虛字說，30頁）

其拓开跌入之辭，則有“虽”“縱”兩字。

—諸“縱”字皆以領讀，意在推开上文而跌落本意也。而經籍中“縱”字不多見，“虽”字則所在而有。

設辭之後，復有以“虽”字宕跌者，亦習見也。

—諸所引節，始則以設辭一推，繼以“虽”字一跌，而後折收本意。（文通，403—408頁）

从上面这些例句中，很清楚地看出来：《文通》的立論，甚至所用詞句，都采用了《虛字說》，它的主要論點不超出《虛字說》的範圍。如8、9、10等例也只是在《虛字說》的“神情声气”观点上加以發揮罷了。

上引各例所講的詞，都是《文通》中的連字和助字。助字是“華文所獨”，而且是古來學者研究得最深入的，所以馬氏在這方面繼承和吸收舊有學說為多，又特別選用比較強調用聲音摹擬語氣的《虛字說》。此外，連字和助字有前後相互呼应的关系，因此馬氏也就用類似解釋助字的方式同時來解釋連字。這些都是馬氏繼承舊有學說，不是襲取西洋語法的，但是《文通》并

（接27頁）

佛典的翻譯和對音的材料有一个优点是年代相当明确，这要归功于佛教的《經錄》。《一切經音義》是按《開元釋教錄》的次序編的，后者有前南京支那內學院校刊本，每條編號。為了配合上述几項工作，我們很需要以这个校刊本为基础而編一部《法寶勘同新錄》，利用法国的《佛教目錄》(Bibliographie Bouddhique)把梵文校本、寫本和東、西方各國學者的研究都列進去。

不是完全抄襲前人成說，馬氏是有自己的原則和批判取舍的准繩的，試舉《文通》和《經傳釋詞》、《助字辨略》有关的例子如下：

1) 《文通》同意它們的說法而引用了的。

“不”字有代“非”字者。《禮，中庸》云：“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莊子，讓王篇》云：“先生不受，豈不命耶！”前引三節內，所云“苟不”，解以“苟非”較順，所云“豈不”，解以“豈非”較順。《大戴禮，王言篇》云：“舉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征斂于百姓，非以充府庫也。”又《墨子，非命篇》…前引二節內，“不”“非”兩字互用，《釋詞》引為相代之証。（文通，304頁）

按這里所引各節及“豈不”解作“豈非”，“不與非同義”，“不亦非也”，都見《經傳釋詞》卷十。

2) 認為它們的說法還對，但不夠圓滿，《文通》給以補充的。

古人有謂“也”字三用，有用于句末者，有用于句中者，有用于稱謂者，蓋近之矣。愚謂“也”字所助有三：曰助句，曰助讀，曰助實字，以視所謂三用者較為涵蓋。（文通，414頁）

按這里所謂古人是指劉洪。上說見于《助字辨略》卷三。

3) 《文通》不同意它們的說法而加以批判的。

《公羊，文公二年》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云災”者，“謂之災”也，“云”者，“稱”也，“謂也”。楊倞注《荀子，非十二子》引《慎子》云能而害無能，則亂也。《荀子，儒效》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為盜，勇則必為賊，云能則必為亂…。——三引“云”字皆“謂”也。《釋詞》解作“有”字，未安。蓋“云”者，承上文而釋其意之詞也；若以“有能”“無能”為對待，實于本文不貫也。（文通，197頁）

按以上所引例句皆見《經傳釋詞》卷三。《釋詞》云：“云災”與“無災”對文，是“云”為“有”也。又云：家大人曰：“云”猶“或”也，“或”與“有”古同聲而通用。這種解釋，《文通》認為不對。

以上的例子，表明了馬氏的三種態度。馬氏在《文通》中明白指出引自《經傳釋詞》、《助字辨略》或泛稱“經生家云”、“古人云”而實際是指《釋詞》和《助字辨略》的地方有五六十處。這都可以証明，《文通》一書一方面固然是“仿葛朗瑪而作”，另一方面它也繼承了一部分舊有的說法。

有些佛教梵本不是全部而是其中部分地有和它相当的漢譯。我們可以把這種材料編成一部《梵漢文選》。印度加爾各答大學梵文系前主任維杜舍卡論師 (Vidhusekhar Sastri) 編過一部《梵藏文選》，梵文名叫 Bhoṭa-prakāśa；上述《梵漢文選》可以叫做 Cīna-prakāśa。

關於以上所述各項，最好能有一個“梵漢研究室”來進行工作。

# 方言里的文白异讀

李 荣

一个方言里头，最常见的情况是一个字一个讀音。例如北京話“人之初”[ʒən ʒtɕʰ ʒtɕʰu]三个字，每个字都只有一个讀音。有时候，一个字不止一个讀音，有几个讀音。例如“好”字有两个讀法，“好坏”的“好”[xau]讀上声，“喜好”的“好”[xauʔ]讀去声。又如“長”字也有两个讀法，“長短”的“長”[ʒtɕʰan]讀陽平，“生長”的“長”[ʒtɕʰan]讀上声。两个讀音的来历不同，意义不同，严格的說，是两个不同的字，不过写法相同而已。調查方言的时候，碰到这些字，要把意义注出，以免誤会。例如：

好 好坏 xau      好 喜好 xauʔ  
長 長短 ʒtɕʰan      長 生長 ʒtɕʰan

这里所謂文白异讀，不包括这些来历不同、意义不同，的一字兩讀，專指同一个字文言音和白話音不同而言。首先要說明的，这里的文白只是概括的說法。如“更更改，更动”总讀[ʒkən]，“更打更，三更”[ʒkən]、[ʒtɕʰin]兩讀，我們說[ʒkən]是文言音，[ʒtɕʰin]是白話音。差不多全国方言都有文白异讀現象，有些方言几乎每一个字都有文白兩讀，如浙江义烏，大部分方言文白异讀限于少数字，这里举北京、汉口、苏州三处为例。

北京文白异讀例如：

	文	白
嫩	nuənʔ	nənʔ
乱	luanʔ	lanʔ 乱七八糟
誰	ʒʂuei	ʒʂei
膿	ʒnuŋ	ʒnəŋ

“嫩、乱、誰”三字文言音有[u]介音，白話沒有[u]介音。“膿”字文白兩讀元音不同。又如：

	文	白
更	ʒkən	ʒtɕʰin 打更，三更
耕	ʒkən	ʒtɕʰin 耕地
隔	ʒkɤ	ʒtɕʰie

“更、耕、隔”文白兩讀韵母不同，因为北京[k, k', x]不拼[i]，所以“更、耕、隔”白話音声母都是[tɕ]，連声母都和文言音不同了。又如：

	文	白
色	ʂɤʔ	ʂai
脉	moʔ	maiʔ
賊	ʒtsɤ	ʒtsei
北	poʔ	pei

	文	白
給	ʒtɕʰi	ʒkei
薄	ʒpo	ʒpau
落	luoʔ	lauʔ
瘡	nyeʔ 瘡疾	iauʔ 發瘡子
熟	ʒʂu	ʒʂou
六	luʔ	liouʔ

这些字都是古入声字（除“給”字古音收[-p]外，其他都收[-k]），文言音是开尾韵，白話音收[-i]尾或[-u]尾。

汉口文白兩讀的异同主要是有沒有[i]介音，文言音有[i]介音，白話音沒有。例如：

	文	白
夾	ʒtɕʰia	ʒka
下	ʒiaʔ 上下，下山	xaʔ 等一下
伢小孩兒	ʒia	ʒɤa
覺睡一覺	tɕʰiauʔ	kauʔ
敲	ʒtɕʰiau	ʒk'au
咬	ʒiau	ʒɤau
鹹	ʒɕien	ʒxan
淹(沼)	ʒien	ʒɤan
雁	ienʔ	ɤanʔ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到，文言音有[i]介音，接近北京音，白話音沒有[i]介音，和北京差別較大。好些方言文白异讀的情况都是如此。

苏州的文白异讀也是文言音接近北京音。先举文白声母不同的例，文言音是口音声母[v]、[ʒ]，白話音是鼻音声母[m]、[ɲ]。例如：

	文	白
蚊，聞	ʒvəŋ	ʒməŋ
物	vəʔ₂	məʔ₂
味	vi²	mi²
人，仁	ʒzəŋ	ʒɲin
認	zəŋ²	ɲin²
日	zəʔ₂	ɲiəʔ₂
讓	zā²	ɲiā²

苏州的文[v-]白[m-]的字，北京是[u-]：“蚊、

\* 这是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合办的普通話語音研究班講義的一部分。



聞”[ɕuən],“物”[uʔ],“味”[ueiʔ]。苏州文[z-]白[ɳ-]的字,北京一律是[ɳ-]:“人、仁”[ɕɳən],“認”[ɳənʔ],“日”[ɳɿʔ],“讓”[ɳaŋʔ]。

苏州文白兩讀韵母不同的情况比較复杂,不过也看得出文言音接近北京音。例如:

	文	白
罵	ma <sup>2</sup>	mo <sup>2</sup>
蝦	ɕɕia	ɕho
家,加,街	ɕtɕia	ɕka
嫁,戒	tɕia <sup>2</sup>	ka <sup>2</sup>
花	ɕhua	ɕho
埋	ɕme	ɕma
怪	kuɐ <sup>2</sup>	kua <sup>2</sup>
揀	ɕtɕir	ɕke
野	ir <sup>2</sup>	ia <sup>2</sup>
眼	ir <sup>2</sup>	ŋe <sup>2</sup>
生	ɕsəŋ	ɕsā
省	ɕsəŋ	ɕsā
櫻	ɕʔiŋ	ɕʔā
行行为	ɕiŋ	ɕhā

苏州的文言音在介音上和北京音完全相同,主要元音也是相同或相近的多。北京“罵”[ma<sup>2</sup>],“蝦”[ɕɕia],“家、加”[ɕtɕia],“街”[ɕtɕie],“嫁”[tɕia<sup>2</sup>],“花”[ɕxua],“埋”[ɕmai],“怪”[kuai<sup>2</sup>],“揀”[ɕtɕian],“野”[ɕie],“眼”[ɕian],“生”[ɕsəŋ],“省”[ɕsəŋ],“櫻”[ɕiŋ],“行”(行为)[ɕɕiŋ]。苏州沒有[ai],北京的[ai]苏州是[ɛ]。苏州沒有[ian]和[ie],

(接 44 頁)認為两个成分必須是具有同等价值的。我的意見是兩個成分不一定具有同等的价值。复指成分似乎是偏重于意念上的东西,当然結構和意念常常是一致的,但是并不永远相合,因此講到結構的时候,就不必过于迁就意念。比如把“他”看作主語就是忽視了結構特点。在这种結構和意念發生矛盾的情况下,应当着眼于結構,“董存瑞”是主語,“他”不是主語,而是宾語。

章三是关于句子成分省略的条件問題。关于省略問題郑光仪先生在《句子成分的省略和倒裝》一篇中作了詳細的闡述,指出有七点是运用省略时所要注意的。其中第 1 点說不宜省去動詞只留补語,如“你听清楚了嗎?”回答只能是“听清楚了”,不宜是“清楚了”。但是在另外的一个地方,作者对“他跑得快嗎?”这个問題却認為可以回答說“快”。(296 頁)我看,省补留动,省动留补,或者兩者都省,在不同的情况下都是可能的,單說不能省动留补,既欠全面,也还没有說出省动留补的条件。其中的第 4 点說要避免歧义,如“我的孩子比你的孩子大”不能說成“我的孩子比你大”。在原則上指出要注意避免歧义是对的,但是作为語法書,更重要的是要指出避免歧义的規律,在什么情况下會發生歧义,在什么情况下不会發生歧义(“我的書比你的書多”可說“我的書比你多”)等等。第 5 点說主語相同的两个分句被另外的分句隔开的时候,这两个分句就一定要用主語,不能省略。如“她去找程仁,程仁躲开了,

北京[ian]苏州是[iɿ],北京[ie]苏州是[ia]或[iɿ]。苏州的白話音距离北京音就远多了。拿“生、省、櫻、行”四字說吧,这四个字苏州白話音韵母全是[ā],文言音韵母和北京相同。

从汉口和苏州的文言音和北京接近上,可以看出北京語音对于方音的影响来。不过也有一些方言,無論文言音白話音都和北京音距离很远的。

为了区别文白,可以在音标后注明文白,也可以在文言音底下加双綫(==),在白話音底下加單綫(—)。例如北京“給”[ɕkei]白,[ɕtɕi]文;或“給”[ɕkei],[ɕtɕi]。

有些方言,讀書認字都用文言音,白話音和文字已經失去連系,就是識字的人也不能把他口里說的字都写下来。調查詞彙語法例句,固然要請發音合作人一条条翻譯,注重話怎么說。就是調查字音,也不能离开口語,光問讀書音。因为我們的目的是通过字音調查方言,不是單調查字音。所以在問字音的时候,有时候还得問这个字代表的东西口語里怎么說。光問“雁”这个字,也許只能得出这个字的文言讀法,比方說[iən<sup>2</sup>],再問問“雁”这个东西叫什么,也許問出[ŋan<sup>2</sup>]来。这种問法也許問出訓讀(同义字的讀法)来,比方梅县管“柴”叫“樵”[ts'iau],陽平,因此“柴”字就讀“樵”字的音[ts'iau],梅县管“傘”叫[tsaɿ·ue] (說快了也可以說[tsaɿ·ɛ]),[tsaɿ]就是“遮”字,比較“車”讀[ts'aɿ],这里的[·ue]或[·ɛ]都相当于“子”。因此“傘”就讀“遮”的音[tsaɿ]。这都沒有关系,先把事实記下来,再子細研究那个音代表什么字。

沒見着,她就更急了”。我看这里不是非用主語不可。在“我上午去找他,他沒有在,下午去找他,还是沒有在”这句话里,第三分句的主語承第一分句而省,第四分句的主語承第二分句而省,一、三和二、四之間也都是被另外的分句隔开的。第 7 点說到句子里意义上的重点不能省略。这是很泛的說法,也沒有作具体的分析。同一句子,因不同的理解可以有不同的重点,單說意义上的重点不能省略是难以掌握的。

第四是关于表示強調的“是”和組成合成謂語的“是”的界限問題。張寿康先生在《名詞、動詞和形容詞》一篇中說,用在動詞謂語或形容詞謂語前头的“是”,是表示強調,謂語后头可以用加強語气的語气助詞“的”,跟“是”呼应。如“花兒紅”,“花兒是紅”,“花兒是紅的。”(136 頁)又說形容詞也可以和“是”構成合成謂語,如“首要的条件是忠誠”。(140 頁)怎样分別“是”的这两种用法,作者沒有說。我想,两种用法的分別不是在于結構,而是在于意念。“花兒是紅”和“首要的条件是忠誠”結構上沒有什麼不同,兩者的分別可能是前者作謂語的“紅”是描写主語“花兒”的性質的,單是“紅”就已經能表示一个意思了,而后者“忠誠”和“条件”之間却没有这种从屬的关系,“忠誠”所屬的是人,不是“条件”,要通过“是”才能表达“条件”和“忠誠”的同一关系,所以“忠誠”不像“紅”那样能單獨作謂語,而是和“是”組成合成謂語。

我的意見如有不正确的地方,請作者和讀者指正。

# 談一談訓詁學

陸宗達

目前, 汉语的研究, 肯定地說是有了許多成績。但一般人感到欠缺的是: 大家都把全力集中于語法理論的研究, 而沒有注意到它的历史發展, 沒有注意到它的使用特点; 因此在教学当中, 学生常会碰到許多困难, 而感到語法教学的实用意义不大。这个問題是需要解决的。

过去大家都認為中国古代既無語法專書, 也沒有关于語法的完整理論; 但是我認為有系統的語法專書虽然沒有, 可是中国很早的“訓詁学”中, 确实在許多地方涉及到語法的問題, 如果加以整理和分析, 是有助于汉语發展規律和汉语独具特点的了解的。所以我准备在这篇短文里介紹一下“訓詁学”, 同时也涉及到和語法相关的一些問題。

## 一 訓詁学非單純的詞义学

一般談到訓詁学, 認為不过只是講些字义和詞义, 这种了解是不够全面的。訓詁学固然主要的要講字义和詞义, 但是一究其全部內容, 决不仅仅是字义和詞义的問題。

从历史来看, 訓詁学本是对整个具体的語言作出分析解釋。例如《詩大雅, 烝民》:

古訓是式。

郑玄箋“故訓, 先王之遺典也。”是“古訓”即“故訓”, 也就是“訓詁”。既然故訓包括了整个的“先王遺典”, 当然就不会仅限于字义或詞义的解釋了。又如《大戴礼記, 小辨》上說:

尔雅以親于古, 可以辨言矣。

“古”就是訓詁, “尔雅”倒不一定是書名, 意思是依靠“雅言”用訓詁学来观察, 可以了解其語言的全部內容。这里談到“雅言”, 談到明辨整个的語言, 当然訓詁学就不仅仅是限于字义或詞义的范围了。

現存的比較最早和最完整的訓詁專書應該是毛亨的《詩傳》(《尔雅》的时代还有爭論)。毛亨解詩, 以“詁訓”名書。依一般理解, 似專講字义和詞义了; 可是不然, 他除去在許多地方解釋《詩經》的字义和詞义之外, 还有大部分不屬於字义詞义范围之內的。像, 解釋詩义的, 如《周南, 关雎傳》:

言后妃有关雎之德, 是幽閒貞專之善女, 宜为君子之好匹。

又云:

宜以琴瑟友乐之。

又云:

德盛者宜有鍾鼓之乐。

这里的“宜为、宜以、宜有”都非《詩經》原文所有, 也不是解釋哪个詞义的, 毛亨特地加入, 以明“君子好逑”“琴瑟友之”“鍾鼓乐之”云云, 实只是詩人的一种想望, 非即已成现实也。其次, 显示修辞的, 如《小雅, 車攻》:

蕭蕭馬鳴, 悠悠旆旌。傳云: 言不譴諱也。

毛傳在这兩句詩下面, 既不解釋詞义, 也不解釋名物, 但說“言不譴諱”是在揭出風人修辞之首, 是借用了“蕭蕭馬鳴, 悠悠旆旌”, 来渲染师旅出征时, “有聞无声”的那种严整气氛。再其次, 分析句讀的, 如《大雅, 常武》:

王命卿士, 南仲太祖。傳云: 王命南仲于太祖。

这就無异告訴我們說: 这八个字虽然在音节上要在中間一頓, 但文义实上下直注, 不容留停。又如《商頌, 玄鳥》:

天命玄鳥, 降而生商。傳云: 春分玄鳥降, 湯之先祖有娣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 帝率与之祈于郊禖而生契, 故本其为天所命, 以玄鳥至而生焉。

根据毛亨的意思是: 这八个字音节虽然要在中間停頓, 但文义上應該分为“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三个小句子(此虽古文家說, 然亦未可厚非)。最后, 还有解釋語法的: 毛傳在許多地方, 虽然沒有孤立地解釋过語法, 但在申明句意的时候, 往往把詞与詞或句与句的关系确定出来, 因而就暗示出語法的結構, 这例子也是很多的。譬如, 《小雅, 常棣》:

原隰哀矣, 兄弟求矣。傳云: 求矣, 言求兄弟也。

傳为什么要这样呢? 就是告訴我們“兄弟”是“求”的宾語, “原隰哀矣”、“兄弟求矣”在形式上虽然是对偶句, 可是兩句的語法結構并不相同, 不要因为“兄弟”放在“求”之前, 就誤認為它是“求”字的主語。胡承拱《毛詩后箋》上說: “經求字在兄弟下而傳倒之者, 蓋謂人虽聚于原隰之中, 而其所求者, 惟自求其兄弟。”又如《大雅, 思齊》:

不显亦临, 無射亦保。傳云: 以显临之, 保安無厭也。

根据毛傳的意思是: 上用显道临民, 民才能安其上而無相厭之心。毛傳也認為这两句詩句法虽然平列, 而語法結構并不相同。用現代語法术语說明它: 上句“不显”, 应当是“临”的附加語; 而下“無射”則是“保”的宾語。以上是毛傳針對詩中对偶現象的語法解釋。又如《小雅, 大东》:

或以其酒, 不以其漿。傳云: 或醉于酒, 或不得漿。



这就告诉我们这两句是并列的复合句，是诗人用对比的手法，表示两种现象并存；而不能只从字面上理解为“飲酒者不复得漿”也。毛傳也啓示我們，并列句有的可以省掉連詞。又如《郑風，揚之水》：

揚之水，不流束楚。傳云：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

則明告訴我們七個字是一句，並且是“反問句”。詩中反問句是常常省掉語氣詞的。像《小雅，白駒》：“尔公尔侯，逸豫無期。”傳云：“尔公尔侯耶，何为逸乐無期以反也？”之類，皆同样用“反問句”來解釋。又如，《鄘風，蟋蟀》：

乃如之人也，怀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傳云：乃如是淫奔之人也。

毛傳所以要这样解釋，大約他恐怕我們因为有四个語氣詞“也”，就会誤解为四个句子或三个句子。毛傳用“淫奔”解釋“怀昏姻”，因而証明“乃如之人怀昏姻”是“大無信也”和“不知命也”的主語。凡此种种，都是訓詁学在具体語言解釋中关涉到語法問題。

## 二 訓詁学与章句学

古人解經，往往在訓釋詞义之外，另外再串通一次經文大意，汉人管这种办法叫做“章句”。現在所流傳的，有赵岐《孟子章句》，王逸《楚辭章句》，也都是这种做法。《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赵岐《章句》云：曰，辭也。叟，長老之稱也，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禮之。曰，父不远千里之路而來至此，亦將有可以為寡人興利除害者乎？

赵岐这一段自“曰，辭也”到“猶父也”是逐詞作了解釋，自“孟子去齊”到“為寡人興利除害者乎”又重新貫串句义。王逸的《楚辭章句》也是这种体例，像《离騷》篇“朕皇考曰伯庸”，先把“朕”、“皇”、“考”、“伯庸”逐詞作了注解；然后又总釋之曰“屈原言我父伯庸体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于己。”本来这种“章句”的体例，为的是使經文的語义更加显明，句讀分析更加清楚。至其末流，用詞繁瑣，支离破碎，如《左傳，宣二年》：

二月壬子，战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將战，華元杀羊食士，其御羊斟不与。及战，……与入郑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驪，以贖華元于郑。半入，華元逃归，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艸，曰，子之馬然也。对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

《正義》引服虔載三說，皆以“子之馬然”為叔艸之語，“对曰”以下是華元之辭。賈逵說：

叔艸，宋守門大夫。華元既見叔艸，即謂華元曰，子見获于郑者，是由子之馬使然也。華对曰，非馬自奔也，其人为之也，謂羊斟驅入郑也。奔，走也。言宋人贖我之事既和合，而我即來奔耳。

郑众說：

叔艸即羊斟也，在先得归。華元見叔艸。艸即諷之曰，奔入郑軍者，子之馬然也，非我也。華元对曰，非馬也，

其人也。言是女驢之耳。叔艸既與華元合語而即來奔。又一說：

叔艸，宋人。見宋以馬贖華元，謂元以贖得归。謂元曰，子之得归来，當以馬贖故然。華元曰，非馬也，其人也，言己不由馬贖，自以人事來耳。

服虔所引三說，都是章句体例。按說有几句話，就可以解釋明白了。可是他处处复引經文，又增添上很多的詞語。这也是章句学的毛病。其实，古代的訓詁学已經包括了章句的体例，并且在运用章句的时候，同时把詞义包括在內，用詞簡潔，解釋明确。像毛亨《詩詁訓傳》在解釋詞义方面很善于运用章句体例。像《邶風，綠衣》：

心之憂矣，曷維其已。傳云：憂虽欲自止，何时能止也。这种串通整句，不解隻詞的办法，是屬於章句的体例，实际上也应当算訓詁的一种方法。毛傳用“何时”解釋“曷”，用“止”解釋“已”，都隱含于串解之中。又如《王風，葛藟》：

終遠兄弟，謂他人父。傳云：兄弟之道，已相远矣。論体例也是章句，而釋“終”為“已”，并指明為虛詞，亦即訓詁之方法。像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好多，这是一种类型。

还有，詞义沒有提出解釋，串解也沒涉及到这个詞义，但在串解当中，展示了和这个詞有关的一些說法，使人“由此及彼”，悟出这个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如《小雅，六月》：

比物四驥，閑之維則。傳云：物，毛物也。則，法也。言先教战然后用師。

傳于釋詞和串解二者，皆未尝涉及“閑”字，然于串解当中，平空添出“教战”兩字，使人容易領会，“教战”是揭出“閑之”的“之”，閑就是閑習教战之閑。又如，《小雅，何草不黃》：

何人不將。傳云：言万民無不从役。

毛傳于“將”無訓，而云“無不从役”。盖由“从役”可以導引出“行役”的意义，是傳通过“从役”而展轉以“行”釋“將”。像这样的例子，也能举出好多，这又是一种类型。总之，串解是訓詁的一种很好的方式，所以說章句也是訓詁学的一个方面。

由此可見，訓詁的終極目的，也是为了辨明章句；而較早的章句，实即訓詁学的另一种形式。不过其末流走向繁瑣主义，連篇累牘，而不能說明問題，像秦恭說《堯典》至十余万言（《文心雕龙，論說篇》“秦延君之注堯典十余万字”），那就無怪要為后世所詬病了。但是毛亨《詩詁訓傳》則兼備訓詁及章句二者之長，是注釋家最優良的典范。

## 三 訓詁可以作为古典文学表达方式的一个組成部分

过去我們总認為訓詁学材料只存在于訓詁專書

以及大批古籍的傳注當中，而忽略了在古書正文里也仍然蘊藏着許多“實質上”是訓詁的寶貴資料。不過這些資料，是以一種特異的表達方式而存在於正文之中，它是正文的有機組成部分。這種施用訓詁的辦法，不僅可以避免文外箋注的支離破碎，有時還可以起積極作用，例如條目分明，煊染周到，而且在許多地方，可以使語法結構變化無窮，文章表達搖曳多姿。這種例証，無論在說理文，抑或是敘事文中，都可以找出許多。例如《易經·乾卦》“卦辭”：“乾，元、亨、利、貞。”在周易作者告訴我們乾卦有“元、亨、利、貞”四種屬性的同時實際上也就是替“乾”字做了義訓。在“文言”里更顯著地說明：“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一事之幹也。”又如《尚書·堯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詠，律和聲。”這裡“言志、永言、依詠、和聲”也就都是“詩、歌、聲、律”的義訓。又如《論語·顏淵》：“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又“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又“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子曰，知人。”這裡既有義訓，也有音訓。

古書正文，不但解釋詞義而且也解釋語法。例如《左傳·莊公七年》說：“星隕如雨，與雨偕也。”以“與雨偕”釋“如雨”即所以說明“如”是連詞。又如《公羊傳·宣公八年》說：“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為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這裡分析“而”和“乃”兩個連詞在用法上的細微區別。又如《韓非子·外儲說左》：“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這也是涉及到語法的範例。諸如此類，比較顯明的例証，還可以在群經子史里找到許多。這裡就不再一一臚列。

還有不太顯明，實際上也是屬於上舉例証同一類型的。而且在語言結構方面組織更加細密，在文學表達方面更為靈活。像《左傳·僖公十五年》：

庚辰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憤興，外強中干，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

在庚辰這一段說話當中“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實際就是對於“其產”的注解，也是在解釋“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的真正理由。而“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憤興，外強中干”又是對於“異產”的注解，也是在解釋“今乘異產以從戎事”的害處。故上文接云“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下文接云“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這些都是在申疏上文於不知不覺之中，在修辭方面盡語法結構錯綜變化之能事，也屬於訓詁的最上乘。還有《文選·枚乘七發》：

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為之御，秦缺樓季為之右；此兩人者，馬軼能止之，車覆能起之。於是使射千鈞之重，爭

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

冒然一看，誰也應當認為這是很地道的敘述文，但是進一步地加以分析，我們不難發現所謂“此兩人者，馬軼能止之，車覆能起之”又是“車右”的最圓滿的注解，然而這種注解，則不但沒有把正文導至支離破碎，相反地，它和上下文結合起來，使人讀了，是非常跌宕和搖曳的。又如，杜甫《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久居夔府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

老向巴人里，今辭楚塞隅。入舟翻不樂，解纜獨長吁。窄轉深啼狖，虛隨亂浴黿。石苔凌几杖，空翠扑肌膚。疊壁排霜劍，奔泉灑水珠。杳冥藤上下，濃淡樹榮枯。神女峰娟妙，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夢盡失歡娛。擺闥盤渦沸，欹斜激浪輸。風雷纏地脉，冰雪耀天衢。……

這詩里“神女峰娟妙，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夢盡失歡娛”四句，後兩句就是前兩句的注解。因為這裡所說的“神女峰”和“昭君宅”只不過是在夢中看到，曲里听到的東西，假使沒有“曲留”兩句，則我們還認為“神女峰”兩句是真情實境呢！這裡實際上是執行着訓詁上的任務，而形式上又保持着排律的固定格局。又《紅樓夢》第42回薛寶釵說：

這園子却是像畫兒一般，山石樹木，樓閣房屋，遠近疏密，也不多，也不少，恰恰的是這樣兒，你若照樣兒往紙上一畫，是必不能討好的。

這一個複合句的結構我們很明顯的看出“山石樹木……恰恰的是這樣兒”是頭一個分句的注解。

以上這些例証，都應當看成祖國文學的“妙用”，看成祖國語言結構的豐富多采，而實際上也應當歸之於訓詁方法的靈活運用。假使我們好好搜集起來，不僅可以掌握祖國文學多種表現手法的能事，不僅可以擴大訓詁學的領域，而且可以闡明語法結構的歷史發展道路，增強它的實用價值，我想這種努力不會是徒勞的。

#### 四 應當吸取的傳統與滋養

總上所述，我們知道在過去的文獻里，關於訓詁學的資料是異常豐富的，其範圍是相當廣闊的，其表現形式是多采的。它和旁的科學部門，如文學的表達方式，語言的結構，關聯是密切的。只要我們對待這門學科的理解不是狹隘的，片面的，繁瑣主義的，脫離實際的，那麼，我相信我們今後一定會把我們的工作更向前推進一步。這篇文章所憑借的材料很有限，而且所持的理論也很淺薄，但是我希望大家能注意這些問題，並且具體向大家提出建議，今後要把我們的研究對象的領域擴大，並且尽可能跟有關的一切學術部門加強聯繫，把語言這門一向被人認為是較枯燥的學科，輸送以應有的青春活力；把這門過去脫離實用意義的學科，恢復它長遠以來就密切結合實際的優良傳統，從而使祖國的語言寶庫愈益豐富，並且進一步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事業服務。



# 怎样研究梵汉翻译和对音

周达甫

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音译成“潘查希拉”，在印度语言中是 panch-sheel，即梵语的 pañca-sīla，如果用我国古代的对音，是“般遮尸罗”，佛教的“五戒”就是这个词。稍为接触过佛教的人都知道杀、盗、淫、妄(妄语)、酒这“五戒”。“五戒”是“翻译”，就是义译；“般遮尸罗”是“对音”，也就是“音译”。当然五项原则的内容和佛教的“五戒”是不同的。

梵语译为汉语，通过佛教的关系，从公元一世纪到十世纪，有延续千年以上的历史，大致是这样的：

佛教	显教	大乘	性宗——古译：如姚秦	鸠摩罗什
				(344—413)
		相宗	旧译：梁	真谛
			新译：唐	(499—569)
	密教	前期	唐	玄奘
				(602—664)
		后期	唐	义净
				(635—713)
	宋	不空		
		(705—774)		
		法天		
		(?—1001)		
		(973到中国)		

这不过是略举翻译家之中的几个代表人物，年代据陈垣先生的《释氏疑年录》(前辅仁大学丛书)。他们所译佛典(经、律、论)的梵文原本，有些已经失传了，有些还保存着，被重新发现出来，校订出版了。研究的方法最好是精密地对读原本和译本，编制一个词一个词的索引，拉丁文的术语叫做“Index Verborum”，如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佛教丛书》(Bibliotheca Buddhica)之中的《正理滴论》(Nyāya-bindu)的梵文-藏文和藏文-梵文的这种索引，“一个助词也不忽略”(见序文)，是最好的范例。

印度西部浦那(Poona)地方的德干学院研究所(Deccan College Post-graduate and Research Institute)所长、语言学家葛德类(S. M. Katre)博士很重视编制这种索引，他们已经取得了许多成绩和经验。最好的办法是由他们编制佛教梵本的这种索引，编一种就寄一份到北京来，由我们加上古代的汉译和藏译。这种索引，也就是《梵汉辞典》或《汉梵辞典》的“长编”，将来再扩大包括巴利文(Pali)、古代中央亚细亚的几种语文和西夏、蒙、满文等等，就成为《中印辞典》或《印中辞典》了。除了中、印两国的同行之外，我们还希望苏联和日本的学者们参加，可以早一些完成这一个相当巨大的工作，这是富有国际意义的。

梵汉对音有两类的材料：一类是整篇，一类是单

词。前者又有两类：一类是有文学意味的“梵赞”(stotra)，一类是宗教性的“呪”(即“陀罗尼”dhāraṇī)。

法国的烈维(Sylvain Lévi)开始把汉字对音的梵赞“还原”成梵文，他还还原了两种：八大灵塔梵赞、三身梵赞。过去俄国的钢和泰(A. von Staël-Holstein)还原了四种：键椎(其实应该是“键稚”)梵赞、七佛讚呗伽陀、文殊师利菩萨一百八名梵赞、圣观自在菩萨梵赞。我还还原了三种：释迦牟尼佛成道在菩提树降魔赞、曼珠室利菩萨吉祥伽陀、圣多罗菩萨梵赞，详见《梵赞还原三种》论文和《梵赞研究》专刊(待印)这一类的材料。名称叫做《梵赞》的，只有比较最简单的《圣金刚手菩萨一百八名梵赞》(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0卷，第113种)这一种没有还原了。

清代有一部《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81卷(商务印书馆曾经影印，书名的前几个字改为《汉、满、蒙、藏四体合璧》)。这一部大书所收的“呪”，除了原有藏文对音的以外，如果是只有汉字对音的，改用了《同文韵统》的一套汉字，是按照清代的音，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呪”散见于全部《大藏经》，这部书把它编在一起，可以“按图索骥”，当作一种索引。我准备把“呪”的材料编成一部《梵汉对音录》。

章炳麟曾经给苏曼殊的《初步梵文典》作序，说：

夫求大义者虑弗能离训诂，内典之有翻译名义，若儒书有说文、尔雅也。唐人說悉曇者多至百余家，今皆晦蚀不可见。始湛然著《辅行传》，已多支离，及宋世法云撰《翻译名义集》，譌舛尙众，余每恨樊公不为斯录，而令疏拙者皮傅为之也。(章氏丛书，别录三，78页。)

我想为他“下一转语”说：樊公虽不为斯录，而玄应、慧琳之书足弥此恨。关于玄应、慧琳的《一切经音义》，可以看陈垣先生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科学出版社)卷三、卷四，61—83页。(关于《辅行传》，见同上84—85页。)特别是慧琳(公元737—820)是一个疏勒人，属于“不空学派”，他的书中还有若干条中亚语词，关于“苏幕遮”等等的解释也很好。玄应的书中还有古汉语的方音材料。这都是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的。

关于用汉字对音的梵语单词的材料，如日本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等处所收的，就我所见，以《一切经音义》为最好。日本影印玄应音义的大治本、慧琳音义的朝鲜海印寺本，现在我国还没有加以利用。我把对音各条抽出，称为《一切经音义梵语》，现在还没有整理好。

(转21页)

# 国际共通語和世界語

赵 觉 誠

自从有了輪船、火車和飞机，人类的接触日益頻繁，世界似乎变得越来越小了。可是，在这“日益縮小”的世界中，語言的紛歧却还像一堵不可逾越的牆似地阻碍着人类的相互了解。为了除去这个障碍，必須有一种在国际間通用的語言，作为人类溝通思想感情的工具。

在紛歧的民族語之外再有一种国际共通語（大家通用的国际語）的理想，在好几百年以前就已經产生了。有很多学者为实现这一理想付出了很大的劳力。据語言学家統計，近三百年来，人們提出来的国际共通語方案大約有五百种之多。这五百种左右的方案，絕大多数是失败了，只有波蘭柴門霍夫(Zamenhof)博士所創造的一种方案是成功了。这就是我們所要談的世界語(Esperanto)。

为什么其他四五百种的国际共通語方案都失败了，而唯有世界語却成功了呢？要回答这个問題，首先要探討一下，一种語言要成为国际共通語，應該具有怎样的条件？我們認為，它必須具有这样三个条件：对各种民族語說来，它必須是中立的，这就是說，它不歧視任何民族語言而对它們一視同仁；它必須是人造的，却又必須在現代人类生活的基础上創造而不能主观地在头脑中空想出来；最后，它必須是一种优美的、富有表現力的而又容易学会的語言。

曾經有人主張，拿一种現成的比較通用的民族語（譬如英語）来作为国际共通語。这种主張虽然有它的方便之处，但是在民族的界限消除以前，特别是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还存在的时候，这种主張是行不通的。这是因为，如果某一种民族語被用作国际共通語，使用这一种民族語的国家或民族就会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而占了很大的便宜，而其他的民族就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吃了亏。这是不符合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則的。何况現在比較通用的民族語一定是某一强大的国家或民族所用的語言，拿这种語言来做国际共通語，就必然会加强这个国家或民族的势力，使其他的国家，特别是弱小的国家处于更不利的地位。举例說，以英語为国际共通語就必然会加强英、美这两大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而这一点不仅所有的被压迫民族不会同意，就是其他的資本主义国家也不会同意，而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不能同意。也有人主張，采用两种比較通行的民族語（例如英語和法語）作为国际共通語，

但是基于上述的理由，这种主張不見得比前一种主張更行得通些。据說曾經有人提議，所有的法国人都学会英語，而所有的英国人都学会法語，这样便可以把英語和法語推广成为国际共通語。但是老練的英国人听到了这个建議之后便說，“既然法国人都要学会英語，那么我們又何必去学法語呢？”这个例子很有力地說明，以現成的民族語——不管是以一种或两种——作为国际共通語这种办法看起来似乎是现实的，事实上却是非常不现实的。

既然以現成的民族語为国际共通語这个办法行不通，那么就只有用一种中立的、不歧視任何民族語的語言来做国际共通語。于是有人想到，拉丁語也許是一种可以充当这一角色的語言。但是拉丁語是一种差不多已經死亡了的語言，用它来充当現代的国际共通語，显然是不合适的。而且它十分难学；过去欧洲的青年学子为了学习拉丁語，不知流了多少眼泪，要現代人学会这样一种艰难的語言而大吃苦头，显然極不合理，事实上也一定办不到。

活的語言既不行，死的語言又不合适，那么能行的就只有人造語了。有人以为人造語很好办，只要造出来就是了。于是有人就閉門造車，制定出各式各样的方案来。有人憑空臆想出一种奇奇怪怪的語言来，也有人造出一大堆符号来，甚至还有人設計出一套像汉字电碼一样的数目字来。不用說，这許許多多方案都是脱离实际生活的文字符号，决不可能成为一种真正的語言。所以国际共通語虽然必須是人造的，却也不能胡乱制造，而必須是根据現代人类的实际生活創造出来的。

不过，如果有人从实际生活出發而創造出一种十分艰难的国际共通語来，一定也推广不了。因为在人类真正进入大同世界而使用一种世界性的語言（这恐怕將是千百年以后的事）以前，国际共通語一定和民族語同时并存，人們只能学会自己的民族語，才能再学国际共通語。因此，人們所要求的国际共通語必須是簡單易学而同时又必須是优美而富有表現力的一种語言。

上面我們簡單地談了談国际共通語所必須具备的几个条件，現在我們来看一看世界語是不是符合这些条件。

世界語不是任何一个民族的語言，它是人造的，它



既不排斥或歧視任何民族語，也不迎合某一民族語。對於一切民族語說來，它是中立的。以這樣一種中立的語言來作為國際共通語，就可以避免前面所說的那種使某一兩個民族占優勢而使其他民族吃虧的弊病。因此，它是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則的。

其次，世界語是在印度-歐羅巴語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它的每一個詞兒幾乎都可以在印度-歐羅巴語的詞彙中找到根源。例如 lampo (燈)，papero (紙張)，lingvo (語言)，這些詞兒都是以現代國際通用的詞彙造成的。因此，世界語雖然是人造的，卻完全不是憑空想出來，而是從實際生活中創造出來的。也正因为如此，世界語不是一種紙面上的方案，更不是符號的堆砌，而是一種有生命力的語言。事實上，在它 70 年來的發展過程和日益廣泛的運用中，它已經成為一種活生生的語言。

世界語的最顯著的特點，同時也就是它的優點，就是它的規律性和邏輯性。

在很多民族語中，字母的發音往往很不規則，一個字母有好幾個音，而有些字母卻又有時不發音。這種發音的不規則性給學習的人增加了不少困難。世界語則不然，它嚴格遵守一個字母一個音的原則，反過來說，也就是一個音只用一個字母來代表。

各種民族語常常有很多“清規戒律”，這些“清規戒律”對語言的功能並沒有很大幫助，而只是使它變得十分繁複和難學。例如在俄語和德語中，一個名詞，不管它是生物或非生物，總有陰性、陽性或中性之別，而隨着名詞的“性”之不同，它所附帶的冠詞或形容詞也必須不同。這種不必要的“性”的區別顯然是不合合理的，徒然成為語言的贅疣。又如動詞，在很多民族語中，往往變化多端，使人摸不着頭腦。其實，除了表示時間和一些必要的變化以外，其他的動詞變化（單複數的變化，人稱的變化和性的變化等等）都是多余的。世界語把這些語言上的贅疣都給割掉了。它的語法規則一共只有 16 條（沒有一個例外），而這簡簡單單的 16 條語法規則卻足以保證它在意義上不致發生混亂了。

另一方面，世界語也保存和發展了某些民族語構造中的有用的和合理的部分。在一些民族語中，某些名詞、形容詞和副詞都有一定的詞尾，使人一望而知它們是屬於哪一個詞類。世界語發展了這個優點，它的所有名詞、動詞、形容詞和副詞都有一定的詞尾（名詞詞尾是 o，動詞詞尾是 i，形容詞詞尾是 a，副詞詞尾是 e），這就使它的詞兒可以自由轉化而又有條不紊，使得使用者在造詞和造句的時候得到不少的便利，同時也使得語言本身十分靈活而富有彈性。

民族語中的詞頭和詞尾的使用也是一種優點。世

界語保存了這種優點，並且加以發展。詞頭和詞尾的廣泛運用使它的基本詞彙大大地縮小。世界語的一個詞根加上詞頭詞尾往往就可以變出很多的詞兒來。例如 -jun- (年輕) 這個詞根，加上詞頭 mal- (表示相反的意思)，ge- (表示男女雙性)，或詞尾 -ul (表示具有某種性質的人)，-in (表示女性)，-ec (表示某種性質)，-ig (表示使…變成)，-iĝ (表示變成)，就可變化出這樣十多個詞兒來：

jun+ec+o 青春(抽象名詞)

jun+ul+o 男青年

jun+ul+in+o 女青年

ge+jun+ul+o+j (j 表示多數) 男女青年

jun+ig+i 使…年輕(使成動詞)

jun+iĝ+i 變得年輕(自動詞)

mal+jun+a 年老的(形容詞)

mal+jun+ec+o 老年(抽象名詞)

mal+jun+ul+o 老头子

mal+jun+ul+in+o 老婆婆

ge+mal+jun+ul+o+j 男女老人

mal+jun+ig+i 使…變老

mal+jun+iĝ+i 變老

由於世界語在發音和結構上都十分合乎邏輯，又由於它的基本詞彙很小，它比任何一種民族語都更簡單易學。同時，它的每一個聲音（特別是元音）的發音都很明朗而清晰，所以它又是一種發音鏗鏘、聲調優美的語言。

有些不了解世界語的人以為，世界語既然是很有規律性的，基本詞彙又很小，它一定是一種十分呆板簡陋而貧乏的語言。這是一種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說法。其實，世界語的規律性只是使它合理化而並不使它受到不必要的束縛。和某些民族語相比，它恰恰因為去掉了很多累贅的規則而更加靈活，更富於表現力。上面說過，它的詞兒可以互相轉化，例如：letero (信) 這個名詞可以轉化為動詞 leteri (寫信)，也可以轉化為副詞 letere (用寫信的方法；letere informi 用寫信的方法通知)。因此，它的每一個詞兒可以說是活的而不是死的。雖然基本詞彙很小，它的詞彙卻並不貧乏，倒毋寧說由於詞兒的自由轉化和詞頭詞尾的廣泛運用而變得更豐富了。世界語同基本英語或我們漢語中的“千字文”根本不同。基本英語或“千字文”是從現有的豐富的語言中抽出有限的詞彙來構成一種簡單的語言或文字，這樣的語言或文字當然是貧乏的。世界語卻一方面縮小了自己的基本詞彙，而另一方面卻用巧妙的方法大大地豐富了自己的詞彙和表現方法。因此，它簡明易學，卻又豐富而優美。人們絕對不能夠用基本英語或千字文來翻譯英國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或

波蘭密茨凱維支的《塔杜施先生》，而用世界語則能够，而且可以翻譯得同原作相媲美。几十年来，各国用世界語翻譯出来的文学名著已經很多，而且用世界語写作的文学作品也不在少数。这就充分說明世界語是一种完美的文学語言。

而且，世界語也像一切活的語言一样，是一种在群众的使用中不斷發展的語言。它的整个發展过程也就是群众集体創造的过程。創造世界語的柴門霍夫在这一点上是十分明智的，就是他并没有为自己保留什么“專利权”，不容許別人对他的語言作任何更动。恰恰相反，他把他的創造品交給了大众，讓它依靠群众的集体智慧在實踐中不斷發展而丰富起来。这是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与实践相結合的原理相符合的。世界語所以能够从紙上的一种語言方案發展成为活的語言，这是一个關鍵性的因素。

應該承認，世界語在目前还没有成为国际間通用

的語言，也就是說它还没有成为国际共通語，它只能算是一种国际輔助語（起輔助作用的語言）。另一方面，由于它被运用的范围还不够广泛，它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詞彙和表現方法还有待于丰富和發展。不过，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由于它富有彈性而吸收能力很强，随着运用范围的扩大，它是完全有条件更加丰富和發展起来的。

世界語虽然还只有70年的历史（和各种民族語的發展史比較起来，70年是一个很短的时期），而且还兩度因为發生了世界战争而受到了阻碍，但是它在促进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上已經起了不小的作用。有很多弱小民族的文学都靠了世界語而傳播于世界。在我們中国所翻譯的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中，也有不小一部分是通过世界語翻譯过来的。随着各民族友好合作关系的日益發展，世界語無疑地可以在这兩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 “階級方言”和“slang”

階級習慣語或叫階級方言(class dialect)，本來是和所謂俚語或俗語(slang)分不开的。它是城市生活的產物，是在某一社会集团的人們之間使用的口語形式之一種。即如体育界、戏剧界、商業界、学生界、軍界、海运界，都有各自通行的一种話，事实上，各个階層的社会集团所用的專門術語同所謂俚語的概念也很难严格区分开。艺术家、科学家、哲学家、宗教家、法律家在他們同行之間都有各自的行話(jargon)，这种所謂“行話”也可包括在俚語里，也可一般地区分开，可是很多情况下是不好区分的，而且在現在各个社会階層交往密切的时代，行話的局限性有日漸打破的趋势。特別是在英語，“slang”的涵义相当广泛，常常同“jargon”相混。某些語言学家就把英語的“slang”認為是階級方言。

关于英語“slang”的語义变迁，《牛津英語大辭典》說，“slang”一詞最早出現于十八世紀中叶，原来仅指的是盜賊用語，也就是后来所謂的“黑話”。到十九世紀初期，有所謂“lawyers' slang”（律師行話），这样又把“slang”同“jargon”混用，可是同“cant”、“argot”区别开了。十九世紀后半期以来，方言俗語成分有許多上升入于标准語，“slang”的地位随着社会的变革日益提高，同时語义扩展，以至包括各个行業用語。

“黑話”，英語說 cant，法語說 argot，日語叫“隱語”。十七、八世紀時，專指乞丐、盜賊等用語，后来使用广泛了，同“行話”（或叫行業用語）有时相混。英語接受了法語的“argot”这个詞以后，使用上更加混乱，近来有許多英語学者認為應該澄清这些名詞的概念范畴。

“行話”本來同“黑話”有时相混，后来大家把“行話”的概念專指各种職業集团內部所用的語言，包括学术上各个專門学科用語，有时把本語言中所用外来語成分也叫做“jargon”，还有兼指粗俗的混雜語如洋涇浜英語之类的。总之，把学术上專門用語和行業上習慣語統通叫做 jargon（行話）的現象很普通。

此外，階級方言或俗語(slang)在許多特定場合改变了用詞和發音。这种把普通詞賦予特定意义或者把普通詞改变語音結構的階級方言，人們都叫做黑話，它只能为狹小的有共同利益的集团服务，但其中也可能有个別成分被吸收到全民語言里的。二次大战中及大战結束以后，軍隊俗語(soldiers' slang)特別盛行，而这些俗語成分有很多为其他社会集团所吸收，在社会流行开来，或者互相滲透于各民族語言之間。这样的例子很多。

由于語言学上的術語和社会通行的術語的分歧，以至大家对这种語言成分的名称有不同的理解。其实，不管叫黑話还是行話，或是其他名称，都不外是階級方言的变体。

（勞寧摘譯自市河三喜著《英語學辭典》，1955年版）



# 关于“社会習慣語”或“社会方言”的討論

編者按：本刊收到鄭達漢等同志對高名凱先生的《普通語言學》和岑麒祥先生的《普通語言學》兩書有關社會習慣語或社會方言部分提出不同意見的討論文章多篇；提不同意見的同志之間，彼此意見也很分歧，現在整理出來發表。同時我們也約請高、岑兩先生發表意見，在下期刊出。

討論這些問題首先碰到術語和譯名的分歧，但是這還不是主要的。問題的主要分歧在於：行業語（профессионализм）是不是社會習慣語（社會方言）的一種？同行語（жаргон）、階級習慣語（階級方言）和黑語（арго）的關係怎樣？

假如我們承認“習慣語”和“方言”可以通用,那么各人對於“同行語”的了解還是很不相同的。為了便于理解,現在把本文所談到的各人的主要分類法(高、岑除外)列表如下:

		行業語(профессионализмы)
契科巴瓦:	社会習慣語 социальные диалекты	{ 階級習慣語——同行語(жаргон) { классовые { 或黑話(арго) { диалекты
郑达汉:	{ 行業語 { 社会習慣語(达水語可取消)——同行語(=黑話)	
陈永正:	{ 同行語 { 社会習慣語 { 黑話	

彭国鈞: 社会習慣語	{	行業語(占很大比重, 健康)	{	階級習慣語
		同行語 (жаргон) (不健康)		黑話 其他不健康的語言
濮之珍: 同行語 (社会習慣語)	{	行業語	{	黑話(階級習慣語)
楊 定: 社会習慣語	{	黑話	{	階級習慣語

## “社会方言”不如“社会习惯語”

· 郑达汉 ·

我認爲“社会方言”这个术语①用得不妥当。显然，这个术语是将“方言”一詞冠上“社会”一詞，来跟“地域方言”相区别的。方言（диалекты）这个术语在普通语言学里指的是地方变体，它源出希臘語，是土話、地方話的意思。即同一語言分布在不同地域而具不同特点的地方語言。由此可見，“方言”是以地域的區別而命名的。如果把它冠上“社会”一詞，組成“社会方言”，用來說明“社会方言”的“語言”現象，是頗爲不妥的。首先，根据高名凱先生的講法，“社会方言不依地域来区分，正如社会阶级不依地域而区分一样”（79頁）。这就說明沿用“方言”（它是照地域区分的）一詞是不恰当的。再就語感上講，确实不慣。試析“社会方言”一語爲“社会之方言”或“社会性方言”，而跟它相对的是“地域性方言”，就会有問題：“地域方言”一般可以不必这么說；只用方言就已够了。因为“方”就是地域的意思，用上地域（或地方）一詞，不过为了更加明确罢了。如果加上“社会”一詞，另組成一个术语，其实解釋起来容易使人糊塗：首先容易使人誤解“社会方言”是一种“話”，像方言一样，具有自己的基本詞彙和語法構造，并且可以發展为独立的語言（因为“社会方言”也是一种“方言”）。这与語言学家們給社会方言所下的定义是不符合的。其次，如果解釋为社会性方言（跟它对应的是地

域性方言),更会造成这样的錯誤:把地域性方言,說为“語言的地方变体”,那末社会性方言,就該是語言(或方言)的社会变体了。这是錯誤的。語言(或方言)的社会性是不容置疑的,为什么会有社会变体呢?所以說“社会方言”这一术语是用得不精当的。在周嘉桂先生譯的《語言学概論》中把它譯成“社会習慣語”(55頁)这从科学性和明确性上講,我認为較“社会方言”好。

## “階級方言”譯名不妥當

· 彭 国 鈞 ·

中国过去沒有階級習慣語这个名称，这是从俄語中翻譯来的。高名凱先生把它譯为“階級方言”(79頁)，我認为是不妥当的。这是一个原則性的問題。我們說方言是按照地域来划分的，它有自己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彙，严格的說，可以称为一种小型的語言，是为全民服务的。而階級習慣語并非为人民群众服务，而是替狭小的社会上層分子服务；此外，它們沒有自己本身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彙，因此它們無論如何不可能發展成为独立的語言。由此看来，“方言”一詞無論如何也不能加上“階級”一詞。如果加上，無疑是貶低了方言的价值。不管高先生給它加上什么解釋，也不能令人相信高先生沒有方言有階級性的主張。承認方言的階級性也就是無意中承認有階級語言。

① 高名凱：《普通語言學》，上冊，79頁。

## 行業語不是社會習慣語

· 鄭 達 漢 ·

契科巴瓦教授和高名凱先生都認為社會習慣語(或社會方言)包括兩個部分:行業語(或職業詞彙)和同行語(或黑話)。不同的是高先生認為行業語是社會方言最主要的一種(80頁),契科巴瓦教授認為“職業詞彙是社會習慣語詞彙中的個別情況”(概論 56 頁)。

我認為行業語不能算作社會習慣語(社會方言),更不能是社會習慣語最重要的一種。首先拿高名凱先生列舉的例子來看。他說:

任何專門手藝的工人……,任何腦力勞動的工作者……,任何其他的職業團體里……,都有他們的行業語。……研究哲學的人不拿出“揚棄”、“矛盾”、“功利主義”、“形而上學”等術語來,仿佛就不像是個哲學家似的;語言學家不說几声“比較方法”、“語族”、“語義學”、“輔音”、“元音”、“同化作用”等,仿佛也就不成其為語言學家似的(80頁)。

為什麼要把“矛盾”、“元音”、“輔音”等術語看作與共同語相對立的东西呢?把這些用語劃分為屬於最主要的一種社會方言的行業語,這就是說,它們不是語言,它們不替人民群眾服務,只是苟且偷生的。實際情況恰好相反。就“矛盾”、“元音”、“輔音”等術語說,我看絕不是幾個專家們的用語;只要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都能懂它,都會用它。因此,我認為這些術語是共同語的成分,而且還用得相當廣泛,是我們漢語詞彙的一部分,並且它們完全有可能發展為基本詞。——它們怎麼會是“苟且偷生”的呢?

如果我們把占語言中一大部的這類詞都劃為行業語,都歸屬於“社會方言”,就會造成兩種不良的後果:

第一,會使人覺得那些不算是語言成分的成分太多了。因為按照高名凱先生的說法,任何專門手藝的工人,任何腦力勞動的工作者,任何職業團體里,都有它們的行業語。社會上的團體,職業的分工是很多而且是很複雜的,因此行業語也便十分複雜了,這樣豈不造成行業語的泛濫現象,其勢力將超過“全民語言”,這是合乎實際的嗎?

第二,會終止全民語言的發展。斯大林告訴我們:語言“是與人的生產行為直接聯系,並不僅與生產行為,而且與人在其工作各方面的一切其他行為(從生產到基礎,從基礎到上層建築)都有直接聯系。”“語言的詞彙承受社會制度的改變,生產、文化、科學的發展的影響是最銳敏的了。”<sup>①</sup>但是,無論生產單位、文化機構或學術團體,在反映生產、文化或科學的發展而增添新詞的時候,首先可能就是本團體的“行業語”。例如“拖拉機”這個詞,首先就產生和運用於農業機械製造部門(或其它有關部門),然後隨着這種機器的廣泛使用,

這個詞也就成為家喻戶曉的“全民語言”成分了。甚至還可以發展成基本詞。如果按照語言學家的說法,這些“行業語”是社會方言的一種,而社會方言“又因為它只是社會里某一部分人所用的,所以它絕不是語言”(高書 87—88 頁)。它們只是無可倖免地苟且偷生,並且注定不能發展。這顯然與事實不相符合,按照這種說法,就會截斷“全民語言”的發展道路。

## 行業語是社會習慣語

· 彭 國 鈞 ·

什麼是社會習慣語?契科巴瓦在《語言學概論》說:

談到社會習慣語,一般指的是某一社會階級,某一社會集團,某一職業的人,某一專門技術的工人們(職工,鞋匠,木匠,石匠,五金工人,鐵路工人,水手等等)的話的特殊性,各種專門技術的腦力勞動者(醫生,農學家,數學家,音樂家,哲學家等等)的話的特殊性,貴族階級,資產階級(特別是他的上層)的“階級”習慣語(55 頁)。

由此看來,社會習慣語就是針對着任何社會階級任何社會集團的語言特點而言,根據契科巴瓦的這一定義,社會習慣語的產生(特別是行業語)也應該說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是生產力提高的標志,是人類科學及文化發達的指標。正因為社會職業分工,出現了各種行業,這才給行業語的發展開辟了道路。國家出現,階級出現,也才給階級習慣語的產生帶來了可能,所以我們說社會習慣語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條件下的必然產物。

可以把社會習慣語歸納為行業語和同行語兩類:

(一)行業語(包括各種專業用語和專門術語):這就是通常我們說的同行業的人們所說的話,它在整個社會習慣語中占着很大的比重,是語言中健康的有生命的东西,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將來到共產主義社會,仍然有它廣闊的發展前途。社會一分工它就出現了。它隨着科學技術及文化的發達,更加發展,更加豐富,是語言發展中的正常現象,自始至終都是豐富全民語言的重要源泉。例如各種匠人,各種專門技術的人,以及各種腦力勞動者,他們各有各的行業,因而也就產生了各式各樣的專門用語,例如,物理學家的“原子、電子、絕緣體、半導體”;法學家的“宣判、起訴、徒刑”;漁業工人的“黑纜、坐池、埋單走”;飯館工人的“招牌飯、桂花飯”等等。這些專門術語反映着社會進步的面貌,標志着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科學技術及文化的發達。最初他們以社會習慣語的身分出現,替這一些特定的社會集團(行業人群)服務,但隨着社會進步,科學文化的普及,它又充當了豐富全民語言的後備軍。這種語

① 《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 7-8 頁, 23 頁。



言的最大特色，不是故意捏造，故意歪曲全民語言，它所以只能為狹小的人群服務，是由於它的生產的社會性質所決定的，別人之所以不懂，那是由於“外行”，俗話常說“隔行如隔山”，就充分地說明了這個事實。不信的話，我們可以舉個例子來看看，要不是“內行”，就很難理解其中某些詞語的意思。

這個社得到高額增產是因為採取了如下的措施：

(1) 是發展各種作業，使淡季不淡，每年夏曆四、五、六、七是拖風淡季，…1954年冬社里早做準備，用公積金添製了“鯊網”，“粗幼網”，“黑簾”，“黑簾網”等，在拖風淡季的時候，可以兼行作業的生產工具。…為了爭取風流，該社還採用了許多克服自然條件的操作方法，如月夜有風拖“夜流”，風力不足時由四船合拖，風力過強時則實行“坐池”，“埋單走”，在寬闊漁場處拖“橫蓬”，漁場較為窄狹的地方才拖“順口”…

(2) …改良“大口網”、“防泥網”，“大小春海”用“薄皮網”，又把“木質浮子”改為“玻璃浮子”。…此外還改良了“卡頭鞋”，“頭裡絞車”，“大桅轆仔”，“絞舵滑車”等工具。…今後對操作方法如“看察”(看幅)，“駛更”，“裝網”，“下網”，“拖橫蓬”，“拖順口”，“坐池”，“埋單走”，“四船合拖”，“拖夜流”等還要進一步提高…。①

在上面一段報導中所寫的這些奇奇怪怪的名稱，很多人就是聽也沒有聽過，至於再提到那些操作方法，則就更加陌生了。正因為文章中使用的詞語很多都是行業語，所以一般人就很不理解這篇文章的內容，但是這篇經驗介紹，對那些同行業的人來說，卻直接影響他們的生產，引起生產上的改革。

(二) 同行語(жаргон)：也就是改了樣子的、歪曲的語言，其中包括“階級習慣語”、黑話及一切不健康的語言。它是階級社會的產物，比行業語出現得晚，是為狹小的階級、集團服務的，是語言發展中的逆流。隨著階級矛盾的尖銳化，它越來越脫離全民語言，以至成為我們今天語言规范化中被淘汰的主要對象。既然是階級社會的產物，所以它的命運就與階級的命運緊密的聯繫着，階級消滅，那些狹小的閉關自守的社會集團消滅，同行語也就煙消雲散了。

## 同行語就是黑話

· 鄭達· 漢 ·

岑麒祥先生在說明同行語的時候，舉例說：

比方同是一個人的配偶，而天子的叫做“后”，諸侯的叫做“夫人”，大夫的叫做“孺人”，士的叫做“婦人”，庶人的叫做“妻”；…“宮”本來是“室也”…後來卻成了天子所居之室的專稱…。每一個階級都可以有它的習慣語和同行語，歷代許多文人或小說家就利用了這些“階級的”習慣語去顯示出他們所創造的人物的階級地位。例如，《鏡花緣》里唐敖的許多說話就不是多九公所能說得出來的；《紅樓夢》里

賈政等人的許多說話也不是劉姥姥所能說得出來的。②

我認為這樣的說明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學理論的。“后”、“夫人”、“婦人”、“妻”、“宮”(宮殿、皇宮)等詞是“階級”習慣語(同行語)嗎？我認為不是。正如我們不能因為兒子在父親面前不直呼父名，只能喊“爸爸”、“爹”而認為“爸爸”、“爹”是同行語或“階級”習慣語一樣。“后”(皇后)絕不是皇帝“階級”才懂才用的詞，相反地，“妻”也不是皇帝、大夫所不知道的。那末，我們根據什麼理論說這些用語就是同行語或“階級”習慣語呢？

與此相同的道理，我們也不能認為作家顯示他所創造的人物的階級地位是利用“階級”習慣語的結果。

我們就隨便舉劉姥姥和賈政各人一段話來看吧。

劉姥姥帶着板兒向鳳姐借錢，先聽見告艱苦，以為沒想頭了，後來聽見給他二十兩銀子，喜的眉開眼笑道：“我們也知道艱難的，但只俗話說的：‘瘦死的駱駝比馬還大呢。’憑他怎樣，你老拔一根寒毛，比我們的腰還壯哩！”(《紅樓夢》，67)

在看到一番田園景色的時候，賈政笑道：“倒是此處有道理。雖系人力穿鑿，卻入目動心，未免勾引起我歸農之意。……”(《紅樓夢》，164頁)

的確，劉姥姥那種“粗俗”之言是不會出自賈政口的；賈政的那番文縷縷的話語劉姥姥還未必全能理解。但這是因為作者應用了“階級”習慣語的原故嗎？絕對不是。

所謂“階級”習慣語和同行語，是人們創造的一些特殊詞語，人們故意要使他只有本集團能懂而其他的人不能懂。為了創造秘密語言，使周圍的人不能了解，於是把全民的詞彙人為地變成各種各樣，歪曲詞意。因此，斯大林說，“階級習慣語，更正確些說，應當叫作同行語，並非替人民群眾服務，而是替狹小的社會上層分子服務。此外，它們沒有自己本身的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因此，它們無論如何不能發展成為獨立的語言。”

回頭看看上面舉的例子。這兩段話可以反映兩人的不同文化素養、階級地位以及個性特點，這確是作者文妙之處。是不是說，劉姥姥說的話別人不會這樣說，就只為劉姥姥這類人服務，只是這類人才懂呢？相反地，賈政的話也只是服務於他這類人中間，只有他們說，他們懂呢？如果是這樣，《紅樓夢》這部優秀的小說就會存在不了，因為作者盡用些人們不能聽懂的話來寫(或者處於劉姥姥地位的讀者，看不懂賈政等人的話，或者處於賈政地位的讀者，看不懂劉姥姥的話)。事

① 廣州《南方日報》1956，2，23，第二版《拖網漁業獲得高額增產的經驗》。

② 岑麒祥：《普通語言學》，科學出版社，1957，71頁。

突当然相反。正因为它能为人民群众所接受所喜爱，所以才流传了下来，并在人民群众当中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然而如上所述，他们之间的语言确有不同，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人们由于阶级地位、文化素养以及个性的不同，他们的说话、措辞也便各有特点。例如性格直爽、坦荡胸怀的人，他说话一定是开门见山，直率明朗，很少迂迴婉转的；喜欢阿諛奉承的人，一定是娇声滴气，油腻腻的。劳动人民说话一般都是生动形象，朴素而有深厚的生活气息的；有闲阶级因为远离生活，说的话一定是些干瘪的书本上的陈词滥调。……刘姥姥所说的话，就能代表一般劳动者的话。由于自己是劳动者，与劳动群众密切接触，与生活紧密联系，生活是生动活泼的，因此，他们的语言也便是生动活泼的、形象开朗的。在一般所谓有素养的人看来，这种话是粗俗的。贾政之流所说的语言，由于他们脱离生活，脱离劳动，只是在书本上学一些教条，自然语言也就是文绉绉的、雕琢的，其实是死板的、干瘪无味的。正因这个原故，毛主席才一再教导知识分子去改掉“学生腔”，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言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sup>①</sup>

按照这种对同行语的说明，即把“宫、室、妻、后”等当作同行语，把显示刘姥姥和贾政阶级地位的语言看做作者使用阶级习惯语的结果有什么害处呢？

第一，使人们对全民语言和阶级习惯语（同行语）混淆不清，“同行语”将泛滥起来，并有代全民语言而起的危险。

第二，变相地承认了语言是阶级的，语言有阶级性。因为根据这种说明，如果我们承认“宫、室、妻、后”等是语言，承认刘姥姥和贾政所说的也是语言，而这些语言又只能用于特定的阶级（如统治阶级、庶民阶级），这不是告诉人们这样一个结论——语言是阶级的吗？

所以，对同行语作如此说明是错误的。斯大林说的对：同行语的范围是极狭小的。它只能是苟且偷生的，没有自己的基本词彙和语法构造，并且注定是不能发展的。

“阶级”习惯语和同行语的范围是极为狭小的。因此称同行语为黑话是很恰当的。它是人们创造的故意要本集团能懂而其他的人不能懂的“语言”，它是苟且偷生的，任何少许的限度上都不能够代替全民的语言，并且是注定不能发展的。“社会方言”的公式只适于这种“语言”，而绝不适于“行业语”，所以“社会方言”（或社会习惯语）一说是可以取消的。在斯大林的语言学著作中，也是不曾提到什么“社会方言”或“社会习惯语”的。

## 同行语不是黑话

·陈永正·

高名凯的《普通语言学》上册 81 页有这样一段话：

可知“同行语”这个术语，指的是改了样子的歪曲的语言，实际就是中国人所谓的“黑话”，……黑话的范围很广，各职业团体，各社团都可能黑话。学生们也有学生的黑话。

这段话有可以商榷的地方。

我们认为同行语不是黑话。理由有二：1) 斯大林说：“在这方面那些脱离人民并且仇视人民的有产阶级上层，如贵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表现得特别厉害。他们创造‘阶级的’习惯语，同行语，客厅‘语言’”（10 页）。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创造同行语的只是那些贵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假若同行语“实际就是中国人所谓的‘黑话’”，那末，可能有黑话的各职业团体、各社团、学生们都会是“脱离人民并且仇视人民的有产阶级上层”了。这是说不通的。2) 《苏联大百科全书》《同行语》一条说：“必须把同行语和黑话区别开来，黑话是狭窄的闭关自守的职业集团的特殊用语，往往带有秘密的性质。……除开这个团体的职业上的活动外，黑话词彙还经常使用于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更广阔的范围内。……无业游民（乞丐、流氓、小偷）的黑话即所谓贼话（盗贼的语言）有职业秘密用语的特性。”<sup>②</sup>四川渠县在解放前土匪使用的黑话“捉肥猪儿”（把有钱的人活捉去以便勒索）“砍路板子”（拦路搶劫）等都有职业秘密用语的特性，这些都是全民语言的寻常词彙，显然是与“以其语词区别于全民语言”<sup>③</sup>的同行语有区别的。

## 同行语和黑话有区别

·彭国钧·

同行语不是我们俗话常说的同行同业人所说的话，这是翻译来的名称。照高名凯先生的意见：“同行语俄语叫 жаргоны。俄语的这个词是从法语借来的，原来法语的是 jargon，意思是歪曲的语言，jargon 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歪曲的词，是把 argot 改了样子歪曲说出来的。argot 的意思是偷儿的语言，可知同行语这个术语指的是改了样子的歪曲的语言”（81 页）。但是，高名凯先生接着又说：“实际就是中国人所谓的黑话”（81 页）。这样提法我认为是不够全面的。黑话固然和同行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并不完全相同。黑话应该说只是同行语当中的一种，反过来，提到同行语也不能说就是专指黑话而言。

① 《毛泽东选集》，838 页。

② ③ 《中国语文》1954 年 10 月号，22 页。



的确，有这样的事实：中国过去把一切不正派的語言都叫做黑話，以語言学的观点来看，这是不科学的、籠統的說法。誠然中国过去沒有“同行語”、“階級習慣語”这些名称。因此一概把它叫做黑話。但是就我們語言存在的实际情况来看，同行語和黑話應該是有区别的。我們說同行語既是指改了样子的歪曲的語言，那末改了样子的歪曲的語言又豈止黑話一种？資產階級上層分子的“雅語”、“客厅語”又何尝不是改了样子的歪曲的語言。这就是說階級習慣語不是健康的語言，是改了样子的歪曲的語言。因此我們說同行語應該是包括一切改了样子的不健康的語言，即“階級習慣語”、“黑話”等同屬於同行語之列。

同行語的意义，实际上就是指階級習慣語、黑話等这一些仇視人民的不健康的語言。（在翻譯上为了避免与行業語相混，我們似乎可以把它譯为“变形話”或“变态語”。）这些語言由于階級的对立，由于資產階級剝削思想的影响，使得他們帶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仇視人民，有意歪曲全民語言。剝削階級利用他来达到自己的政治上及經濟上的一定目的。斯大林在《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一書中着重地說：

語言作为人們在社会中的交际工具，同样是替社会上一切階級服务的，在这一方面語言表现出对于社会各階級是一視同仁的，但是人們，个別的社会集团，个別的階級，对于語言远不是漠不关心的，他們極力設法利用語言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把自己的特別的詞彙，特別的術語，特別的用語，強加到語言中去，在这方面，那些脫离人民，并且仇視人民的有产階級上層貴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表現得特別厉害，他們創造“階級的”習慣語，同行語，客厅“語言”（10頁）（重点是引者的）。

这就是那些仇視人民的不健康的語言的精神面貌。同行語又可以分为階級習慣語和黑話：

**階級習慣語：**从理論上講，它應該包括各个階級的話，自然也包括工人階級及广大劳动群众的話；他們的語言事实上也有他們的特色，这一点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階級狀況》一文中也曾經指出过，但是这与資產階級的“雅語”、“客厅語”有本質上的不同。工人階級及劳动大众的用語，它与生产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健康的，而且也是全民的（因為他們占人口总数的90%以上），因此这里指的階級習慣語，只是指資產階級上層分子的不健康的話而言。这种階級習慣語与黑話虽然都屬同行語，是歪曲了的不健康的語言，但是就性質上来看，它們也各有不同。一般來說，黑話是为社会集团服务的，而階級習慣語则是为剝削階級的上層分子服务，封建社会及資本主义社会是产生这种語言的最大前提。比如，1066年英国被法国北部的諾曼族所征服，統治階級的朝廷、法院、教堂等都通用法国話。这种風气一直維持到14世紀。另外，俄国貴族有个时候

在宫廷里和客厅里，也有一种愛說法国話的癖好。至于中国过去由于資本主义不發达，資產階級上層分子的所謂“雅語”表現得并不突出，但是在長期保存着封建社会的中国，地主階級的“雅語”倒是表現得十分厉害。例如一般所謂的上流人物，說話时总是之、乎、者、也，对人必称“尊”称“貴”，对自己則說“賤”說“小”說“鄙”，心里未必如此想，但口上总是这样說。再如把生孩子叫做“弄璋”（或弄瓦），把地主階級叫做“老爷”，把貪官污吏叫做“青天”，把劳苦大众叫做“蟻民”。媚上欺下，心口不一，这就是他們的处世哲学。他們所以如此，只不过是表面上把自己裝得彬彬有礼，而突出的显示自己典雅高貴。

近二三十年来，随着英美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又产生了以蔣、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买办階級，他們一切都崇拜西方帝国主义，全盤西化就是他們的主張。胡适、林語堂等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他們也如英国俄国的貴族資產階級一样，以會說洋文为荣，他們欺宗灭祖，企圖用洋文来代替自己的民族語言。

如此种种就是典型的剝削階級的不健康的語言。这种語言的最大特色，就是在詞語上、風格上，强烈的表現了这些剝削階級的階級意識。

**黑話：**《苏联大百科全書》《同行語》条中說①：

黑話是狹窄的閉關自守的職業集团的特殊用語，往往帶有秘密的性質，只有該集团的成員能了解…。虽然除开这个集团的職業上的活动外，黑話詞彙还經常使用于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更廣闊的範圍內，…不是独立的語言或方言，而是寄生于全民語言之內，它不仅利用了全民語言的語法，而且还利用了全民語言的大部分的尋常詞彙。發展这类特殊黑話的有利前提是封建社会的行會制度，但是这种現象的残余，还保留到資本主义时代。無業游民（乞丐、流氓、小偷）的話，即所謂賊話有職業秘密用語的特性。黑話的詞彙建立在形象的比喻…，有条件的歪曲本族語言的詞，和大批借用的外來語之上。在現代資本主义社会統治階級的語言中，模仿艺术上的放縱主义者那样時髦的以黑話来炫耀自己，是生活腐化的标志之一。

可見黑話也同階級習慣語一样，沒有自己的基本詞彙及語法構造。

这里我們要着重指出階級習慣語同黑話在本質上的差別。階級習慣語的产生是以階級为基础，而黑話产生的前提則是靠一定的社会集团，这种集团除經濟的職業集团外（如行商、小販等），自然也包括各式各样的政治集团，他們利用黑話来为他們服务，来达到他們在政治上及經濟上的目的。黑話既是以集团为基础，它自然就不受階級的限制，在这种集团中可以包括有

① 《苏联大百科全書》也曾指出同行語同黑話是有区别的（《中国語文》1954年10月号22頁），但是在区分的範圍上，我的意見与大百科全書略有不同。

各种阶级出身的人。例如在旧中国各地盛行的反动的政治集团——青红帮，其中就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有流氓，也有落后的农民；他们在政治上结成联盟，跟国民党反动派一鼻孔出气，在农村中作威作福，通过种种手段来巩固反动派的统治。

总之，要在一定的社会集团（经济的或政治的）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不健康的语言，才是典型的黑话。

现在我们就各地方言，分别举出一些典型的黑话的例子。

从前广东的盗贼集团，把“糖”叫“甜砖”，“茶”叫“清莲”，“笔”叫“茅枪”，“屋”叫“寮”，“鱼”叫“摆尾”，“汤”叫“顺”，“药”叫“太平”，“锅”叫“黑地”（可能是“黑底”之误——引者注），“刀子”叫“利”，“薯子”叫“地龙”，“轿子”叫“黑马”，“抢人财产”叫“做生意”，“抢不到”叫“没有生意”，“被抢去的人”叫“参”，“上山当盗匪”叫“当太公”。①

云南的盗贼集团，把“我”叫“俄罗斯”，“你”叫“呢畢”或“呢博”，“他”叫“塔拉”，“姐姐”叫“接接高”，“父亲”叫“八叉”，“长衫”叫“寶燕”，“屁股”叫“琵琶琵琶子”，“听得懂”叫“丁得勒”。

云南滇西一带的马帮，把“眼睛”叫“灯笼”，“柴”叫“站杆兒”，“馓子”叫“抱腰”，“火钳”叫“炸膀”（炸讀[ts]，因云南話沒有卷舌音虫、ㄣ、尸），“吃肉”叫“下素”，“夜間露天宿营”叫“望星星”。

昆明收买旧衣服的流动小商贩怕别人抢夺他们的生意，也把数词改为“逗拐”、“倍财”等\*（笔者曾访问过两次希望了解所代表的实际数目，但他们始终遵守他们的行会规矩，不肯泄露出来，直到现在仍不能注出所代表的实际数字）。

解放前在生意买卖中都有一个介绍人，一般通称“經紀”，云南又叫“押子”，这种人在生意买卖中作用很大，专靠这种密语或手势（一般在衣服下边捏摸）来勾通买卖双方的生意，他在中间可以既当买主，又当卖主，从中渔利。赵树理同志在小说《三里湾》中描写的王小聚就是这类典型的人物，其中尤以牲畜买卖最为盛行。他们也是在数词及牲畜的名称上翻花样。如云南的“押子”把“九”改为“大勾勾”，“六”改为“小勾勾”，“三”改为“香爐脚”，“四”改为“板板脚”，“五”改为“一巴掌”。

解放前夕在广州、香港的金融行商中，也流行着一种黑话，他们把国民党反动派发行的钞票，如伪法幣、金元券、银元券等叫做“湿柴”，把港幣、银元、半开（云南过去的地方硬幣）等叫做“威龙”，这也充分的反映出当时人民对反动派所发行的货币的看法。

除此之外，由于汉字特殊的字形构造，也提供了他们一些造黑话的办法。如广东的盗贼集团把“乡村”叫做“木寸”，亲戚叫做“立禾”，“先生”叫做“牛一”。② 这些都是根据汉字特殊造形的条件来歪曲全民语言的。上面所说的云南的盗匪集团把“父亲”叫做“八叉”可能也是这种做法。

其次，学生团体中也流行有一种不健康的语言。有的是在词语上翻花样（如把“恋爱”叫做“互助组”，考试叫“过关”，吃肉叫“擦枪”或“擦机器”，一般的渾名绰号也是这类性质），有的是改造全民语言的语音系统。如福州話中的

“哨語”就属于这类性质，就是把任何一个音节都拆成两个音节来唸；第一个音节保存原来的样子，第二个音节则是以原来那个音节的韵母为韵母，然后再配上一个[s]为声母，如“你”唸成[ny-sy]，“我”唸成[ɲuai-suai]。任何一个音节都可以如法炮制。

昆明部分学生中也流行有一种“可可話”，办法也同福州的“哨語”差不多，也是把一个音节拆成两个来唸，但次序却同福州的“哨語”恰恰相反，它是第二音节保持原样，第一个音节是取其原来的韵母为韵母，然后再配以一个[k']的声母。若遇原音节的声母是[k']，则一律重讀原音节一次，或是把[k']換为[k]。如“我”唸成[k'o-uo]，“你”唸成[k'i-ni]，“他”唸成[k'a-t'a]而“看”有时唸[k'an-k'an]，有时又可唸[k'an-kan]。

在学生中流行的这类话，就性质上说是与黑话相近的，但也不完全与帮会行商的话相同。很清楚，学生并不赖它在政治上、经济上来达到预期的目的，而造这种话的动机则多属一种打趣诙谐的游戏性质。学生最时髦，模仿性较强，也最能赶上社会发展的潮流，在阶级社会里也许是得了阶级习惯语的传染病，才产生出这种不健康的语言。解放后的事实证明，这种话也随阶级习惯语的死亡在逐渐的减少，甚至消灭了。

上面所说的才是比较典型的黑话，但是我们必须把文学修辞上形象的比喻与那种带比喻性质的黑话区别开来。在这一点上，我的看法也与高名凯先生的不一致，高先生在《普通语言学》上册86页中说：

中国的黑话管铁面无私的人叫包公，至于学生们也拿《水浒传》的人名来彼此暗指，从前的绿林好汉也常取个“赛诸葛”、“小孔明”、“小李广”之类的绰号，无聊的才子佳人也常拿“贾宝玉”、“林黛玉”来互相称呼等等。

我认为这不是黑话，这是文学上的修辞比喻，是健康的，是有生命的。它并不敌视全民语言，并不故意歪曲全民语言，也并没有故意要让人听不懂，更主要的是它并不专为某些人服务，任何阶级、任何集团的人都可以用这一种比拟来表达他们的思想。也可以说它是全民的，文学作品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如“人人皆为尧舜”（以尧舜代贤者），“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以杜康代酒），“功名全仗邓通成”（以邓通代钱），以“丝竹”、“管弦”代音乐，以“翰墨”代文章，等等。这类例子很多，直到今天，我们活的语言中也还有“希望我们厂里，多出几个王崇伦”（以王崇伦代先进生产者），“多有几个黄继光”（以黄继光代英雄）这一类的话，若把这样的话也

①② 岑麒祥：《历史语言学中分化作用及统一作用》，《中山学报》创刊号，1942。

\* “逗、倍、母、县、拐、土、兆、财、灣、分”是昆明小商贩用以代表一到十的十个数字，一般可以扩大十倍、百倍甚至千倍…使用，这里的“逗拐”可作“十五”或“一百五十”…，“倍财”可作“二十八”或“二百八十”…。——编者



列为是不健康的黑話，是語言规范化中被淘汰的对象，我認為是不够妥当的。

黑話也同地方區域性的禁忌委婉語不同，禁忌委婉語從詞彙上看是与全民語言的詞彙有所不同，但實質上在这个小型的地區來說，它也是全民使用的。如廣州人把“猪舌头”叫“猪利”，“猪肝”叫“猪潤”，“通書”（黃曆）叫“通胜”，“空房”叫“吉房”，“傘”叫“遮”等。这也不是故意捏造，或故意歪曲全民語言，而是因为人民群众在某个时候还存在有一定的封建迷信思想，对一些所謂不吉祥的話加以避諱，等到一定的时候，群众觉悟提高了，迷信观念破除了，这种情况自然也会慢慢的消失，那些禁忌委婉的詞語也就会恢复他們原来的面貌。事实上今天在廣州已經有很多人不再把“猪肝”叫做“猪潤”了。

因此我們不能把社会習慣語了解为社会上除方言以外一切不同的語言現象。語言的本質是社会的，所以我們也必須从社会性上来了解“社会習慣語”，男女之間，不同年齡之間，誠然也存在着某些語詞上的不同，这是决定于不同的社会心理及不同的文化程度。老年人經驗多，見聞廣，知識丰富，他們所掌握的詞的概念，自然多是小孩及青年所不能理解的。相反地，也有很多孩子們的遊戲和玩具名称老年人或成年人也一样不知道。男女中間受了傳統的雅俗觀念的影响，也保留着一些不便相告的話。如女同志不便說大小便，而要說“解洩”，有的更連“解洩”都不好意思說，而要說“有事情”，这同黑話不同。男女老幼既不是什么階級，也不是什么集團，經濟上政治上也並沒有企圖达到什么目的，更沒有和全民語言相对抗。所以我們說男女之間，不同年齡之間，不可能存在有社会習慣語。若是抽去了社会習慣語的这一个社会性的本質，从一些表面現象出發，形式主義地去理解，那就要把社会習慣語弄成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了。

## 黑話不是階級習慣語

· 楊 定 ·

濮之珍同志的《語言》一書<sup>①</sup>关于同行語的說法是值得商榷的。他說：

同行語有兩種情况，一种是職業性專門技術的語言。例如木工、石工、紡織工…等，他們有一些專門技術性的同行語。…另外一種情况是資產階級上層分子，他們為了個別集團的利益，創造一些黑話，例如他們把數字變成秘密語：如一叫旦底，二叫挖工，三叫橫川…，等等（12—13頁）。

从作者所舉的例子看来，作者所謂的“同行語”是

<sup>①</sup> 新知識出版社漢語知識講話之一，1956。書評見上期本刊。

指廣義的同行語而言，也就是其他語言學著作所說的“社会習慣語”；而作者所謂的“黑話”就只是指資產階級上層分子所創造的“階級”習慣語而言。这样，就把資產階級上層分子的“階級”習慣語和黑話等同起来，也就不能使人們解釋階級社会中除了資產階級上層分子的“階級”習慣語以外的一些黑話事实。的確，黑話和資產階級上層分子的“階級”習慣語有共通之处，同是为了社会上某些集团的利益創造出来的，同样是对全民語言的歪曲。但是，它們之間还是有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談。它們之間的區別主要在于：資產階級上層分子所創造的“階級”習慣語是从階級立場的角度歪曲全民語言。在这些“階級”習慣語中，充分的表現了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正如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中所說的，在这些習慣語中，“有的只是一些反映貴族或資產階級上層分子特殊趣味的特別的詞，一些拋去了民族語言中‘粗野’用語和辭句的特別風雅客氣用語和辭句以及一些外國詞”（11頁）。而黑話呢？它不是替狹小的資產階級上層分子服務，它也不是“反映貴族或資產階級上層分子特殊趣味的特別的詞”；它是社会上某些集團，为了各式各样的目的，欺騙蒙蔽別人，进行各种活動而故意捏造的。

還有，从階級立場角度歪曲全民語言的，也不是只有資產階級上層分子。如作者在書中所舉過的那些例子，說明旧中國的封建地主階級上層分子，也有過一套特殊用語。他們稱別人的孩子為“貴公子”，稱自己的孩子為“小犬”，等等。過去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上層分子，雖然同是屬於仇視人民敵視人民的剝削階級，但他們還是处于不同的階級地位。因此，僅用資產階級上層分子的“階級”習慣語（即作者所說的黑話），也不能完全說明各个剝削階級上層分子的特殊用語。

根据以上所說，作者所理解的“黑話”是不符合客觀事实的。

## 希望統一語音學術語

楊 長 礼

語音學術語不統一的現象很早就存在了，可是到現在還沒有把這個問題解決。術語不統一對初學者來講是一個小難關，因為術語不統一，初學的人就必須記兩套或三套術語才能看懂語音學方面的書。比如高元音，有的書上叫閉元音，有的書上叫狹元音；唇齒音，有的書上又把它叫做齒音。甚至一個術語有五種不同的稱呼，如舌尖後音又叫卷舌音，又叫翹舌音，又叫舌尖硬顎音，又叫舌尖前顎擦音。一個術語有好幾種叫法，對語言學家來講並不算一回難事；可是叫一個水平不高的初學者同時記上好幾個意義完全相同的同義詞，不能不說是一種額外的負擔。

# 语文短评

编者按：本期短评的材料都是《人民日报》的，不再逐条注明出处。

184 而他的第一个孩子还差一天不满月。(1956年11月14日6版)

“不”字要来何用？完全可以省去。(米青)

185 下午三时三十分，各个单位的运动员根据传统由希腊选手领头，按照英文字母的排列顺序先后进入运动场。澳大利亚运动员是主人，所以在最后进入会场。他们受到了看台上十万多观众的欢迎。(1956年11月23日6版)

从语法关系上看，“他们”指的是“澳大利亚运动员”，因为离得最近。可是事实上被观众欢迎的是全体入场的运动员，不只是澳大利亚运动员。应当把“他们”换作“运动员们入场时”。(徐仲华)

186 商人们没有乘机抬高物价，也没有看到抢购的现象。(1956年11月25日1版)

没有看到抢购的现象的是商人们呢，还是另有其人？显然另有其人。(这是记者引用一位同志的谈话中的一句。)那么后一分句的主语“我”是不能省去的。因为不同主语的分句，主语是省略不得的。(程祥徽)

187 乌克兰巴托市政府的一位负责人告诉我，现在，在这个城市里的人民，每五个人中平均有一个人曾受到高等、中等和初等教育，每年还有更多的人入学。(1956年11月26日5版)

1)“在”这个介词是多余的。2)“平均”应该放在“每”之前。3)“每五个人中有一个人曾受到高等、中等和初等教育”，从逻辑上讲，一个人既已受到高等教育，那中等和初等教育一定也受过的，何必把“中等和初等教育”也写上。如果这里的“和”实际是“或”的意思，那就意味着五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受过教育，其余四人都是文盲，这恐怕也不符事实。“曾受到”会不会是“正在受”之误呢？有可能。无论如何，记者没有把话说清楚。(咸勇)

188 现在，有些人也很喜欢把自己用一种特殊的套子包围起来。这种特殊的套子，就是这些人在自己的周围渲染着一种气氛，一种很特殊的气氛，使人(或者说是群众)看上去就觉得被一种无形的套子紧紧地包裹起来，而不得不产生了一种“敬而远之”的情绪。(1956年12月3日8版)

1)“被一种无形的套子紧紧地包裹起来”的是那些“喜欢把自己…包围起来”的人，不是去看他的别人(或者说是群众)，应当在“被”字之前加个“他”字。2)在“不得不”之后，动词一般不加“了”，“产生了”的“了”应该删去。(紫明)

189 编辑人员要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要给他们深入生活和写作的时间。(1956年12月4日7版)

“他们”指谁？照文句看，指“人民群众”，但是这是讲不通的。这句话很容易改正，只要把“给他们”改做“有”就成了。(丁世俊)

190 人们都以亲切的目光注视着和倾听着这位老战士的发言。人们关怀他几年来的监狱生活，已使他的头髮变得灰白。(1956年12月6日5版)

第一句有个小毛病。“发言”有两个意义：如果指发言的内容，那是可以“倾听”的，可是不能“注视”；如果指发言的动作，那是可以“注视”的，可是又不能“倾听”。现在要“发言”同时做“注视”和“倾听”的宾语，讲起来就有点为难了。第二句的问题在于“关怀”的宾语是什么？照现在的标点，“关怀”的宾语是“他几年来的监狱生活”(改为“他几年来在监狱里的生活”较好)，但是底下“使”字就没有主语，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使他的头髮变得灰白。如果把逗号去掉，“监狱生活”就可以做“使”的主语(作者的本意该是如此)，句子的结构正常了，可是要叫“监狱生活使…”这句话做“关怀”的宾语，也还是有问题的，因为“关怀”的宾语一般只是一个名词。我们关怀一个人的生活，甚至也可以关怀一个人的头髮，但是对于监狱生活使他的头髮变白这件事，我们只是“注意到”而不是“关怀”。(张友建，程好问)

191 在那里(按，指匈牙利)，很大一部分工人阶级和进步人士手执武器…。(1956年12月12日6版)

工人阶级只有一个，不能说“很大一部分”。应该删去“阶级”二字。(雨田)

192 …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就把这篇文章印发一切农业合作社，以供参考…。(1956年12月23日1版)  
“印发”后面该加“给”字。(温端政)

193 参考书分析得不够深入、模糊，是很清楚的…(1956年12月25日8版)

1)作者的意思是分析得“不够深入”和“模糊”，但是照现在的措辞，很难避免误解为分析得不够“深入和模糊”，而这是讲不通的。应改为“分析得不仅不够深入，而且相当模糊”。2)“是”字前面最好加一“这”字。(宋玉柱)



194 为了滿足各界观众渴望欣賞此片的迫切心情，特于1957年元旦起，在本市增多影院、扩大映出。請注意映出影院及上演時間。(1956年12月27日8版)

在这篇广告中，乍一看，好像是要在本市新建或新开辟几个电影院，以滿足各界观众对欣賞《祝福》这部影片的要求。但是实际上广告的意思是从1957年元旦起，要在更多的电影院里放映《祝福》这部影片。如果改成“…在本市更多的电影院扩大映出此片。請注意…”，或者“在本市更多的电影院增加映出場次。請注意…”那就明确得多了。(魯揚)

195 办理这条綫上各站互相間的旅客、行李、包裹以及大宗的和零星的貨物。(1957年1月1日2版)  
“办理”是“做(或处理)”的意思，但是“办理…旅客…貨物”的語意不明，应该在“貨物”之后加上“等运输業務”。(周恩源)

196 在我国仅仅只有北京大学东語系培养阿剌伯文干部。(1957年1月11日7版)  
“仅仅”就是“只”的意思，应该删去其中的一个。(楊行健)

197 諾臘特曾随同梭發那·富馬首相訪問中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1957年1月29日6版)  
看了这一句，讀者会以为是說中国人对諾臘特有深刻的印象。但是讀到下文，就知道作者的意思是諾臘特对中国有深刻的印象。那末諾臘特不是“留下了…印象”，而是“获得了…印象”。(梁吟)

198 这些新农具經過有关部門技术鑒定后，大部分都在全省內进行推广。(1957年2月2日3版)  
現在的文章中很多無用的“进行”，这是千百例中的一个。应删去。(金有景)

199 我們參觀的演出叫“伊沙白·柯林案件”，写一个未成年的工人的女兒被迫为妓女而被控告的案件。(1957年2月3日5版)  
是“一个工人的未成年的女兒”，不是“一个未成年的工人的女兒”。(程好問)

200 除夕是一年中最为丰富的一餐。这一餐叫做“团圆飯”。(1957年2月4日8版)  
“除夕”不能“是…一餐”。应当在“除夕”后加“的晚餐”三字，把第一个句号改成逗号。(魯揚)

201 真的，我們这些比較負責的“公家人”活在世上，除了上班办公以外，一切私事，無論衣、食、住、行、娱乐、看病，也無論婚、喪、嫁、娶，孩子的生育、撫养和讀書，全給公家“包干”了。(1957年2月5日8版)  
这个句子，粗看起来好像很通，但仔細看，却很值得商榷。1)“孩子的生育”和“孩子的撫养”这两个詞組里“孩子”是被动的，而在“孩子的讀書”这个詞組里“孩子”却是主动的。虽然讀者不至于誤解，但是在这里区别一下还是必要的。2)从意义上來說，公家能給“公家人”包干“衣、食、住、行、…”等等，但“生育”孩子是無法包干的。可以改做：“衣、食…婚、娶、撫养和教育孩子等，全讓公家給包干了。”(野帆)

202 鈴木抨击石桥內閣还想繼續推行受美国奴役的外交。(1957年2月6日6版)  
“外交”后面应加“政策”兩字，才能作“推行”的宾語。(野帆)

203 交警的工作是多么細致和聪明啊。(1957年2月10日4版)  
工作沒有“聪明”和“愚笨”之分，索性把“和聪明”三字删去。(先鞭)

204 当国家体委副主任蔡树藩將国家級裁判的証章和証書授予白鬚蒼蒼、七十六岁的清华大学老教授馬約翰等四十五人的时候，到会的代表响起了热烈的掌声。(1957年2月14日4版)

加黑点部分的措辞可以解釋为荣获国家級裁判称号的四十五人都是“白鬚蒼蒼、七十六岁的清华大学老教授”，虽然不会有人这样了解。可以改为“…馬約翰和其他四十四人的时候…”。(曹克儉)

205 魏喜奎以前所主演的曲剧罗汉錢、柳树井和妇女代表張桂容等，都很能表現出人情味，因此使人感动。(1957年2月14日8版)

“罗汉錢”和“柳树井”是剧名，“張桂容”是“妇女代表”中的人物，三者并列不妥当。如果用剧名，应当改作“魏喜奎在以前所主演的罗汉錢、柳树井、妇女代表等曲剧里，都…”。如果用剧中人，应当改作“魏喜奎以前扮演罗汉錢里的…，柳树井里的…，妇女代表里的張桂容，都…”。(潘佳)

206 但相反的，农村則是干部少，水平低，赶不上合作化猛烈發展的需要。(1957年2月15日4版)  
用“猛烈”来形容合作化的發展不妥貼，可改作“蓬勃”。(金有景)

207 奧馬洪尼揭露美国外交政策受石油資本家所左右。(1957年2月25日6版)  
我們只說“为…所…”或“…被…所…”，不說“受…所”。(畢愚)

208 得到录取中国人民大学的通知后，我几乎乐得廢寢忘食。(1957年3月8日8版)  
录取的是自己，不是中国人民大学。正确的詞序應該是“得到中国人民大学的录取通知后…”。(茅开)

# 书刊评论

《汉字》，傅东华著。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2月第一版。32开，58页，定价0.18元。

这本书是《汉语知识讲话》之一（见1957年3月号《中国语文》第29页报导），全书共分四章，内容介绍如下。

本书第一章，从汉字的通行面最广，汉字的历史最悠久，汉字是独立发展起来的文字，汉字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以及汉字是唯一可以作为艺术品的文字等方面叙述了汉字的特点；虽然所占篇幅不多，却能首先使读者对汉字的性质有一个概括的认识。本章第二节谈到汉字寿命之所以长久，是“由于它的生活力特别充旺”所致，认为元朝的蒙古文字和清朝的满文没有取得汉字的地位而代之，就是证明。这样的提法没有联系到汉字的历史条件和文化条件来谈，过于简单。

第二、三两章所讲的，是本书的主要内容。第二章先讲述了汉字是怎样产生的，然后详细地分别给“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作了解释；第三章介绍了几千年汉字字体的演变过程。这两章写得深入浅出，征引的材料很丰富，还有颇为珍贵的有关字体的插图对照，特别是在解释“六书”的时候，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好些新的论点。这不仅使读者不会感到枯燥乏味，而且还能使读者对文字学里的某些理论问题知所取舍。这两章正文中有些字如“會(19)、𠂔(44)、𠂔(18)”一般人很难念出，建议再版时也能象别的难认字那样把读音注出来，让读者更便利些。

最后一章谈的是汉字的现在和将来，着重介绍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自1955年1月以来进行汉字简化的过程和简化的原则；并附带提到：将来中国拼音文字实现以后，汉字仍将永远存在。如果读者能再把第一章回顾一下，就会觉得本章结语对汉字未来情况的说明十分必要。（张朝炳）

《普通话词义》，何藹人著。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2月第一版。32开，48页，定价0.15元。

本书也是《汉语知识讲话》之一。作者先说明词和词义的概念以及词义具有的一般特点（概括性、客观性、发展性），然后专就实词的形式和内容简要地阐明有关词义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例如“一词多义”、“词义的发展”、“词义和声音的关系”、“同义词和反义词”等等。所以这本小书虽然声明讲的是“关于汉语词义的一些初步知识”（后记），其实是通过现代汉语的一些常用词（少数未见得是普通话里的）来讲语义学或词彙学中某些基本的概念。那末，书的名称就显得有点勉强，或者说，有点晦涩；虽然名称问题不是很紧要的。

如果把“词彙意义”和“语法意义”分开来看的话，所谓“词彙意义”大约只能限于实词。因此这书声明“是专为讲实词的内容而写的”（3页）。“虚”“实”的界限本来不是绝对的，有些词很实，有些词很虚，有些词介乎两个极端中间。对于这些中

间性的词，各家的解说不一，划界自然互有出入。作者对虚、实词的定义是：“实词有比较实在的意义，能够单独用来回答问题；虚词没有实在的意义，也不能单独用来回答问题，只有帮助造句或者表达语气的作用。”（引言）可是后来讲到实词分类的时候（9—10页），数词里的例子“些”、量词里的“斤、匹、丈、只、顿”和代词里的“多么”之类大约都是不能单独用来回答问题的，（我们不必像L. R. Palmer那样：把一些很难单独用来回答问题的词也硬认为能回答。）与前面的定义显然相左，划界就陷入犹豫。本来作者这个虚、实词的定义很普通，把数、量、代三类词归入实词也很习见；但是把这个定义和词类范畴同时用来区分虚实，就很难处处相合，问题多半从这里产生的。

分析词义必须注意词义的概括性，把词的词彙意义和修辞作用区别开来。本书在谈“一词多义”、“词有比喻意义”和“词义的发展”等问题时，没有很好地掌握上面所说的这个原则，在许许多多地方都把词的比喻作用和“随文见义”的具体用法同这个词的词彙意义不分轻重地混在一起。例如谈“一词多义”时（10页）认为“土地”一词“有下边一些不同的意义”：（1）田地：分得两亩土地；（2）土壤：土地肥沃；（3）陆地：航行了半个月，好容易看见了土地；（4）地产：我有处理自己土地的权；（5）土地制度：土地改革。又如对于“（1）春蚕咀嚼桑叶，（2）牛咀嚼吃下去的草，（3）诗人咀嚼着他的诗句”这三句话里的“咀嚼”，作者认为“意义是有所不同的。蚕吃桑叶，并不是有牙齿可以咀嚼，牛吃下去草再吐到口里慢慢反芻，诗人不过玩味他新得的诗句。”（18页）我们实在看不出（1）（2）两句中的“咀嚼”在词义上有什么不同。作者甚至认为象“请客”这样的词，该是指着请人吃什么或者看戏、看电影之类。到底是请客作什么，若是前文或后文没有交代，这个词的意义就不能“明确”（18页），这更是把词义与章句混为一谈。这样来分析词义非但失于繁琐，而且把一个词的意义反而弄得很模糊。

作者也没有把词义的转变和文字上的假借在概念上分清，例如认为“而、虽、罢、焉、了”等字都是因为这些“实词的意义转变了，就转成虚词的。”所以把这些词放在“词义的转变”一节里和许多真正有“转义”可讲的词混在一起。说“汉语有拟声的‘狗’和不拟声的‘犬’”（30页），这里拟声与不拟声的概念已经叫人很难了解，在这句话的小注里又说：“‘犬’也是产生在口语里的词。那种认为‘狗’是白话，‘犬’是文言的说法是错误的。”这里对“文言”一词的概念更是费解。同样，作者在分析词义时对词与词素的界限似乎也没有在概念上划得很清楚。

书里有一节专讲“声近义通”的现象（31页），举《尚书大传》对“春、夏、秋、冬”四字的“声训”和刘师培《物名溯源》的说法为例，又举一些双声叠韵的字来作证明。就所举的例字看来，非但已经超出“普通话”的范围，而且“春天万物出生，叫它



做chun,为的是和‘出’同声”等等的理論实在叫人怀疑,在这么一本小册子里,我們认为可不必將这种似是而非的說法正面地介紹給讀者。

从普通話和方言的对比关系来談談普通話詞义的特点,我們觉得这是“普通話詞义”这个题目的主要内容的一方面;这对推行普通話也有好处。但是全国方言普查刚刚开始,我們能掌握的方言詞彙材料还过于貧乏,目前誰都很难在詞彙比較的研究工作上做出多大成績,然而这应当是我們为詞彙學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許介芳)

《北京語音學習》,黃伯榮編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11月第一版。32开,128頁,定价0.28元

这是一本普及語音知識的小書,內容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着重講解有关北京語音的基本知識,有“輔音”、“元音”、“声調和語調”、“輕声”、“北京語音特点”等八章。第二部分講解字音和語音,对北京語音中的汉字讀音有較具体的介紹,共分“多音多义的字”、“口語音和讀書音,又讀”、“入声字唸法”等五章。

本書貫穿着为讀者打算,帮助讀者学好北京語音的良好意圖,这在第二部分中尤为显著。讀者可以通过这一部分来糾正某些比較难于糾正的方音,解除一些學習上的难点。

語句通俗易懂,举例不厭其詳,也是本書的优点。這本書里用的術語和說法都是比較通行的,看了這本書以后,再看別的語音學著作也就比較容易。

下列几点,本書有待改进:

(一)对某些問題有簡單化和較含糊的看法:例如,“掌握了这套字母和拼法也就学会了漢語拼音文字”(8頁),“漢語拼音字母”并不完全等于拼音文字的字母,何况这还是草案。这样提法是有原則性的錯誤的。本書对拼音字母j、w的作用也講得含糊,作者把这两个拼音字母放在輔音表里,拿注音字母“i、x”国际音标[j、w]和汉字“衣、烏”对音;但元音表里同样拿“i、x”和“衣、烏”来与“i、u”对音,另外又拿国际音标的[i、u]来音它(8.9頁)。这种矛盾現象本来应当加以說明,但作者没有这样做。又在其他地方說j、w是半元音,又把wen音节說成是無声母音节,这就更叫人无从了解j、w两个字母的性質和用法了。

(二)对發音理論部分的叙述不够条理化:元音表中国际音标严式寬式混用;“韵母的發音”和“元音的組合”兩节中重复处甚多;对同部位的音素不惜重复地說明發音部位。这些地方使讀者感到繁瑣,头緒太多。

(三)本書有些文理上的矛盾。例如,关于注音字母,作者曾說是1913年經“讀音統一會”拟定,1918年公布的(6頁),后来却又說:“1918年‘讀音統一會’制訂的注音字母……”(11頁)。前面說注音字母北京話用得着的有37个(6頁),后面又說,有38个(7頁)。

書上印錯的地方頗多,(書后又沒有“勘誤表”)如:把[tɕ] [tɕʰ] [ɕ]印成[tɕ] [tɕʰ] [ɕʰ] (8頁),把[S]印成[Sʰ] (8頁),把[œ]印成[œ] (88頁)。最严重的是57頁“各地方言調类調值比較表”中有十多个調值的調形圖都印錯了。

上面的这些缺点,我們希望再版时改正一下,以免降低本書在普及語音知識和推广普通話方面的应有作用。

(沈錫人、楊長弘)

《普通話難字正音表》,湖北省教育廳普通話推广处編。

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12月第一版。32开,40頁,定价0.11元。

湖北省教育廳普通話推广处针对湖北人學習普通話的难点,把北京音最难分辨的常用字收集起来,編成了这本小册子。

本書的第一部分依声母次序,把韵母易混難記的字加以对照排列;第二部分依韵母次序,把声母易混難記的字加以对照排列;第三部分列出了北京調类与湖北調类不同的字。這本書实际上等于一本簡便的小型“字典”(只是沒有詞义解釋),翻檢起来,頗为便利。例如,假如你分辨不了声母z和zh的字,就可翻开第二部分,每个韵母当中都有;你看了,就会知道“查(山查)、渣、扎(擰扎)、炸(油炸)、鏑、闌、昨、昨、炸(轟炸)、詐、蚌、榨、茬(茬子)、柵”讀zha,而“扎(扎彩)、咂、咱、奈”讀za。假如你分辨不了韵母in和ing的字,翻开第一部分,你就知道“拼、貧、頻、品、聘”讀pin,而“兵、平、評、萍、屏、瓶、憑”讀ping。

大体上說,湖北人學習普通話的难点有一部分(或大或小)是和其他漢語方言地区尤其是四川、云南、貴州、湖南等省的人相同的,所以也可以用作旁的方言区的人學習普通話的参考(不过要加以取舍、补充)。

这本小册子的“說明”里說,“本書是根据中国大辭典編纂处《識字正音 3500字表》…編成的”,《3500字表》当初大約又是在《国音常用字彙》的基础上編的。《字彙》的注音未見得都符合当前的北京实际語音,尤其是原入声字的調类,有許多在北京話里还有分歧,需要重新审定。这本小册子的第三表(声調)所列的調类有些就不宜作为唯一的依据;何况像“一、七、八、不”等等的字在实际語音里的声調变化多端,但有規律可寻,不是在表上規定一个調类就解决得了的。

書中个别的錯誤(如4頁“澄”音ㄘㄨㄣˊ,其实这音只限于“澄沙”的“澄”,一般还是讀ㄘㄨㄣˊ。)就不必一一指出了,反正學習普通話不能只依据單字表,虽然这样的單字表偶然查查还是很有用的。(刘禾,端华)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1956年10月出版,0.60元。

最近才讀到这个学报登載的平心先生的《甲骨文及金石文考釋》一文,同时又在《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6年第2期)看到馬汉麟先生的《論武丁时代的祀典刻辭》一文,这里就合并起来評介一下。

殷虛甲骨刻辭是我国現在所看到的最早的文獻,毫無疑問,这是研究上古史的第一手材料。由于古今語言的演变,虽然甲骨刻辭的語言文字和現代漢語一脉相承,但畢竟已相隔了三千多年,因之,要利用这批宝贵的材料,还必须从了解語言文字开始。近几年来研究甲骨刻辭的專門著作和論文也發表了一些,但是大半是旧稿,很少見到对甲骨文有研究的前輩先生有什么新的研究成果。

這兩篇論文虽則也都是旧稿,但在今天提倡“百家爭鳴”的方針之下,發表出来还是对这门學問有推动作用的。

《甲骨文及金石文考釋》的主要内容是考釋甲骨文“来媼,兕,米,𠂔,𠂔,与,𠂔,下余”和毛公鼎銘文“約𠂔”等字。《論武丁时代的祀典刻辭》主要是考釋甲骨文“義京”二字。這兩篇

論文都提出了新的見解，給予充分的論證。論證的方法兩者有所不同。前者着重所考釋的對象的本身特點，再引証甲骨文以外的証據；後者着重考釋對象本身的特點和它的環境，以甲骨文証甲骨文，引証甲骨文以外的文獻占次要地位。這兩種方法各有長處，在甲骨文本身不足以証明的时候不得不借助于其他材料，而且前輩先生用這種方法也有過很多貢獻。我個人是偏後一種方法的。考釋甲骨文字最好從甲骨刻辭本身來論證，因為材料內部一致。疏忽內部材料往往有減低論證的系統性的危險。例如《甲骨文及金石文考釋》第三節“釋氷𠂔”中說：“甲骨文𠂔字有三種不同書法，即𠂔、𠂔、𠂔，𠂔字從才得聲，𠂔字從之得聲，……”“不論如何，𠂔𠂔古必與𠂔𠂔二字同音……”。先肯定了𠂔𠂔二字都是𠂔字，然後才談得到𠂔(才)和𠂔是它的聲符，是同音。問題的關鍵在乎𠂔𠂔是不是同一個字？這是這個論證的大前提，要是大前提不能肯定，那末推論一定不可靠。因此不能不全面地檢查一下𠂔𠂔二字在甲骨刻辭中的環境，有沒有不同。在某些例子中𠂔𠂔在同一條刻辭中出現，例如“王固曰吉，𠂔。之日允𠂔𠂔方，十二月在。”(乙4069)，“王固曰吉既。三日戊子允既，𠂔𠂔方。”(乙4701) 𠂔𠂔顯然不是同一個字。

平心先生說過這篇論文是舊作，而殷虛文字乙編近幾年才出版，可能他寫這篇論文的時候還沒有看到這樣明顯的例子。那也沒有關係，這裡主要是引例說明上述兩篇論文方法上的不同，對論文的結論並不表示什麼意見。(斐初)

《南開大學學報》(人文科學)，1956年第2期，1956年12月出版，定價0.70元。

這期學報的頭里刊載了邢公畹先生的《現代漢語的構形法和構詞法》。全文共分五段：第一段主要討論構形法和構詞法的理論，漢語的構形法和構詞法，以及“字”在漢語里的作用等。第二段主要討論構形法與劃分詞類的關係，漢語的形容詞和動詞的形態變化。第三段主要討論作為構詞法的附加法，和“詞附”、“變詞法”等。第四段討論漢語名詞的幾種“型”。第五段主要討論詞的虛實和再論漢語詞類劃分的方法。

作者認為漢語的詞法應分為構詞法和構形法兩大部分。前者主要是詞幹如何構造的方法，例如“香蕉，稀奇”。(同時也認為詞幹添加詞附，既可以是構形法，也可以是構詞法，例如“桌子”。)後者則是某個詞的各種形式的構造方法。他說，漢語的構形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添加詞附的方法，例如“看了，看過，看着”等；另一種是重疊詞幹的方法，例如“看看，干干淨淨”等。還有一種介乎構詞與構形之間的东西——“型”，例如“看一看”是動詞的計量型，“干淨些”是形容詞的比較型，“學生們”是名詞的多量型，“三個學生”是名詞的計量型，“學生”是名詞的不計量型。在構詞法和構形法之外，他認為漢語里還有一種類似歐洲語言里“格”的詞尾變化的“變詞法”。它是用來改變原詞詞類，而不改變原詞意義的方法，例如“解個悶兒”，“蹣個彎兒”，“有個看頭”等，就是利用後詞附“兒”和“頭”附加在動詞形容詞等後面，把它們變為名詞。

在詞類劃分方法上，作者主張根據意義、句法關係、形態三者作標準，而首先是根據形態標準。他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把漢語的詞首先分為虛詞和實詞兩大類。有形態變化的是實詞，沒有形態變化的是虛詞。同時指出實詞可以獨立做句法結構的中心成分，不必依從於別的詞類；虛詞則是有依從性

的。實詞分體詞(名詞、代詞等)，謂詞(動詞、形容詞)兩類。虛詞分副詞(數量詞、方位詞是依從於名詞的副詞，助動詞、副動詞、疏狀詞是依從於謂詞的副詞)和助詞(連接詞、系詞、口氣詞)兩類。這些提法和看法，說明作者注意到了一些常為人們忽略而事實上卻表現漢語特點的一些現象，而且作者的確有好些創見。無疑地，這對漢語語法研究作了重要的貢獻。

但是，正因為本文提出的是一些比較新的問題，所以有些論點還需要語言學界進一步研究和討論。例如“型”究竟是屬於構詞法的，還是屬於構形法的，或者是和它們並列的，作者沒有明確指出來(有一個地方提到是在合詞基礎上構成的)。又“型”究竟有多少種，本文里面所提出的各種“型”是舉例性的，還是列舉性的，這也不大明確。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字”和“詞”的概念在本文里不夠清楚。作者說過：“字是用聲母、韻母、聲調所造成的有意義的音節”。“漢語的字，可以成為詞，可以成為詞幹，可以成為詞附”。它跟印歐語“形態單位”的不同，在於“‘形態單位’，可以不是一個音節，而‘字’必須是一個音節”。“在漢語可以只談‘字’，不談‘形態單位’”。這裡，作者告訴我們：在漢語里，詞是由字組成的。但是下文談到如何表現“pi這個音節包含的各種不同意義的時候，作者卻說：“說者必須利用其他的‘字’或‘詞’組成多音節詞，才能分別顯現”(著重點是引者加的)。這裡把組成多音節詞的成分分成了“字”或“詞”兩種。那就是說，組成漢語的詞的“形態單位”，有時是“字”，有時是“詞”。大詞之中，可以包含小詞。這就違背了作者自己給“字”下的定義，同時在概念上造成了混亂。詞應該只能是由一個或兩個以上的詞素(或形態單位)所組成。作為漢語的詞素(形態單位)的“字”，正如作者所說：“可以成為詞，可以成為詞幹，可以成為詞附”。但是“字”在一個多音節詞里，它只能是一個詞幹或者詞附，不能是一個詞，以致詞里面再包含詞。詞素與詞素的組合關係是詞法上的關係，詞與詞的組合關係是句法上的關係。虛字與虛詞的區別主要也在於前者是構詞或構形的成分，後者是造句的成分。作者規定“合詞的詞幹必須是單詞”，以及認為數量詞和名詞的組合是合詞，也同樣只會引起理論上不應有的混亂。

作者把使用組合方法構成的詞分為復詞和合詞兩種。指出它們的共同點是詞幹都不止一個，詞幹與詞幹之間的內部關係都是句法關係的結晶化；它們之間的差別則是：(1)復詞的結晶程度高，反映了新事物和新觀念；合詞的結晶程度低，不表示新事物新觀念，詞幹仍然完整地保持了自己的獨立意義。(2)復詞的詞幹可以是“字”，合詞的詞幹必須是單詞。(3)並列關係和主謂關係的組合一般是復詞，謂詞和結果補語的關係一般是復詞，也可以是合詞。謂賓關係和主從關係則可以是復詞，也可以是合詞。但是復詞和合詞在廣義的形態上的不同，在句子裏面的功能有什麼不同，作者沒有交代。第(1)條的說法雖然可以理解，但是具體運用起來卻是不可捉摸的。所謂結晶程度的高低，是否反映新事物新觀念，憑什麼，憑誰來決定呢？第(2)條的說法雖然如我們在上文說過的存在着概念上的矛盾，但是說組成復詞與合詞的“字”有兩種不同的性能(譬如趙元任氏所分析的“自由字”與“粘附字”)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第(3)條標準的毛病也在於缺乏具體的分析。舉作者認為“復詞”的“頭痛”，跟作者認為只能是合詞的“謂補關係”的“擴大、推翻、打倒、顛全、看見”等來作一個比



較，無論從結晶程度，或從是否反映新事物新觀念來說，都不能說明“擴大、推翻”等在具備復詞的資格上不及“頭痛”。一般來說，從“字”出發，每一種不同類型的組合關係都可以成為復詞、合詞或者詞組，單憑組合關係是不能定出界限的。

此外，作者認為“仿語”這個術語既混淆了句法上種種不同的結構關係，又掩蔽了詞法上的特點，因此主張把它所標志的東西分別歸入句法和詞法裏頭。在句法裏的稱結構，在詞法裏的稱合詞。其實問題並不在於要不要這個術語，而是在於各家對詞的看法不同：有人把某種結構認為是詞，另外的人可能把它認為是特種的詞組，就是“仿語”，可是從沒有人把他認為是詞的結構而歸到“仿語”裏面去的。可見這一個提法是必要的。同時作者由此而把一些一般屬於“仿語”的結構不適當地歸到了合詞裏頭，把合詞的範圍過分地擴大了，例如“买东西、開窗戶、保衛和平、克服困難”等。這反而會給詞法造成一些新的混亂。在拼音漢文裏將造成一種相當普遍的、奇怪的情況，就是一個詞經常需要分做好幾個聯寫單位（不只是在特定的條件下需要把那樣的“詞”分寫，而是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分寫），理論上實用上都不需要那樣做。

在造型的方面，也還有一些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地方。例如“干淨些”是形容詞的“比較型”，是一個詞，那麼“干淨一些、干淨了好些”是什麼？如果說它們不是“型”而是別的，那麼和“干淨些”怎麼區別？如果它們也是“比較型”，那麼“型”的範圍，詞的範圍就未免太寬泛了。同樣，“三個學生”是計量型，是一個“詞”，那麼，“三個聰明的學生、三個很聰明的學生”等如何處理，都是問題。（任建純）

本期又發表了張清常先生寫的《北京音裏面的一字異讀問題》一文。作者對於普通話正音問題，從兩個方面提出了幾點意見。第一方面主要討論同形而不同音、不同義、同樣性質的不同用法的單音詞讀音（如“那”的各種讀音）和多音詞中的同樣性質的詞素讀音（“肚子”和“肚子”的分別）。作者認為這些字的異讀，正音的時候應當保留它原有的幾種念法，切忌草率從事，輕易去掉其中某個讀音。這些具有異讀的漢字，以不同的音表示不同的意義或用法，儘管書寫上形態相同，還是應當把它看做不同的單音詞或多音詞的詞素，這些意見都是對的。但是既把它看做了不同的詞或詞素，這就不是同一個詞或詞素的異讀問題了。今天我們的正音工作，應該以詞為對象，不應該以單字為對象。需要正音的，是同一個詞或詞素的異讀，至於不同的詞或詞素的不同讀音，嚴格說來，並不

屬於正音範圍以內的問題。

作者在這一部分里又提到假借字讀音的處理問題，他認為古書里的假借字也應該看做不同音的同形詞，不能一律照今音來讀。例如：“牧之戰陳”的“陳”是“陣”的假借字，只能讀ㄔㄨㄣˊ，不能按今音讀ㄔㄣˊ。其實這個問題在討論普通話正音問題的時候可以不必提，因為今天我們正音工作的範圍只限於現代漢語普通話詞彙的讀音，至於讀古書的時候假借字應該怎麼念，那是另一問題。

原文第二方面主要討論一字多音而不影響意義和用法的问题。作者主張決定這類字的讀音標準，需要進行全盤的研究，一方面要研究古音演變的規律，一方面要調查實際語音的情況，兩者缺一不可。這個意見是很好的。作者在這部分里對於北京話中入聲字在韻母方面的異讀現象進行了全面、系統的分析。關於這一個問題，作者指出某韻的入聲字在現在北京話中一般變成了什麼韻母，而其中屬於某種聲類的字又產生了某種異讀。這種分析不但對於正音工作幫助很大，而且對於推廣普通話也有很大的方便。不過作者所舉的例字有兩個缺點：（1）有些例字，如“賊ㄘㄟˊ、麥ㄘㄟˊ、脚ㄘㄟˊ”這些舊來的讀書音在現在北京話里已經不存在了。（2）有些例字，如“岳ㄩㄝˊ、覺ㄐㄩㄝˊ、弱ㄐㄩㄝˊ、瘡ㄘㄩㄝˊ”北京並不這樣念。（河北省有些地方，如灤縣，把“岳”讀作ㄩㄝˊ，“約”讀作ㄩㄝˊ，覺（覺得）讀ㄐㄩㄝˊ，“弱若”讀作ㄐㄩㄝˊ，“咯”讀作ㄐㄩㄝˊ。北京音“岳”只讀ㄩㄝˊ，不讀ㄩㄝˊ，“覺”讀ㄐㄩㄝˊ、ㄐㄩㄝˊ，不讀ㄐㄩㄝˊ，“弱”只讀ㄐㄩㄝˊ，不讀ㄐㄩㄝˊ，“瘡”讀ㄘㄩㄝˊ、ㄘㄩㄝˊ，不讀ㄘㄩㄝˊ。）這些錯誤倒是小事，另外卻有個較大的缺點：作者指出了北京話中入聲字異讀的規律之後，在正音方面應該怎樣對待這些異讀，卻一點沒有提到；我們認為至少要在原則上提一提才好。

此外，作者對異讀字調值不合規律的現象分析得非常細緻，提出的處理原則也很正確。但是北京話中異讀字的問題，正如作者所說，本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因此，實際運用原則的時候，我們認為除了要全面研究、分析之外，還要考慮具體情況而後決定。運用原則的時候，恰如其分的掌握尺度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原則可能大家都同意，而定下來的結果可能不大相同，這就需要從各方面仔細斟酌了。（瀨之）

編者按：學報這一期還有馮漢麟先生的《論武丁時代的祀典刻辭》一文。對這篇文章的評介，見本欄《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條下。

## 海南島通訊

我從北京來到了廣東。作為一個語言工作者，我首先想到的是：普通話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已經開展了一年多了，廣東這個被稱為“漢語方言的大家庭”的地方，是不是也已經有了普通話的“市場”呢？在廣州我雖然聽到滿街都是廣州音，但是，在學校、機關等公共場合，普通話已經有了顯著的地位。據說中小學已經逐步採用普通話進行教學了。這是一種可喜的現象。

後來又從廣州來到了海南島，到過幾個南部的縣城，我發現這裡並沒有很好的開展過推廣普通話的工作，方言仍然在一切公開場合作為人們唯一的交際工具。機關幹部中有不少是來自大陸的，但是絕大多數還是各說各的方言，很少有人想到用普通話來溝通方言上的隔閡。學校里沒有一位老師是用普通話來向學生講課的，儘管有不少老師會說普通話。一般會議上的報告都講海南話，除非發言的人實在不會說海南話。

於是，我產生了這樣的疑問：為什麼這裡不大力開展一下普通話運動呢？為什麼領導同志在公眾的集會上也不帶頭說普通話呢？我終於把問題弄清楚了：這裡的幹部開會做報告時不說普通話，並不是因為不會說，而是為了照顧聽眾方便。這樣一來，對於島上生長的同志來說，確實是方便了一些，可是對於從大陸來的听不懂海南話的同志，就不得不來一個“兩全其美”的補充：不懂海南話的可以不參加報告會。

我認為，為了政策的順利傳達，須要考慮聽眾的方便，在一定原則下照顧一下是應該的，但是照顧應該跟提倡學習普通話結合起來，不能單純照顧而使不肯說普通話和不會說普通話的情況繼續存在下去。如果總是強調照顧的一面，在客觀上必然會阻礙普通話的推廣。因此照顧方言區要在不妨礙推廣普通話的原則下有一定的限度。現在全國人民既然一致擁護推廣普通話，那就應該使它迅速開展，然後我們才能解除方言上的隔閡，從而促進文字改革工作的勝利完成。（柏蘆）

# 讀《語法和語法教學》

唐啓運

[編者按]本刊1957年1月号“書刊評介”欄已經發表方現田、孫方兩位同志對《語法和語法教學》一書的短評，這裡再發表唐啓運同志對這書的批評。唐文中與方、孫兩位同志意見相同的地方，編輯部已酌量精簡，以節篇幅。

《語法和語法教學》是一本集體寫作的新書，我覺得這本書有三個重要的優點。

第一是很重視語法特點。例如，認為詞類是詞根據詞彙·語法範疇的分類，就是根據詞的意義和詞的語法特點來劃分的類。關於這點，王力先生在《關於詞類的劃分》一篇中作了令人信服的闡述。他指出“概念的分類只是邏輯上的分類，這種分類可以是全人類一致的，那麼，民族語言的特點就顯示不出來”(81頁)；同時又指出“如果我們單憑語法範疇來做標準，我們就會遭遇很大的困難，甚至得出一個漢語無詞類的結論”(85頁)。因此，合理的分類標準是“詞彙·語法範疇”，就是把結構和意義看成一個有机的整體。又如，單部句顯然是和省略句不同的，絕對不能用邏輯推理的方法把它和省略句混為一談。關於這點，高名凱先生在《漢語里的單部句》一篇中作了淺明的解釋。他指出“省略句必須有語言環境或上下文作其省略的條件，單部句則不需要這種條件，就可以只由謂語一部分或者不能斷定是主語或是謂語的一部分來構成句子，換言之，單部句不需要語言環境或上下文就能夠表達完整的意思”(304頁)。這些地方都說明這本書是重視語法特點的。

第二是明確地分別特殊和一般。《語法和語法教學》在分析語法現象的時候，既說明一般性，也說明特殊性。一般性是有規律的，特殊性也是有規律的，說明一般性和特殊性，才能全面揭露語法事實。比如動詞的基本用途是作謂語、定語，形容詞的基本用途是作定語、狀語、謂語，這是一般性。但是，動詞和形容詞也有特殊的用法，在一定的條件下作主語、賓語。指出“一定的條件”，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它把特殊性和偶然性的“例外”截然分開，並說明了特殊性和一般性之間的差別。

第三是不滿足於現象的羅列，而着重於本質規律的闡明。本質和現象之間是有不適合的情況的。科學的目的就在於通過現象揭露本質，語法科學當然也不例外。因此，評價一個語法體系，就不能不看它對語法的本質規律到底作了怎樣的闡明，如果它僅是停留在現象的羅列上，就不是具有高度科學性的嚴密的語法體系。《語法和語法教學》從語法現象中考察了各自產生的條件，以及彼此之間的本質聯繫，使讀者不至於為錯綜複雜的現象所迷惑。如“東邊來了一個人”這樣的結構，不少語法書都是在“倒裝句”、“主語後出現”這方面繞圈子。這本書里充分揭示了賓語和動詞之間的種種關係，說明“一個人”是表示存在或出現的一種賓語，不是主語。這一點，周祖謨先生在《表示存在或出現的賓語和表示處所的狀語》一篇中作了詳細的闡述。他說這種“存現句”“跟帶有主語的表示行動的動詞謂語句不僅在意義上不同，在形式上也不一样，所以不會跟一般表示行動的陳述句相混”。假如我們認為這種句子

是倒裝句，句中所表示的人或物是句子的主語，就不能說明何以把它移在動詞前面時須要加上“有”(246頁)。這些都使我們感覺到，解析語法事實，不能僅僅停留在表面現象上，必須深入一層，揭露本質特點和這些本質特點之間的聯繫，才能建立起科學的、有規律性的、嚴密的語法體系。

但是這本書也有些缺點，現在我提出幾點來供參考。

第一是關於“把”字結構的問題。“把”字結構是賓語呢還是狀語？黎錦熙先生和徐仲華先生都認為是前置賓語(185頁，212頁)。鄭光儀先生作了補充，說這是固有的結構形式，叫做前置賓語，但不是後置賓語的倒裝(299頁)。殷煥先先生也作了補充，說這種前置賓語有狀語的作用(249頁)。這是第一種意見。胡附、文煉兩先生認為在結構上的前置賓語是不依靠介詞而放在動詞前面的，至於有“把”字的，只是意念上的前置賓語，在結構上是整個介詞結構作狀語(232頁，234頁)。這是第二種意見。我認為，意念和結構不是任何時候都互相適應的，在不適應的時候，就看它在通例上和那種類型相似；如果有和它類似的類型，就按這個類似的類型解析，如果沒有和它類似的類型，就可以自立一類。如“把”字結構就是屬於這種情形。因為介詞結構在動詞前面，通例是屬於狀語的。原來是意念上的賓語，這時就應該在這個通例的類型中統一起來，所以就應該叫作狀語。同一的成分，不能又叫賓語，又叫狀語。因此我同意胡附、文煉兩先生的解析。不依靠介詞的幫助，賓語也能夠用在動詞的前面，如“他什麼都會”，“他缺點不肯說，專說優點”(234頁)。嚴格說起來，這種歸類也不純粹是意念的，因為它多半都有“都、不、也”這些副詞接在賓語之後，不過它和“把”字結構的分析根據是不相同的。“把”字結構根據介詞結構的通例，所屬應該是狀語，不是賓語。

第二是關於復指成分的問題。“飛沙像山一樣地壓下來，那是誰也受不了的”，劉世儒先生認為“那”是復指成分，因為“這個代詞所重指的並不是上句中的某一個詞，而是整個句子。這整個句子，經它重指，就成了下句中的一個成分(主語)，不能獨立了，所以就仍是復指成分”(286頁)。我認為，這樣的“那”也算復指成分的話，那麼復指成分的范围是太大了。因為被復指的不僅可能是一個句子，而且可能是好幾個句子，甚至可能是一段或者全篇文章，如毛主席《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19、20頁結尾有“這是第一種錯誤思想”、“這是第二種錯誤思想”這樣的句子，其中的“這”所重指的就是很多句子的總和。這些怎麼能看作復指成分呢？其次是“董存瑞，我一輩子也忘不了他”這樣的句子。按照復指成分的定义，兩個成分不但同指一樣事物，而且在句法組織上具有同等價值的才算復指成分，如要作主語就都作主語，要作賓語就都作賓語(271頁)。這個他，《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簡述》是認為復指主語“董存瑞”，根據定义，應該也是具有同等價值的主語。劉世儒先生在《談復指成分》一篇中認為“董存瑞”是倒裝賓語，“他”是重指賓語(285頁)。不管是作為主語還是作為賓語，都是

(下轉 23 頁)





## 一个翻译工作者的体验

徐亚倩

翻译工作看来似乎很简单,因为衡量翻译的正确与否,有原文可以复按;衡量中文的高明与否,有汉语的规律可以遵循。既然如此,按说只要自己辛勤钻研业务,老老实实地做工作,决不会有解决不了的困难。哪知事实上并不是这么回事。近年来我不知遭到多少次碰壁,甚至有时很长时期没有工作可做。据我几年来探索的结果,觉得挡在我这样的翻译工作者的路上的,有两重大障碍:一重是“滥用职权的作风”,一重是“崇拜权威的心理”。这两重障碍所造成的困难,似非翻译工作者主观的努力所能克服的。

由于工作的时断时续,我倒有很多时间对文艺翻译作比较深入的钻研。我努力的目标是要译得大众化、口语化。这个方向应该说符合党对文艺工作的要求——“为工农兵服务”。想不到正因为这样,我曾经多次碰过大钉子。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似乎看不上口语化的译文。例如,我在一次翻译试稿中,(新文艺出版社)用了“一时半会儿、动弹、安生、红扑扑、病病歪歪、煞白、唠叨”这些在古典小说和创作小说中还常见的词儿或词组,可是出版社的编辑部却说是“方言土语”,不合乎规范化。最有趣的是他们把“拾掇拾掇”说成是苏州话;“瓮声瓮气”说成是四川话,因此认为都要不得。而且他们还说:译文相当正确。似乎问题就出在这些词彙上。难道说,汉语有“创作文学语言”与“翻译文学语言”的区别吗?要不然,何以创作文学语言中常见的语词,翻译文学中就不能适用呢?

另一个出版社的编辑更令人莫测高深。他们只在翻译试稿上给你一根根红杠子,也不说明为什么该吃杠子。

这些杠子怎么个打法,现在略举几个例如下:

- (1) 说起来,兄弟姊妹当初倒有六个。
- (2) 家道穷苦,孩子们衣衫襤褸,滿世界乱跑,簡直成了野小鬼。
- (3) ……偏生又下了場瓢潑大雨。
- (4) ……連聲帶喘地在窗子外飞跑。

最叫人摸不着头绪的,却是(1)例。也许编辑认为这里该用“六人”,或是“六个人”。可是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70頁上就这么说:“在个字独立用的时候,就是后面既無名詞也不能說是省去一个已見的名詞的时候,个字差不多都是称人的:一个等于文言的一人,几个等于几人。”究竟编辑同志的用意何在,我至今还没法猜透。

有一次翻译试稿計有兩万多字,象上举例句那样的一詞一語的問題,一共吃了三十多根杠子。編輯同志因此就給試稿下了这么个批語:“中文不够自然流暢,很多語句牽強難解,中文表达得不够好。”

其实編輯同志所划出的詞彙跟譯文的流利与否并無关系。至于牽強難解,那是原作的責任,不能完全归咎于譯者。原作者里昂諾夫的文字風格本来有点晦澀,有些譬喻也不免牽強。編輯同志竟不問青紅皂白,給譯者兜头就是“一悶棍”,不但把譯者長时期辛勤劳动的成果——試稿不明不白地給断

送了,就是譯者翻譯的資格也差不多給取銷了。这样任意挑剔,漫無标准,妄加褒貶,輕予取舍,不能不說是“濫用职权”吧。

这还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編者往往任意改窜譯者的譯文。例如:我譯“熟悉”,他們改为“很好熟悉”;我譯“具体的观念”,他們改为“具体的概念”;我譯“攔在手掌中”,他們改为“攔在手掌的夾縫中”。有时候擅自窜改后,还不讓譯者过目。等到書一出版,譯者自己讀了也觉得啼笑皆非。例如我譯过一篇文艺論文《契柯夫的現實主义》(新文艺出版社),全文才一万多字,編輯同志擅自改动了十多处。原来讀起来还順口的,偏要改得詰屈聱牙,甚至文理不通。最令人莫明其妙的是,有一处竟改得跟原文的意思截然相反了:

原譯文:“在契柯夫的作品里,文字的謹严和‘客觀性’之中,滲透了精微的抒情气息,更兼有作者那种富于主觀色彩的話語;其謹严和‘客觀性’却又因采用了丰富的人民口語而显得絢爛。”

編者改为:“…作品里,語言的含蓄与‘客觀性’是和滲透在其中的精微的抒情气息,是和作者語言中的主觀色彩結合在一起的,它們使得人民口語变得丰富燦爛起来。”

原文的“сдержанность”只有“审慎”的意思,因此譯作“謹严”。大概編輯同志錯認為 содержание(內容),譯作“含蓄”的意思也勉强。原譯文把“謹严”和“客觀性”兩個名詞复說,为的是使文义显豁。編輯同志偏要改为“它們”,究竟指代的是什麼,可就不大清楚了。原文的 считатьc 固然可以用“与…相結合”句式譯;可是有时候句子里有好几个成分需要“互相結合”,而且这些成分又都帶有复杂的修飾語,如果一成不变地应用这个句式,譯文就显得非常累贅了。再說,原譯文的“滲透”“兼有”也就是表达“互相結合”的意思的。这些倒还在其次,最主要的却是:象修改文这样的說法,簡直違反了馬克思主义文艺理論的观点了。这样不管譯文風格,不管原文意义,胡乱地窜改,也不能不說是“濫用职权”吧。

編輯同志对待無名譯者的态度是这样,可是对待成名的翻譯家就大不相同。只要是翻譯名家的譯文,即使文字显然有語病,文笔不簡潔,甚至有誤譯的地方,也不加訂正就出版了。例如,《斯大林时代的人》(作家版)第1頁开头有这么一句:

“有些会面,即便你活过一百年也不能忘掉。”

“会面”是个动宾短語,前面不能用“些”,只能用“有几次”“有几回”。例如咱們不說“有些上学”、“有些吃飯”、“有些作工”(咱們說“有些工作”,就因为“工作”不是个动宾短語)。“活过一百年”似乎該說成“活上一百岁”或“过了一百年”,因为“活过”的“过”只表示單純的过去,沒有表示完成的意思;而这里却需要一个表示完成的字眼。

同書同頁第三行又有一句:

“…想到那座高悬在寬闊的被風吹皺的河上的青山…”

“河上”是空的，試問“青山”怎么个悬法，似乎該說：“高聳在河邊”。“被風吹皺的”似乎該是“河水”或“水面”，決不能是“河上”。如果說，“被風吹皺的”是“青山”，那也有些說不過去。

另一本名著譯《母親》（新文藝版）開頭有这么一句：

“每天，當工廠的汽笛在郊外工人區的充滿了煤氣和油臭的空氣里顫動和呼喊起來的時候，和這種呼聲應和着，從那些陋小的灰色的屋子裏，僅僅使自己肌肉恢復疲勞的睡眠時間都不能得到的人們擺着陰暗的臉色，好象受驚的螞蟥一般的望着街上走去。”

在原文中找不出意義與“時間”、“擺着”相當的字；而且“擺着…臉色”多少是有意的裝模做樣；可是工人的“臉色陰沉”却是由于生活困苦，不由自主的。“應和”也與原文有出入，原文只有“听从”、“听话”的意思。這一整句讀起來很有點費勁，其實原文很簡練，現在試譯如下：

“每天到時候，在那滿是煤煙和油味的工人區上空，工廠的汽笛聲顫抖着，怒吼着。汽笛一叫，就有人從一所所灰色的小房子里應聲而出，慌忙往街上跑，像受驚的螞蟥似的。這些人全都臉色陰沉，睡得連體力也沒能恢復。”

“慌忙”一詞，是從“受驚的螞蟥”一語中體會出來的。蘇聯版英譯本也是如此，用了scuttling一詞（最近出版社又把這本《母親》修訂了一次。這一句改得固然比原先簡潔得多，可是用“陰森森”一詞來形容工人的臉色，似乎還不大妥貼。因為“陰森森”一詞通常是用来描繪處所的，如“陰森森的閻王殿”，“陰森森的樹林子”，多少帶點可怕的意味。又原文是“往街上跑”，這次修訂本改作“往街上走”。一字之差，原文的神情全失。試問：既是“走”，怎么說得上是“象受驚的螞蟥似的。”）

又如《復活》（平明版）在15頁上就有下面兩處顯著的誤譯：

“從那天起，瑪絲洛娃就開始了違反人類和上帝的法律的長期罪惡生活：這是成千成萬的婦女不但得到政府許可，而且得到政府獎勵，純粹為了促進國民幸福而過着的生活；這是十個婦女當中倒有九個會以痛苦的疾病、早衰、死亡做為結局的生活。”

“…在那兒，政府雇用的官員們、醫生們——有的帶着莊嚴苛刻的態度，有的泯滅了上帝天賦與人類和禽獸的羞恥心，帶着嬉笑的輕薄態度——叫這些婦女受檢查…”現在根據原文，參照Maude的英譯本，試譯如下：

“從那天起，瑪絲洛娃就開始過那種違背聖賢明訓、上帝誡條的長期罪惡生活了——成千上萬的女人在那里過這樣的生活，那關心國民福利的政府不但准許，還加以包庇呢：因此十個女人里倒有九個，結局是害痛苦的病症，是早衰，是死亡。”

“…那兒有政府的醫官——都是些男人——有時候正經、嚴厲，有時候嬉皮笑臉，給這些女人檢查身體，这么着就把天賦的羞恥心消滅淨盡了——不單是人就是禽獸，原都有天賦羞恥心這道堤防，才不至于作惡造孽…”

無論在英譯本中，或是在原本中，“關心國民福利的”是“政府”的修飾語；“羞恥心的消滅”是“檢查”的結果。原譯者沒有把語句結構看清楚，因此弄得牛頭不對馬嘴了。

常言說得好，“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在這種地方正需要編輯同志行使職權了，可是他們偏偏又放棄了職權。對無名的譯者，他們就橫挑鼻子豎挑眼，硬要雞蛋里找骨頭。只要是翻譯名家的手筆，儘管有些疏忽的地方，他們也就任其自然了。這樣的作法，不能不叫人懷疑“崇拜權威的心理”在那里作怪。

可是話又得說回來了。要是這個“權威”是過了時的，那末編輯同志對它也就毫不客氣了。比如說，張谷若先生對於英國哈代，可算得研究有素的了，只要看他譯的《德伯家的苦絲》（商務版）注釋有一百五十多頁，就可想而知了。他的譯文也有特異的風格。大概因為“人與文”都已過時，就得不到編輯同志的賞識。因此，《德伯家苦絲》的新版中（文化工作社版，書名改作《苦絲》）隨處可以看到編輯同志的斧鑿痕迹。試舉几例如下：

舊版：“他跨下那兩條腿，癱軟少力，搖晃不穩，走起來雖然一直向前，却總有一點兒往左邊歪。”（1頁）

新版：“支着他的那兩條腿是搖搖晃晃的，並且在他的走路的姿式里，總有一種傾斜的趨勢，使他或多或少地往一條直線的左邊歪。”（13頁）。

舊版：“…本來坐着的，現在却擺起架子來，把兩腿一伸，仰臥在雛菊鋪綴的山坡上了。”（6頁）

新版：“…由坐着的姿式倒下去，舒服安適地長身躺在草坡上的雛菊中間了。”（20頁）。

舊版：她母親…彎着腰就着洗衣盆兒；盆兒里的衣服原是禮拜一就下了水的，現在一個禮拜眼看就完了，可是還沒洗完，原來這是他的老習慣（19頁）。

新版：她母親…俯在星期一的洗衣盆上，那盆衣服，現在也象往常由星期一遲延到一個星期的末尾（38頁）。

舊版：車又走動起來了，她只顧心里思索，外面的東西一樣也沒看見。（51頁，這一句，譯者還注出原文，說明這是意譯）

新版：車又走起來了，她是帶着內心的眼睛，不是帶着外面的眼睛坐着車前進的。（77頁）

像這樣妙不可言的例子，在新版中到處都是。編輯同志連一句話中最重要的那些詞的意義都沒弄清楚，就大刀闊斧、毫不顧惜地胡砍亂削，把一部完整的優秀譯本砍得遍體鱗傷，差不多成了個殘廢。于此可見“權威”思想的為害之大了。

目前的文藝讀物中，翻譯作品占相當大的比例，尤其是青年文藝讀物。因此文藝翻譯所用的語言正確與否、精練與否，對青年的語文教育會起着好或壞的影響。如果編輯同志一方面濫用職權，一方面放棄職權，因而造成不正確使用祖國語言的習慣（當然譯者本人要負主要責任），那影響就不可想象了。至於影響到翻譯工作者的工作與生活，那還只是件小事。

編者按：徐亞倩同志這篇文章所指出的翻譯界情況是有代表性的，應該引起編輯工作者的重視。但是，編審翻譯稿件的同志也不是沒有苦衷的，例如，人民日報1956年12月5日所載蕭也牧同志《一個編輯的呼聲》一文中，就曾指出過有些翻譯工作者常給編輯部增加許多不應有的負擔。

此外，本文原附有幾段俄英原文，我們一因這些原文讀者不難找到，二因篇幅關係，所以刪掉了。為了使讀者兩相核對，徐同志的試譯文，我們也沒有加以改動。



## 对譯名不統一的意見

### (一)

大家都知道，翻譯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能直接地影响我們的学习。如果我們把翻譯得很好的文学作品跟一些不合汉语習慣、文字晦澀的翻譯作品兩相比較，就会看出有明显的区别。前者会给讀者深刻的感染和教育，例如，《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鋼与渣》、《勇敢》、《走向新岸》、《海鷗》……这些作品就如同中国作家的創作一样，語言文字生动活潑，使我們讀了有亲切自然的感觉。我們对这样譯作的譯者十分感謝与尊敬。自然，对那些在翻譯上粗制濫造，譯得很生硬的作品是会厭煩的。

从以上的体会，我想针对翻譯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談談我的意見。目前翻譯的文学作品很多，特别是苏联作品。这些作品中有不少是同一作品的不同譯本，它們虽然滿足了讀者的需要，但是有些譯作却普遍存在着一个沒有得到重視的問題，就是人名、地名、書名的不統一。据我所知，一般的譯名往往是音的直譯，因此翻譯成汉文就可能有不同的音譯法。例如，在《瞿秋白文集》里看到的是“斯托柳宾”，在《联共党史》却是“斯托雷平”。其实，这两个名称都是同一个人的名字。《靜悄悄的东河》、《寂靜的頓河》、《靜靜的頓河》以及書中的人物“美列霍夫”、“梅列霍夫”、“麦列霍夫”都是同一的書名或同一人名的不同譯法。这类例子，举不胜举。

譯文中的譯名不同，有的讀者能够憑自己的能力識別，但是大多数的讀者却往往会被弄得“莫衷一是”。因此我認为譯名的統一是一必要的。

当然如果已有的譯名不准确，与原文相差很远，在我們的譯作中作一修改也并不是不可以。比如严洪同志譯的《創作与人民服务》用了“舒卡尔”这个名字，譯者就注出：周立波同志譯为“西奚卡”与原文相差甚远，所以不用周立波的譯名。这是对讀者認真負責的做法，我們應該把它跟統一譯名的要求分別对待。（陈国魁）

### (二)

我們对《中国語文》处理人名譯音問題有些意見，現在写在下面供参考。

我們都知道，从語言方面来看，优秀的翻譯作品是我們从外国語言中吸取有益成分的桥梁，而粗糙的翻譯作品则会損害祖国語言的純潔和健康。因此，我們認为翻譯工作者在促进汉语规范化以及丰富、發展汉语方面負有重大責任。人名譯音的处理是翻譯工作的一个組成部分，翻譯工作者重視或不重視這個問題，会如同对待翻譯工作中的其它問題一样，影响是很大的。我們必須以严肃認真的态度对待人名譯音問題。無論是譯者或編輯部門都应该保証譯文的質量。但是目前我国各种报刊書籍上的人名譯音用字却很不一。《中国語文》也沒有在这方面起到好的作用。《中国語文》和已出版的《中国語文叢書》中的人名譯音用字就相当混乱。例如，《汉语的詞类問題》第二集所收 22 篇文章（不包括編輯部的小結），在人名譯音用字方面缺点很多。首先是同一姓名而譯名不同的，如把 Куцнецов 譯成“庫茲涅錯夫”（見 9, 35, 109, 等面）和“庫茲涅佐夫”（見 5, 134 等面）；把 Шапиро 譯成“沙彼

罗”（見 25 面），“沙丕洛”（見 38 面）和“沙皮罗”（見 40, 171 等面）；把 Мудров 譯成“穆德洛夫”（見 35, 78 等面）和“穆德罗夫”（見 141 面），等等。諸如此类，不胜枚举。而且有些沒有加注原文。

姓名相同而譯法不同的現象，不但在不同篇的文章中有，而且在同一篇文章中也能找到。例如，第 38 面的“沙丕洛”和第 40 面的“沙皮罗”（都譯自 Шапиро）。这种情况很容易使讀者把譯作中的一个人当作兩個人或更多的人看待，从而影响了語言的交际作用。这显然是不合乎要求的。

《汉语的詞类問題》（第二集）一書在人名譯音用字方面有这些缺点，不能說是事前不可避免的。因为在出書之前，不管是一个人的作品或者是多人的作品，編輯部應該作好人名譯音用字的統一工作。这个編輯工作中的缺点，讀者完全有权利要求編輯部加以改正。

人名譯音用字的不統一是一翻譯工作中的一个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我們認为目前我国各种書籍报刊上的人名譯音用字之所以会很不一，主要是由于翻譯界沒有重視統一的人名譯音原則，据說新华通訊社在这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并起了示范作用。我們希望各編譯單位和語文杂志对这个問題都重視起来，从各方面做到对讀者負責。（熊堯祥、魏展英）

## Старославянизм и графика 的譯法

### 王力先生給本刊的信

編輯同志：

寄上張大本同志來信，希望能予發表。

关于 старославянизм 和 графика 的譯法，張大本同志的意見完全正确，是我錯了。

《中国語文》1956 年 4 月号發表了我的來信之后不久，我已經發覺我把 старославянизм 譯为“古斯拉夫主义”是錯誤的，因为我看見这个詞在俄文著作里能用于复数，如果是“主义”的意思，就不会用于复数。当时我請編輯部再讓我更正，你們复信說張大本同志來信說准备和我詳細討論，叫我等一等。現在張大本同志有信來了，希望發表，因为問題总是弄清楚的好。

我在我的《关于汉语有無詞类問題》里把巴尔胡达洛夫院士的話譯錯了，連累你們把彭楚南同志的正确的譯文也改錯了（《中国語文》1956 年 12 月号 50 頁），使我十分抱歉。我不能拿上了《俄华辞典》的当来掩飾我的工作不严肃，因为我手边除了《俄华辞典》之外还有各种俄語辞典。我應該接受這兩次的教訓。

在“編者按”里，你們說我所引巴尔胡达洛夫同志的話（包括注文）应全刪。我覺得不如移到前面去，因为这段話对于這篇文章的論据是有帮助的。我建議这样改一改：

……例如沙赫馬托夫院士在《俄語句法》一書中強調指出：“詞类的分別除了句法基础以外还有更深刻的基础——語义的基础”。①在 1954 年 6 月 28—30 日苏联科学院語言研究所所召集的討論各种不同类型的語言的詞类的学术會議席上，通信院士巴尔胡达洛夫（Бархударов）同志也說：“与其說詞类由純粹的語法范疇来規定，不如說是由詞彙-語法的范疇来規定”。②

但是,在苏联,对这种主張也并不是沒有人反对的。  
就在上述的有关詞类的會議席上,語文科学候补博士…  
如承編輯部同意,請于此書再版时照此校正。

此致  
敬祝

王 力

1957 年 2 月 9 日

### 張大本同志給王力先生的信

敬愛的王力教授:

您在今年四月間的来信收到了,因为这几个月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疗养院过的,很久也沒回信給您。很对不起。

关于 старославянизм 及 графика 的譯法問題,我們最近又找到了一些材料,想再向您請教。

старославянизм 一般是可以譯成古斯拉夫語詞的,但是有时不一定是“詞”,还有一些来自古斯拉夫語的詞素也叫 старославянизм。所以,要看上下文情况来确定比較正确的譯法,有时甚至可以考慮譯为“古斯拉夫語成分”。

关于 графика,譯成“表音法”不太容易懂。不过从一些解釋看来,它并不当文字講。

有些書关于 графика 的定义和《現代俄罗斯文学語言詞典》不同。例如:(恕我只引原文,这样可能更精确些)

1.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2卷中的解釋是:

Графика (в языкознании)—часть учения о письме (см), изучающая различные системы письменных или печатных знаков, букв, воспроизводимых при помощи различной техники начертания.

2. 苏联高等师范学院俄語教科書中的定义是:

Графика—учение об изображении знаков речи буквами…

(見 Земский А. М., Крючков С. Е., Светлаев М. В. 合編的《Русский язык》для педучилищ. 1955 年版。1 頁, 20 頁 § 18.)

3. Будагов 教授在《語言学概論》一書中說:

Отношение букв к звуковому составу речи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в особом разделе, называемом графикой.

(Будагов. «Очерки по языкознанию.» Москва, 1953 年版, 128 頁.)

4. 类似的解釋可以从 Гвоздев 教授的《拼写法基础》中找到:

Отношение букв к звуковому составу речи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в разделе графики. Графика устанавливает, какие звуковые значения имеют отдельные буквы или как читаются те или другие буквы… Графика определяет, какими общими приемами располагает данное письмо для передачи произношения, существующего в известном языке.

(見 Гвоздев. «Основы русской орфографии». 1954 年, 莫斯科版, 29—30 頁.)

从上面的一些解釋似乎可以看出,在語言学中 графика 是指研究用書写形式表达語音的規則的体系的学科。在俄語教學

大綱中和一般俄語教科書中把它和 орфография(правописание)并列,也說明这是一門科学的一个部分。

从这門学科的内容来看,似乎也可以得到証明。Русская графика 中不仅包括字母表,而且还包括对以下問題的闡述:字母和語音的对比关系;字母的主要意义和次要意义; русская графика 的基本原则;元音表示法,輔音表示法, j 表示法等等。

因此,我觉得 графика 在教学大綱中譯成“文字”是应当考虑的。尽管文字和 графика 之間的关系非常密切,没有前者也就不可能有后者,但兩者并不是一件东西。同样,графика 不能和俄語字母表(алфавит)混为一談。俄語和保加利亞語的字母表完全一样,而它們的 графика 則各不相同。

Графика 也和其他語法術語一样有兩种含义:有时指用書面符号表示語音的規則本身說的,又有时指研究这些規則体系的科学。应当指出,在一些見到的俄語語法書中(Шapiro 著的 Русское правописание 和 Финкель, Баженов 合編的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язык), графика 也可以当 алфавит 的同義詞用。例如,在後一本書中,編著者一方面說:

Для обозначения звуков речи на письме в каждом языке имеется своя система знаков, графика.

同时又說: Русская графика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её вид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легка изменённое старое славянское письмо,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ую кириллицу (見該書 § 23. 142—143 頁)

这里显然不能譯作“表音法”,从其意义上看,是和“字母表”同義。

所以,我們觉得 графика 一詞的譯法不一定只是“表音法”才对,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含义,因而也就有不同的譯法。在教学大綱中能否譯成“文字”,我們觉得大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从現有材料来看,似乎可以得出結論說,譯成“文字”是不对的。

以上这些是很浮淺的認識,很希望听到您的指教,我們的水平都很差,对漢語學習得也很不够。語言学名詞要想正确翻譯过来,在漢語研究中生根,主要还是依靠象您这样一些对兩国語言都很有修养的老前輩。(下略)

張大本

1956 年 11 月 27 日

### 啓 事

(一)希望来稿尽可能按照本刊編輯格式,用橫格紙写并用橫排式标点符号,脚注出处請查填清楚,以节省編輯部加工的劳力。

(二)編輯部不办理發行事宜,訂閱或补購本刊的請直接向北京邮局期刊門市部联系。

本刊編輯部

更正:本刊1957年3月号40面左欄倒17行“和配音人”四字应取消,46面倒6行“可能”应为“可以”。



# 告 讀 者

本刊編輯部

本刊曾經在1956年12月隨同刊物發出征求意见表，請廣大讀者對本刊提出意見，幫助我們改進工作。截至本年三月底止，我們整理了收到的全部回件。極大多數讀者在意見表中都以認真、負責的精神，對本刊提出了一般性的或關於個別文章的意見，給了我們誠摯的支持和鼓勵。讓我們在這裡向這些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謝。

以下先摘要綜述一下讀者對本刊的批評、建議和要求，然後談談我們今後應該朝什麼方向努力，來滿足大家的需要。讀者意見大致可分為內容、編排、發行及其他問題等幾方面。

關於文章內容方面：

1) 一般讀者最歡迎語音、語法、詞彙及其他方面有關語言學基本知識的文章。大多數讀者認為“語文短評”“書刊評介”對他們有幫助。

2) 對本刊文章的批評是：有些文章雖然有分量，但是辭句晦澀，不夠通俗；有的文章討論同一問題，內容大同小異，顯得重複；並且長文章過多。

3) 對本刊內容的建議：少數民族語文的文章最好另出專刊登載；希望刊用有關高等學校語文教學、古漢語研究、世界語言學史、修辭學、漢語音韻學、文字學等方面的文章；希望本刊能迅速組織力量翻譯蘇聯及其他國家討論語言學問題的書刊；建議增辟“國內外語言學學習資料索引”一欄；希望多報導國內外語言學界的研究動態。

關於編排、發行方面的意見：希望在一年初公布大致的編輯計劃；希望增加篇幅；建議把“編者的話”收入目錄，以便查考；盡力減少以至消滅校對上的錯誤。認為稿件加工不夠的意見也不少。還有讀者指出本刊組織文章討論唐蘭先生文字改革理論的時候，在編排方式上不恰當。不少讀者對收到刊物的時間太遲很有意見。哈爾濱有讀者來信說，刊物出版後要到第二個月的八九號才能見到；廣州的讀者也說要下月中旬才能得到。有的讀者拿性質和出版日期跟本刊相近的刊物作比較，認為本刊發行不及時是很大的缺點。

此外，有些讀者希望本刊能做好培養新生力量的工作，儘可能發表青年作者的論文，給退稿提意見。建議多出版一些有關語音、語法、詞彙的基本知識及研究方法的叢書。

以上的意見都是極其寶貴的。這不僅反映了廣大讀者對本刊的要求，也說明了我們過去跟讀者、作者的聯繫不夠，沒有很好地滿足讀者的需要。

按本刊今年的編輯方針和任務，決定仍以去年的（見56年1月號編者的話）為依據，不作原則上的變更；但是，今年擬着重在：1) 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

展開語言學問題的自由討論（對某些重要的問題，本刊可以在適當時機用座談會等形式作出整理式的總結，不過早地強求學術上的結論）；2) 幫助語文工作者提高語言學的理論知識和實踐能力；3) 進一步討論漢語規範化問題，同時對於語言使用方面的某些不正常現象提出批評，以促進祖國語言的健康發展。

基於以上各點，介紹語言學常識、幫助青年語文工作者向語言科學進軍，進一步討論文字改革問題，介紹蘇聯和其他各國語言學先進學說，這些任務都已經列入今年的選題計劃。語法方面準備深入討論詞類問題、形態問題、句法問題，等等（內容重複的不再刊登）。修辭學問題也打算討論；但這方面的稿件來源不多，估計今年只能開個頭。古漢語研究的文章，過去已零星刊載過一些，今後還擬繼續刊用這類短稿。我們正向有關部門商談如何能讓少數民族語文研究的文章有充分發表的機會，問題解決以前，這方面的文章本刊仍擬刊登，但所占篇幅不宜過大。

我們也想系統地介紹一下有關中國文字發展歷史的知識，這對文字改革問題的討論會有些幫助。關於音韻學的專篇論著對本刊的大多數讀者目前還不很適合；但是介紹音韻學的某些基本知識的文章，談得比較深入而又寫得通俗易懂的，我們也很願意推薦給讀者。

我們決定以後儘可能少登上萬字的長文，這點還得請作者合作，盡量寫得簡練一些。

我們的語言學界確實需要組織力量大量翻譯蘇聯及其他國家的語言學著作，這個工作與我國語言科學的水平迅速提高密切相關，我們希望能夠作為一項重要任務列入語言學的長遠規劃之內。無論從人力或取權方面來衡量，一個期刊的編輯部不可能把這個責任擔當起來；我們只能為配合問題的討論選擇一些有關的譯文介紹給讀者。

關於退稿提意見的問題，本刊去年10月號“編者的話”里有過聲明。編輯部的人力有限，若是退稿必提意見，我們就沒有足夠的時間照顧到刊物的編輯工作，那就會影響刊物的質量。在這方面要請作者多多體諒。

在目前節約紙張的情況下，增加篇幅還做不到。讀者對本刊編輯部過去選稿不嚴格、加工不細緻、組織討論文章的方式不恰當等批評意見都是正確的，我們願意誠懇接受。關於校對工作，我們在工作制度上作了一些改進，深信校對質量能夠逐步提高。關於發行工作上的問題，我們已將意見轉達給主管部門，請他們儘可能設法解決。

其他問題，限于篇幅，就不在這裡一一答复了。